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論共产主义社会

141
2

200356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論 共 产 主 义 社 会



F28350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八 年 · 北 京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論 共產主義社會

*

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號
重慶人民出版社重印(重慶嘉陵路344號)
重慶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850×1168公厘 $\frac{1}{2}$ ·印張7 $\frac{3}{4}$ ·字數168,000
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10月重慶第2次印刷
(本書在京、滬、沈、漢、渝5地印造)·
印數(京)300,001—500,000 定價(四)0.58元
統一書號 1001·373

編者的話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处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形势之下，人們都不能不关心着我国将如何由社会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为了启发思考，展望未来的前景，我們就編了这样一本书来供給大家学习和参考。

本书材料主要取自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已有的中文譯本，只有少数是直接 from 外文版本翻譯出来的。每个题目下的材料按照作者写作或第一次发表时间先后排列。为了便于查考，少数材料在有关的题目之下重复列出。本书中遺漏欠妥之处，希望讀者指正。

目 录

編者的話

一	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况.....	1
	附录:倍倍尔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設想	
二	公有制的建立.....	26
三	电气化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質基础.....	34
四	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可以大大发展.....	43
五	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充分发挥地方和群众的 創造性.....	45
六	共产主义的劳动.....	50
七	劳动时间的縮短.....	67
八	科学技术的发展再不受限制.....	74
九	彻底消灭人力物力的浪费.....	77
一〇	消灭货币和实行产品交换問題.....	81
一一	生产产品的分配和消費,“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90
一二	平等和平均問題.....	103
一三	再生产問題.....	109
一四	生产公社、消費公社.....	113
一五	工农业的結合,城乡差别的消灭.....	117
一六	工业的合理分布,工业区和农业区的融合.....	131
一七	全面发展,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消灭.....	133

一八	教育和文化.....	145
一九	国家消亡問題.....	163
二〇	民族和民族語言的融合，国际主义.....	193
二一	家庭、婚姻和妇女問題.....	203
二二	人口問題.....	212
二三	人的精神道德面貌.....	214
二四	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	219
二五	农民同盟軍問題在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中的 重要性.....	228

一 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况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和人的利益并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因而竞争就消失了。当然也就谈不到个别阶级的破产，更谈不到象现在那样的富人和穷人的阶级了。在生产 and 分配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时候，就不会再发生私人占有的情形，每一个人都不必再单枪匹马地冒着风险企求发财致富，同样也就自然而然地不会再有商业危机了。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无论生产和消费都很容易估计。既然知道每一个人平均需要多少物品，那就容易算出一定数量的人需要多少物品；既然那时生产已经掌握在个别私人企业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公社及其管理机构的手里，那也就不难按照需求来调节生产了。

这样，我们看到，在共产主义的组织里，现代社会制度的主要缺陷就会消除。但是，如果我们再稍稍地多从细节方面来考察问题，我们就会看到，这种组织的优点还不止此。这些优点还表现在消灭其他许多缺点上，今天我只举几个经济方面的例子。在经济方面，当前的社会结构无疑是难以想象地不合理和不切实际的。由于人们的利益彼此对立，大量劳动力就白白地消耗掉了，社会没有从里面得到任何好处，相当多的资本完全浪费掉了，并且没有再生产出来。在发生商业危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种情形。我们看到，人们怎样不愿血本地抛售自己辛辛苦苦地生产出来的大批产品；我们看到，处心积虑地积累起来的大批资本怎样由于所有主

的破产而从他们手中飞掉了。现在让我们来稍微详细地考察一下现代的商业。请你们想一想，每一个产品必须经过多少人的手，才能到达真正的消费者手里！诸位先生，请你们想一想，现在有多少投机倒把的多余的中間人插足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間！举一包北美产的棉花为例。棉花从种植場主之手轉到密士失必河某个碼頭上的一个經紀人手里，然后順流而下运到新奥尔良。在这里棉花又卖出去（这是第二次出售，因为經紀人已經从种植場主那里买过一次了），假定是卖给一个投机商，而投机商又轉卖给出口商。后来这包棉花，比如說，运到了利物浦，在那里，另一个投机商又伸出了贪婪的手，抓住了这包棉花。这个投机商再把它卖给一个經紀人，而这个經紀人，比如說，又是受德国某公司的委托而买的。这样，这包棉花就运往鹿特丹，再溯莱茵河而上，经过十来个轉运商之手，而且还要经过十几次装卸，这时它才到达厂主之手，但是还没有到达消费者手里。厂主首先将棉花加工，使它适于使用，然后把紡成的棉紗交给織布的人，織布的人将布交给印花的人，然后布匹才到达批发商之手，批发商再把布轉给零售商，最后，零售商才把商品送到消费者手里。所有这些成千上万的中間人，即投机商、代理人、出口商、經紀人、轉运商、批发商和零售商都没有参加商品的生产，但是他们全都要生活，全都想在上面取得利潤，而且通常也的确都得到了利潤，否則他們就无法生存下去。诸位先生，难道除了这条必须经过十几次出卖、上百次装卸、上百次地从一个倉庫运到另一个倉庫的漫长的道路之外，就没有更简单更便宜的道路把棉花从美洲运到德国、把棉紡織品送到真正的消费者手里嗎？难道这不是清楚地証明了人們的利益的背离引起了劳动力的巨大的浪費嗎？在合理地組織起来的社会中，就不会有这样繁杂的运输方法。现在我们繼續談这个例子。正如我們可

以很容易地知道某个移民区消费多少棉花或多少棉紡織品一样，中央管理机构也可以同样容易地知道全国各地和各公社的消费量。只要这种統計工作組織就緒，这种工作在一两年內就可以很容易地完成，每年的平均消费量就只会同人口的增长成比例地变化；因此就容易适时地預先确定，每一种商品要有多少才能滿足人民的需求。所需的这些商品也可以按批購的方式直接在产地訂購，并且可以直接取得，不必經過中間人，不需要任何停頓和装卸，除了运输条件确实要求这样做而外，这样就大大节省了劳动力，而且不必付給投机商、大小商人以利潤。还不仅如此，这样一来，所有这些中間人非但不再为害社会，而且甚至会对社会有利。他們現在干的是对其余的人有害的事情，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些多余的事情，但是他們还是取得了足够的生活資料，而在很多場合下，他們甚至还大发其財；因此，他們現在是在直接損害公共福利，而将来他們的双手就会解放出来参加有益的活动；他們一定可以找到一种职业，这种职业能使他們不是作为表面上的、假的社会成員而出現，而是作为人类社会的真正的成員、人类社会的共同活动的参加者而出現。

現代社会促使个人敌視其他一切人，这样就引起了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社会战争，这个战争在某些人那里，尤其是在文化水平低的人那里不可避免地会采取粗暴的野蛮的暴力形式，即犯罪暴力的形式。为了使自己不受犯罪行为即公开的暴力行为的侵害，社会就需要有庞大而复杂的、耗費无数人力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这些机关也将无限地加以簡化，而这正是因为（不管看起来是多么奇怪）在这种社会里，管理机构必須管理的不仅是社会生活的个别方面，而且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切表現、一切方面。我們消灭个人和其他一切人之間的敌对現象，我們

用社会和平来反对社会战争，我們彻底鏟除犯罪的根源，因而就使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目前的大部分工作、甚至是很大一部分工作成为多余的了。現在因情欲而犯罪的現象已經愈来愈多地讓位于因利害得失而犯罪的現象，就是說，侵犯人身的犯罪次数愈来愈少，而侵犯财产的犯罪次数却不断增加。在处于战争状态下的现代社会里，文明的增进已經可以减少情欲上的强暴表现，要是在共产主义的、和平的社会里，情况还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啊！在每一个人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需求都得到滿足的地方，在没有什么社会隔阂和社会差別的地方，侵犯财产的犯罪行为自然而然地就不会再发生了。刑法会自行消失，民法（它几乎只是專門处理财产关系或者至多是專門处理那些以社会的战争状态为前提的关系）也会不再存在。現在的各种爭端是人們互相敌对的自然而然的結果，到那时就只是罕有的例外，并且很容易通过仲裁法庭来調解。現在，行政机关的工作也是針對經常的战争状态的，就是說，警察机构和整个行政机关都專心致力于使战争保持隱蔽的和間接的形式，使战争不致变为公开的暴力行为，变为犯罪。如果說，維持和平要比在一定地区内进行战争容易得多，那末，管理共产主义社会，就不知要比管理籠罩着竞争的社会容易多少倍。如果說，文明甚至在現在就已經教人們懂得，只有維持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利益，才能有自己的利益，从而尽可能地使警察机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变成多余的东西，那末，在利益的共同已經成为基本原则、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已經没有什么差別的社会里，情况还不知要好多少倍啊！現在是違反社会制度而实现的东西，在社会制度不再阻碍、反而予以促进的时候，将不知要傳播得多广啊！因此，即使从这一方面来看，我們也有理由預期，由于当前的社会制度从社会那里夺走人手的事情不再发生，劳动力将会增加很多。

常备軍是現代社会必不可少的耗費最大的設施之一，它夺走了一个国家中最強壯、最必需的那部分居民，使这部分居民不能从事生产，使国家不得不供养他們。从我們的国家預算中可以看出，我們为常备軍花費了多少：每年花錢2,400万，从生产中夺走20万双最結实的手。而在共产主义的社会里，誰也不会想到什么常备軍。要常备軍来做什么呢？为了維持国内的安宁嗎？我們已經知道，誰也不会想到去破坏国内的安宁。对革命的恐惧只是人們的利益互相对立的结果，只要大家的利益一致，就不会有这样的恐惧。是为了进行侵略战争嗎？共产主义社会十分明白，战争只会使它損失人員和資本，而它取得的至多只能是几个怨声載道、因而也只会破坏社会秩序的省份，它又怎么会进行侵略战争！是为了自卫嗎？自卫也不需要常备軍，因为要使每一个适于作战的社会成員，为了保卫国家而不是为了参加檢閱，在自己的本行职业之外学会掌握武器，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时請你們注意一下，一旦发生战争（当然这种战争只能是对付那些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的），这个社会的成員一定会保卫真正的祖国、真正的家园，因此他們将精神焕发、坚毅勇敢地作战，使受过机械化訓練的現代軍隊也要望风披靡。你們想一想，在1792年到1799年这个时期革命軍隊，即仅仅为了一种幻想、为了想象的祖国而战的軍隊因情緒激昂而作出了怎样的奇迹，你們就会明白，不是为了幻想、而是为了一个实在的可以捉摸的目标而战的軍隊将具有什么样的力量。这样，在共产主义的組織中，現在由于維持軍隊而从文明的人民那里夺走的无数的人力就将重返劳动崗位，他們不仅会生产出自己所消費的产品，而且还能生产出比供养他們自己、比补充社会儲备所必需的还多得多的产品。

在現在的社会里，人力的更大浪費表現在有錢人濫用自己的

社会地位上。我根本不打算在这里谈那种仅仅为了炫耀自己而占用了许多劳动力的、无益的、简直是荒唐的浪费现象。但是请你们去看一下富翁的公馆、富翁的内室，然后告诉我，许多人服侍一个人，因而弄得无事可干，或者至多也只做些由于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中而必须做的工作，这难道不是劳动力的荒唐的浪费。所有这些女仆、厨子、听差、车夫、家人、园丁等等到底干些什么呢？一天只有那么少的几分钟他们是真正用来使他们的主人生活得愉快，使他们的主人易于自由地发挥和利用自己的人的特性和才能；一天又有多少钟点他们是用来做下面这些仅仅由于我们的社会关系安排得不好而产生的事情，这就是站在马车的侍从座上，满足主人的癖好，牵着只小狗跟在主人后面，以及其他各种可笑的事情。在合理地组织起来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能够生活，他们不再成为老爷们的癖好的奴隶，而且也想不到这些癖好。在这样的社会里，目前浪费在服侍人们过奢侈生活的劳动力自然就转而为大家造福，为劳动者自己造福。

此外，在今天的社会里，直接由于竞争的影响，产生了浪费劳动力的现象，因为竞争使大批的人失了业；他们很想工作，但是却得不到工作。既然社会根本不是从考虑劳动力的真正使用上建立起来的，既然每一个人都得自己去寻找生活，那末，在分配真正有益的工作或者似乎有益的工作时，很大一部分工人很自然地就没有工作做了。这由于下面这种情况而表现得更加严重，这种情况就是：竞争迫使每一个人鼓起全部力量，利用自己的一切可能，以廉价的劳动力来代替高价的劳动力，而文明的日益增进也为此创造了更多的条件，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去抢夺别人的饭碗，用一切办法挤掉别人的工作。因此，在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里，都有大批很想工作但是却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而且这个失业

入數比人們通常想象的要大。我們看到，人們用一定的方式出賣自己；他們求乞；打掃街道；站在街道拐角處等候某種工作；替別人做些偶然得到的零活以求勉強維持自己的生活；拿着各色各樣的零星雜貨叫賣；或者象我們在今天晚上所看到的一些窮人家的姑娘一樣，從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彈着吉他和唱，僅僅為了賺幾個小錢而不得不聽各種無禮的和侮辱人的話。而終於真正不得不去賣淫的人們又不知有多少呵！這些不得不採取某種方式出賣自己的失業者數量是很大的，我們的慈善機關可以談談這方面的情況。同時也不應該忘記，雖然這些人對社會毫無益處，社會還是要通過某種方式來養活他們。既然社會要負擔養活這些人的費用，那末社會也就應該關心這些失業者，使他們能正大光明地謀生。但是在競爭統治着一切的現代社會里，這是無法辦到的。

諸位先生，你們想一想上面所談的一切（我還可以舉出許多別的例子來說明現代社會如何浪費勞動力），你們就會發現人類社會擁有極其豐富的生产力，這些生产力只要合理地組織起來，妥善地加以調配，就可以給一切人帶來最大的利益。根據這一切，你們就可以斷定，擔心公正地分擔社會活動以後每個人的勞動負擔就會大得使他不可能去做別的事情，那是多么沒有根據。其實我們可以設想，在這樣的組織下，由於利用了現在完全沒有利用的或者利用得不够恰當的勞動力，每個人的一般工作時間就會比現在縮短一半。

但是共產主義的組織因利用目前被浪費的勞動力而表現出的优越性還不是最重要的。把個別的力量聯合成社會的集體力量，以從前彼此對立的力量的一種集中為基礎來安排一切，才是勞動力的最大的節省。在這裡，我贊成英國的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的一些主張，因為這些主張最實際、最完善。歐文提議建造一些

大公寓來代替現在那些房屋分散而且彼此妨礙的城市和村庄。每一公寓占地長寬各約1650英尺，附有大花園，可以舒適地居住兩三千人。顯而易見，建造這種能使住戶享受現代最好的住宅設備的房屋，比起為同樣多的人建造單獨的、多半沒有那麼舒適的現有式樣的住宅來，要便宜得多和容易得多。現在幾乎每幢大廈都存在的許多房間常年空着或者每年只使用一兩次的現象就可以消滅，而且不會有任何不方便；儲藏室和地下室等等的用地也同樣可以大大節省。要是深入地看一下家務瑣事，那末公共經濟的優越性就表現得特別明顯。現在的分散經濟，就拿取暖來說，不知浪費了多少勞動和物資！每一個房間必須有一個火爐，每一個火爐必須分別生火、添煤和照顧；必須把燃料送到每一個房間，而爐灰還得加以清除。可是象目前的一些大的公共建築物，如工廠、教堂等，裝置一個巨大的總的取暖設備，比如說，用一個發熱中心和一些蒸氣管子來代替這些單獨的火爐，是多麼簡單和便宜。其次，瓦斯燈目前費用還很貴，因為連最細的管子也得敷設在地下，而管子又因為我們城市里需要照明的面積很大，必須敷設到很遠的地方。可是，如果象上面所說的那樣來安排這一切，所有一切就都集中在1650英尺見方的地面上，而瓦斯燈的數目並不會減少，結果，這種照明的費用無論怎樣也不會比一個中等城市所花的費用更多。再其次，我們拿做飯來說，在現在這種分散經濟的情況下，每一個家庭都單獨準備一份自己所必需的、分量又不多的飯菜，單獨備有餐具，單獨僱用廚子，單獨在市場上、在菜場里向肉商和面包商購買食品，這白白占據了多少地方、浪費了多少物品和勞動力！可以大膽地假設，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務所，從事這一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就會很容易地解放出來，而其餘的三分之一也能够比現在更好、更專心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最後，看看收拾房屋的工作吧！

要是这些工作也組織起来和正确地加以分配（在那种条件下这是完全可能实现的），那末打扫和收拾这种建筑物难道不比打扫和收拾两三百幢单独的房屋容易万倍嗎？而象現在这样安排，两三百幢房屋中住的人也就不过两三千人呵。

这不过是从人类社会的共产主义組織在經濟方面的无数优点中举出来的几个例子而已。我們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內用不多的几句话向你們闡明我们的原則，适当地、全面地論証我们的原則。我們根本沒有給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我們只能够，而且也只希望闡明几点，促使那些还不熟悉这个問題的人去研究这个問題。但是我們希望今天晚上至少已經向你們闡明了一点，那就是共产主义不仅不同人的本性、理智、良心相矛盾，而且也不是脱离现实的、只是由幻想产生的理論。

也許有人要問：如何实现这种理論，我們能够采取一些什么措施来实现这种理論？达到这个目的有各种不同的方法。英国人大概会从建立一些单独的移民区开始，然后讓每一个人去决定自己是否参加移民区；法国人却剛剛相反，他們也許会在全国范围内准备和实行共产主义。至于德国人从什么地方着手还很难說，因为社会运动在德国还是一种新的現象。我現在只从能够实现共产主义的許多办法中間提一下近来談得很多的一种办法，这就是采取三个必然会促使共产主义实现的措施。

第一个措施是由国家出資对一切儿童毫无例外地实行普遍教育，这种教育对任何人都是一样，一直进行到能够作为社会的独立成員的年齡为止。这个措施对我們的穷弟兄來說，只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都无可爭辯地有权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而且当社会使愚昧成为贫穷的必然結果的时候，它就对人犯下了双重的罪过。显而易见，社会成員中受过教育的人会比愚昧无知的

沒有文化的人給社会帶來更多的好处。如果說无产階級在受了教育之后必然不愿再忍受現代无产階級所受的那种压迫，那末从另一方面来看，和平改造社会时所必需的那种冷靜和慎重只有受过教育的工人階級才能具有。但是現在連沒有受过教育的无产階級也不愿意繼續处于目前的状况了。甚至在德國我們也能够找到証明，西里西亞和波希米亞的騷動就是例子。至于別的国家就更不必說了。

第二个措施是全面改組济貧所，把所有失业公民都安置在移民区内，讓他們在里面从事工农业劳动，并把他們的劳动組織起来为全移民区造福。到目前为止，济貧所还把它掌管的資本用来放債生息，这就为有錢人剝削穷人創造了更多的机会。現在毕竟應該是把這些資本真正用来为穷人造福的时候了，應該是把這些資本的全部收益，而不仅仅是其中的百分之三給穷人的时候了，應該是在作出資本和劳动的联合的卓越榜样来的时候了！一切失业者的劳动力都应当象这样用来为社会謀福利，而這些被迫墮落的受尽压迫的赤貧汉将会轉变为文明的、自食其力的、勤勉的人；他們所处的环境，很快就会使沒有联合起来的工人感到羨慕，并且为彻底改組社会开辟道路。

要貫徹这两个措施就需要錢。为了取得這些錢，同时为了改变到現在为止一切分担得不公平的賦稅，在現在提出的改革計劃中就应该建議采取普遍的資本累进稅，其稅率隨資本額的增大而递增。这样，每一个人就按照自己的能力来負担社会的管理費用，这些費用的重担就不会象一切国家中以往的情形那样，主要落在那些最沒有力量負担的人們的肩上。納稅原則本質上是純共产主义的原則，因为一切国家的征稅的权利都是从所謂国家所有制来的。的确，或者是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这样就沒有什么国家所有

制，而国家也就无权征税；或者是国家有这种权利，这样私有制就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所有制就高于私有制，而国家也就成了真正的主人。后面这个原则是大家公認的。好吧，諸位先生，我們现在就只要求大家遵守这个原则，要求国家宣布自己是全国的主人，从而用社会财产来为全社会謀福利；我們要求国家实行一种只考虑每一个人的納稅能力和全社会的真正福利的征税办法，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第一步。

这样，諸位先生，你們就看到，我們談的不是不顧民族的意志立即实行财产共有，而是首先要确定目标和保証我們能够向这个目标迈进的办法和途徑。至于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将来的原则这一点，一切文明国家的发展进程可以証明，迄今存在的一切社会制度的迅速瓦解可以証明，人的良知、首先是人的良心可以証明。

（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說”，1845年2月8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05—616頁）

馬克思接着又說：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級阶段，迫使人們奴隶般地服从社会分工的現象已經消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隨之消失，劳动已不仅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生产力已隨着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而增长，一切社会财富的资源都会充分地涌現出来，——只有在那时候，才能彻底打破资产階級法权的狭隘观点，社会才能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現在我們才認識到，恩格斯无情地譏笑那种把“自由”和“国家”这两个名詞連在一起的是謬見解，是多么正确。还有国家的时候就不会有自由，有了自由就不会有国家。

国家完全消亡的經濟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經消失，因而現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

要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决不能立刻消除的。

这种剥夺会使生产力有蓬勃发展的可能。既然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现在已经怎样难以想象地阻碍着这种发展，而在现有的技术基础上又可以大大推进生产力，我们就可以有十二分把握地说，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但是，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地发展，将怎样迅速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

因此，我们只能谈国家消亡的必然性，同时着重指出这个过程是长期的，它的长短将取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发展速度。至于消亡的日期或消亡的具体形式问题，只能作为悬案，因为现在还没有可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

当社会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时，也就是说，在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已经大大提高，因此他们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来工作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那时，“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观点”，这种使人象夏洛克（夏洛克是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的剧本“威尼斯商人”中的一个典型的高利贷者。——译者注）那样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观点就会打破。那时，社会就不必在分配产品的时候规定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根据需要”自由地领取。

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很容易把这样的社会制度说成是“纯粹的乌托邦”，并冷嘲热讽地说社会主义者许过诺言，要使每个人都有权利向社会领取任何数量的香菌、汽车、钢琴等等，而对每个公民的劳动则可以不加任何监督。就是在今天，大多数资产阶

級“學者”也還是用這種諷刺的話來搪塞，但他們這樣做只是暴露了他們的愚昧無知和為資本主義辯護的自私目的。

其所以說愚昧無知，是因為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想到過要許下共產主義高級發展階段一定到來的“諾言”，而偉大的社會主義者在預見這個階段將會到來時所設想的前提，既不是現在的勞動生產率，也不是現在的庸人，因為這種庸人正如波米亞洛夫斯基小說中的教會學校學生一樣，慣於“無故地”破壞社會財富的儲藏和提出不能實現的要求。

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到來以前，社會主義者要求社會和國家對勞動量和消費量實行極嚴格的監督，不過這種監督應當從剝奪資本家和由工人監督資本家開始，並且不是由官僚的國家而是由武裝工人的國家來實行。

資產階級思想家（和他們的走卒，如策烈鐵里先生、切爾諾夫先生之流）為要達到替資本主義辯護的自私目的，就一味爭論和空談遙遠的未來，而不談目前政治上的迫切問題：剝奪資本家，把全體公民變為一個大“辛迪加”即整個國家的工作人員和職員，并使整個辛迪加的全部工作完全服從真正民主的國家，即工兵代表蘇維埃的國家。

其實，當博學的教授以及附和他的庸人們和策烈鐵里先生、切爾諾夫先生之流談到荒誕的烏托邦，談到布尔什維克的蠱惑人心的諾言，談到不可能“實施”社會主義的時候，他們指的正是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但是，不僅誰也沒有許過“實施”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諾言，而且連想也沒有想到“實施”，因為這根本不是可以“實施”的。

這裡我們也就要講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科學上的差別問題，這個問題在上面引用的恩格斯說“社會民主主義者”這個名稱

不恰当的一段話里已經談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級阶段同共产主义高級阶段之間的差別，在政治上說，将来也許很大，但現在在資本主义下着重來談它就很不可笑了，至于把这个差別提到首要地位的也許只有少数无政府主义者（这是說，如果在克魯泡特金之流、格拉弗、柯尔涅利遜以及其他无政府主义“大师”們“象普列汉諾夫那样”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或象一个沒有丧失廉耻和良心的无政府主义者格耶所說的那样变成了无政府主义“卫国”战士以后，无政府主义者当中还有人絲毫沒有学到什么东西）。

但是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別是很明显的。馬克思把通常所說的社会主义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級阶段。既然生产資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末“共产主义”这个名詞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馬克思的这些解释的偉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始終应用了唯物主义辯証法，即发展学說，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資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馬克思沒有經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也沒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爭論（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表現共产主义在經濟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經濟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資本主义的傳統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現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級法权的狭隘观点”。既然在消費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級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級的国家，因为如果沒有一个能够迫使人們遵守法規的机关，权利也就等于零。

可見，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內，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級的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沒有资产阶級的资产阶級国家！

这好象是奇談怪論，或只是一种聰明的辯証把戏，那些沒有花

过一点功夫去研究馬克思主义的极其深刻的內容的人，就常常这样来譴責馬克思主义。

其实，無論在自然界或在社会实际生活中，我們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的情形。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资产阶级的”法权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刚从资本主义腹内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

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争取解放的斗争中，民主制具有巨大的意义。但是民主制决不是一种不可逾越的极限，它只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和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的一個阶段。

民主制意味着平等。很明显，如果把平等正确地理解为消灭阶级，那末无产阶级争取平等的斗争以及平等的口号就具有偉大的意义。但是，民主制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一旦社会全体成員在占有生产資料方面的平等实现以后，也就是說，一旦劳动平等和工資平等实现以后，在人类面前就必然会产生一个問題：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轉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至于人类会經過哪些阶段，通过哪些实际办法达到这个最高目的，那我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可是，必須認識到，资产阶级总是非常虚伪地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实际上，只有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才会开始真正地迅速地向前推进，形成一个有大多数居民甚至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

民主制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对人們使用有組織有系統的強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制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而这一点又和下面一点联系着的：民主制在其发展的某个阶段首先把反资本主义的革命阶级——无产

階級團結起來，使他們有可能去摧毀、粉碎、連根鏟除資產階級的（哪怕是共和派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即常備軍、警察和官僚，而代之以更民主的、但仍然是國家的機器，即由武裝工人羣眾（以後要過渡到全民民警制）構成的國家機器。

這就是“從量變到質變”：達到這樣高度的民主，就會越出資產階級社會的範圍，開始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如果所有的人都真正參加國家的管理，那末資本主義就不能支持下去。而資本主義的發展本身卻又為“所有的人”真正能夠參加國家管理創造了前提。這種前提就是：在許多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已經達到了人人都識字，而且千百萬工人已經在郵局、鐵路、大工廠、大商業企業、銀行等等社會化的巨大複雜的機關里“受了訓練並養成了遵守紀律的習慣”。

在這種經濟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一天之內立刻推翻資本家和官僚，由武裝工人、普遍武裝的人民代替他們去監督生產和分配，統計勞動和產品。（不要把監督和統計的問題同具有科學知識的工程師和農藝師等等的問題混為一談，這些先生今天在資本家的支配下工作，明天他們就會在武裝工人的支配下更好地工作。）

統計和監督是把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安排好”並使它能正確地進行工作所必需的主要條件。在這裡，全體公民都成了國家（武裝工人）的雇員。全體公民都成了一個全民的、國家的“辛迪加”的職員和工人。全部問題在於要他們做同等的工作，正確完成工作量，領取同等的報酬。資本主義使這種統計和監督變得非常簡單，成爲一種非常容易、任何一個識字的人都能勝任的監察和登記的手續，只是算算加減乘除和收支有關字據的手續^①。

當大多數人民到處開始自己來進行這種統計，對資本家（這時已成爲職員）和保留着資本主義惡習的知識分子先生們實行這種

監督的時候，這種監督就成為真正包羅萬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監督，那時他們就絕對無法逃避這種監督，就會“無處躲藏”了。

整個社會將成為一個管理處，成為一個勞動平等、報酬平等的工廠。

但是，無產階級在擊斃資本家和推翻剝削者以後在全社會推行的這種“工廠”紀律，決不是我們的理想，也決不是我們的最終目的，而只是為了徹底肅清社會上資本主義剝削製造成的丑惡現象，並且為了繼續前進所必需的一個階段。

當社會全體成員或至少絕大多數成員自己學會了管理國家，自己掌握了這個事業，並對一小撮資本家、想保留資本主義惡習的先生們和深深受到資本主義腐蝕的工人們“安排好”監督的時候，任何管理都開始不需要了。民主制愈完備，它成為多餘的東西的時候就愈接近。“國家”，即由武裝工人組成的、“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愈民主，則一切^①的國家開始消亡也愈快。

當大家都學會了管理，實際上都自己來管理社會生產，自己來進行統計並對寄生蟲、老爺、騙子手等等“資本主義傳統的保护者”實行監督的時候，企圖逃避這種全民的統計和監督就必然很難達到目的，必然只會是極少數的例外，並且還可能受到極迅速嚴厲的懲罰（因為武裝工人是實事求是的，不象知識分子那樣抹不開情面；他們未必會讓人隨便跟自己開玩笑），這樣，人們對於人類一切公共生活的簡單的基本規則就會很快從必須遵守變成習慣於遵守了。

到那時候，從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過渡到它的高級階段

① 當國家的最主要職能簡化為由工人自己擔當的這樣一種統計和監督的時候，國家就不再成為“政治的國家”，那時“社會職能就由政治職能變為簡單的行政管理職能”（參見第四章第二節恩格爾對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列寧注

的大門就会敞开，国家也就会完全消亡了。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4—461頁）

社会主义是直接 from 资本主义里面长出来的社会，是新社会的初級形式。至于共产主义，它是这种社会的高級形式，这种形式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发展起来。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在不要资本家帮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是在劳动者的有組織的先锋队即先进部分施行最严格的統計、监督和檢查的情况下共同劳动；同时还應該規定劳动量和劳动报酬。这种規定所以必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給我們留下了許多遗迹和习惯，如劳动的单独进行、对公共經濟的不信任以及小业主的各种旧习惯等等，这些在所有农民国家中都是占統治地位的。这一切都是同真正共产主义經濟的要求背道而馳的。我們所謂共产主义是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們习惯于履行社会义务而不需要特殊的强制机关，不拿报酬地为大家工作已成了普遍的現象。

（列宁：“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1919年，“列宁全集”
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2—253頁）

毫无疑问，未来的社会将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

未来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这首先就是說，那里不会有任何階級存在：既不会有资本家，也不会有无产者，因此也就不会有剝削。那里只会有集体工作的劳动者。

未来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也就是說，那里随着剝削的消灭，商品生产和买卖也会消灭，因此那里不会有劳动力的購買者和出卖者、僱用者和被僱用者存在的余地，那里只会有自由的劳动者。

未来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这最后就是說，那里随着僱用

劳动的消灭,任何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也会消灭,那里不会有贫民无产者,也不会有富翁资本家,那里只会有集体占有的一切土地、一切矿藏、一切森林、一切工厂和一切铁路等等的劳动者。

由此可见,未来生产的主要目的是直接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增加资本家的利润来生产出卖的商品。这里不会有商品生产、争夺利润等现象存在的余地。

同样很明显,未来生产将是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它将顾及社会的需要,看社会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这里不会有生产的分散性,不会有竞争、危机和失业现象存在的余地。

凡是沒有阶级的地方,凡是沒有富人和穷人的地方,也就不需要国家,也就不需要压制穷人和保卫富人的政权。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政权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

同时很明显,为了处理公共事务,社会主义社会除需要集中各种资料的地方局之外,还需要一个中央统计局来搜集有关全社会各种需要的资料,然后适当地把各种工作分配给劳动者。代表会议,特别是代表大会,也将是必要的;它们的决定,在下届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占少数的同志一定要无条件地服从。

最后,很明显,自由而友爱的劳动必定使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切需要都得到平等而充分的满足。这就是说,如果未来的社会要求每个成员能劳动多少就劳动多少,那末社会本身也应当根据每个人需要多少产品就给予多少产品。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就是未来的集体制度应借以建立起来的原则。自然,在社会主义第一阶段上,既然参加新生活的还有一些不习惯于劳动的分子,生产力也沒有足够地发展,而且还有“粗”工和“细”工的差

別，這時要實行“各取所需”的原則一定大感困難，所以社會不得不暫時走上某一條中間道路。但同樣很明顯，當未來社會走上自己的軌道而資本主義殘余被連根剷除的時候，上述原則就會是適合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唯一原則。

.....

這都很好。但社會主義的實現是可以想象的嗎？可以設想人們能剷除本身的“野蠻習慣”嗎？

還有，如果大家都各取所需，可以設想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水平够得上這種需要嗎？

社會主義社會的必要條件是足夠發達的生產力和人們的社會主義意識以及人們的社會主義教育。現存資本主義所有制阻礙着現代生產力的發展，如果估計到在未來社會中不會有這種所有制，那末顯而易見，生產力一定會增長許多倍。同時還不應忘記，在未來社會中，現在的數十萬寄生蟲和失業者都會擔任工作而補充勞動者的隊伍，這樣就會大大推進生產力的發展。至于人們的“野蠻”情感和觀點，並不是象某些人所設想的那樣永恆的東西：有一個時期即原始共產主義時期，人們是不承認私有制的；後來一個時期即個人主義生產的時期，私有制掌握了人們的情感和理性；現在一個新的時期即社會主義生產的時期快要到來，那時人們的情感和理性浸透着社會主義的意向，這有什麼奇怪的呢，難道存在不決定人們的“情感”和觀點嗎？

（斯大林：“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05—309頁）

要是對共產主義社會做一個簡略的解剖，那末它就是這樣的一個社會：（甲）在那里不會有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而只會有公有制、集體所有制；（乙）在那里不會有階級和國家政權，而

只会有工业和农业的劳动者，他們将成为劳动者自由联合体，在經濟上自己管理自己；(丙)在那里按計劃組織的国民經济，無論在工业方面或在农业方面，都是以高度技术为基础的；(丁)在那里不会有城乡的对立，不会有工业和农业的对立；(戊)在那里产品将按旧时法国共产主义者的原則实行分配，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己)在那里科学和艺术将获得十分有利的发展条件，可以达到全盛的境地；(庚)在那里每个人将成为真正自由的人，不必为糊口而操心，也不必迎合“当代有权有势的人”。

如此等等。

(斯大林：“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談話”，1927年，“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17—118頁)

附录 倍倍尔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設想

在将来的社会，这种生活方式一定能够实现，一切种类的学者和艺术家一定能大量的产生，他們一定能够将每天生活的一部分从事体力劳动；其余的时间由各人所好去研究艺术，或者从事社交。

(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80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1955年2月版，第403頁)

……新社会不制造專供买卖用的“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仅为供給消費。消費力不依購買力为轉移，而为全体的生产能力所限制。假使有充分的劳动力与生产資料，一切要求都可滿足。社会的消費能力只有在消費者的滿足之中找出它的界限。

在新社会沒有“商品”，所以沒有貨幣。一看貨幣很象是商品的相对物，其实它本身也是商品。同时，貨幣是社会的等价物——

即对于其他所有商品的价值标准。但新的社会却不生产商品，而生产具有使用价值的必需品，制造物品需要一定的社会劳动时间。制造某种物品需要平均劳动时间若干，这便是测定社会的使用的唯一尺度。制造某物品时所费的十分钟社会劳动时间，应与制造他物品时所费的十分钟社会劳动时间相等，而不能有所高下。社会不要“赚”钱，只要实现有同质和同一使用价值的物品能在各人之间交换，所以结果决定某种使用价值是不必要的。社会只生产自身所需要的产品，假使制造全社会的必需品，需要每日工作三小时，则三小时工作便是劳动时间的标准。生产方法改善，达到了工作两小时即可制出必需品全部，则二小时劳动便作为标准。反之，社会需要在二小时或三小时工作以上时，社会就规定较多的劳动时间。社会的意志便是天因。

(同書第404—405頁)

誰也不能將現代的大都市當為健全的社会產物。現在的產業及經濟制度不斷地使多數的人口集中於都市。……

……在新的社会，一切和現况相反，这种状态必能漸漸解体。人口將從大都市移到乡村，适应于变化了的條件，組成新的自治體制，工業與農業的活動更可容易結合。

都市的人們因為交通機關及生產設備等的發達，他們從來一切所有的文化的要求(教育機關、博物館、劇場、音樂堂、圖書館、社交場等)都移向乡村，所以向鄉間的移民也會同時開始。鄉間生活可以除去從前大都市的一切不便，而供給各項都很便利。住宅將更為愉快而衛生，乡村住民也從事工業，工業的勞動者也得參與農耕。……

……

還有因為人口分散，現今的都市與乡村之間的对立可以除

去。

到現在为止还孤立在农村生活里的、被高級的文明所排除的現代奴隶的农民，到那时候才能成为自由民，成为眞的文化人。从前傅士麦公爵說希望大都市破灭，这种希望将要和他的預想有不同的意义而实现。

(同書第436—438頁)

在新的社会，什么问题都不存在。人类不断的进步及純真的科学就是它的旗帜。假使在那时候，有人感到有宗教的欲望和要求，他尽可和他的同好者共同滿足他們的欲望好了。社会对于他們全不注意，僧侶們要謀生活，也非劳动不可。因为这种劳动而产生的心理的变化，能够使僧侶們也覺醒到做人一般的最高的目的。

宗教虽則消灭，而倫理及道德依然存在。反对倫理和道德的，不是呆人，便是伪善。宗教是因人类及超自然的存在的关系而成立，倫理和道德却是調节人类相互間的关系及其行为的概念的表現。……最高的道德状态是人人自由、人人平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則，普遍地支配了人类的关系时，才能得到。

(同書第443—444頁)

小孩稍长的时候，为着使他們在共同的注意和监督之下玩耍應該将同年輩的孩子們聚在一处。孩子們身体及精神上发达所必需的事物，應該充分的供給。凡是观察过小孩子的，不論誰都能知道孩子們聚在一起最容易教育孩子們的群居性及模仿性最为旺盛。尤其是年幼者喜欢把稍年长的孩子当做模范，当做实例，不从父母反顧从那个稍年长的孩子。将这种性質在教育制度上应用，是很好的方法。从游戏場及幼稚园起，可以慢慢地教导他們一点初步的知識及产业的活動，使之一面游戏，一面学习。其次和在操

場、運動場、滑冰場、游泳場等处的自由运动同时，适当的身心劳动也非有不可。因为教育的目的是在造成身心俱健的种族，所以对于运动锻炼及角力，不论男女都应该培养。此后，一步步的将园艺、农业、工业生产方法及实际活动教给他们，关于各种知识领域的精神教育也不可忽略。

（同書第447頁）

在将来，社会生活将更为公共化。这种发达的方向，从全然变化了的妇女的地位最容易判断。家庭生活缩小到必要范围为止，满足社交欲求的范围非常扩大。为了演讲或讨论以及将来谈论由国民全体作最后决定的一切社会问题的大会场、食堂、读书室、图书馆、游戏室、音乐堂、剧场、博物馆、体育场、公共浴场、公园、各种教育及休养机关、实验室等，都要求有最完善设备，对于此等艺术和科学的各种娱乐，给予充分的机会，使科学及艺术发达到极致。保护病人弱者及老人的设备，也非适应最高的欲求不可。

（同書第455頁）

大厨房的技术今已达到完成的地步。即使在设备最完备的家庭厨房，不能望其项背。理想的厨房非装置电灯电热不可。如此，煤烟臭气都可免去。在这种厨房，和有一切技术的及机械的装置的工场相同，最困难而麻烦的工作，可以在转瞬之间做好。马铃薯果类的削皮、去核器、切肉机、咖啡胡椒的粉末机、切面包、碎冰器、拔塞器及其他一切都可以装置机械，所以几百个人的食事可以由少数人在短时间之内做好。扫除家屋及洗滌碗盞的装置也是同样的。

每个家庭各有一间厨房的制度，损失了数百万妇女无限的劳力、时间与健康愉快。尤其是有很多的家庭在收入不够的时候，厨房成了每日担忧的对象。个人厨房的废止可以使无数的妇女解

放。个人的厨房,和手工业者的工場同样,已經是时代落伍的制度。两者都是最大的不經濟,即時間、勞力、热及光的动力、食物等有很大的浪費。

(同書第461頁)

在将来,一定可以发見一种关于人口問題的有决定意义的要素,就是我們的妇女占有更高尙而自由的地位,从事于智力活动的妇女,通常不願因“神賜”而生的很多子女,以致把她生涯中最可贵的部分为妊娠、哺乳及育儿所耗費。到現在,大多数的妇女还憎嫌子女的过多。在社会主义的社会,虽則社会对于孕妇及产妇有特别的保护,但妇女厌恶多产的感情,恐怕非但不能减少,反而会增加。所以在未来社会,人口的增加或者反而会比現在社会更为緩慢,我們是这样想的。

(同書第497—498頁)

二 公有制的建立

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之后，无论怎样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制都趋于消灭。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

第十四个问题：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应当是怎样的？

答：首先将根本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管理权。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竞争将被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消灭，而为联合体所代替。因为个人管理工业的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因为竞争不过是由个别私有者管理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是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密切联系着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所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說法。所以共产主义者提出废除私有制为自己的主要要求是完全正确的。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64—365页）

假如无产階級不能立即利用民主來實行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證无产階級生存的各种措施，那末，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階級就会毫无用处。这些由現有条件中必然产生出来的最主要的措施如下：

1. 用累进稅、高額遺產稅、取消旁系親屬（兄弟、侄甥等）繼承權、強制公債等來限制私有制。

2. 一部分用国营工业竞争的辦法，一部分直接用紙幣贖买的辦法，逐步剝奪土地私有者、厂主以及鐵路和海船所有者的財產。

3. 沒收一切流亡分子和舉行暴動反对大多数人民的叛亂分子的財產。

4. 組織劳动或者讓无产者在国家的田庄、工厂、作坊中工作，这样就会消除工人之間的相互竞争，并迫使殘存的厂主付出的工資跟国家所付出的一样高。

5. 直到私有制完全廢除为止，对社会的一切成員实行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軍，特别是农业方面的产业軍。

6. 通过拥有国家資本的国家銀行，把信貸系統和銀錢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封閉一切私人銀行和錢庄。

7. 随着国家所拥有的資本和工人數目的增加而增加国营工厂、作坊、鐵路、海船的數目，开垦一切荒地，改进已垦土地的土質。

8. 所有的兒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顧的時候起，由国家机关公費教育。把教育和工厂劳动結合起来。

9. 在国有土地上建筑大厦，作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公民公社将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將結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而避免二者的偏頗和缺点。

10. 拆毀一切不合卫生条件的、建筑得很坏的住宅和市街。

11. 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遺產繼承權。

12. 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 184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第367—368页)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 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 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制是那种建筑在阶级对抗上面, 即建筑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①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方式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用一句话来表示出来: 消灭私人所有制。

有人责备我们共产党人, 说我们要消灭人们亲自获得的、用自己的劳动获得的财产, 消灭那种构成一切个人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

好一个劳动所得的、自力挣得的、用自己的劳动获得的财产! 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所有制吗? 那种所有制用不着我们去消灭; 工业的发展早就把它消灭了, 并且每天都还在消灭着它。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1848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第480页)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机会, 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机会。

有人反驳说, 私有制一旦消灭, 一切活动都会停止, 懒惰之风就会代之而兴。

这样说来, 资产阶级社会应该是早早就因为懒惰而灭亡了, 因

^① 在1888年英文版中, “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改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原编者注

为在这个社会里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所有这一切顾虑，都归结为这样一句同义反复语：一旦没有了资本，也就不会再有雇佣劳动了。

所有这些为对于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筹备，同时又推广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消灭阶级性的所有制，在资产者看来就是消灭生产本身，同样，消灭阶级性的教育，在他们看来，就等于消灭整个教育。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5页）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

.....

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暴力的干涉，即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它们在经济上似乎不够充分和没有效力，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却会越出本身^①，成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

这些措施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在各个最先进的国家里几乎到处都可以采取下面的办法：

^① 在1888年的英文版中，在“越出本身”后面添了“使进一步向旧的社会制度举行进攻成为必要”。——原编者注

(一)剝夺地產,將地租轉充國家支出之用。

(二)征收高額累進稅。

(三)廢除繼承權。

(四)沒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產。

(五)經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到國家手裡。

(六)把全部運輸業集中在國家手裡。

(七)增加國營工廠和生產工具數量,按照總的計劃來開墾荒地和改良土壤。

(八)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成立產業軍,特別是在農業方面。

(九)把農業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之間的差別逐步消滅。

(十)對一切兒童實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取消現在這種工廠童工勞動。把教育同物質生產結合起來等等。

在發展進程中,當階級差別已經消滅和全部生產集中在由各個成員組成的一個團體手裡的時候,公眾的權力就失去自己的政治的性質。原來意義上的政治權力,乃是一個階級用以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如果說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一定要團結成為階級,如果說它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的資格運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係,那末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係的同時,就消滅階級對立存在的條件,就根本消滅一切階級,從而也就一併消滅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

代替那存在着各種階級以及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一個以各個人自由發展為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聯合體。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9—491頁)

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生出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資本主義私

有制，是个人的以本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又以一种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出它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这并不是重建私有制，却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已有的造就——协作，土地与由劳动自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有制——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个人的所有制 (individuelle Eigentum)。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63—1867年，
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64—965頁)

……階級的消滅是以生產達到高度發展階段為前提，那時某一特殊社會階級對於生產資料和生產品的占有，——從而對於政治統治以及教育和精神指導壟斷權的占有，——不但成為多餘，而且是經濟、政治和精神發展上的障礙。這個階段現在已經達到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破產和精神破產，對於它自己也未必是一種秘密了，而它的經濟破產，則經常是每十年重復發生一次。在每次危機發生時，社會在自己的生產力和自己所不能利用的生產品的重壓下呻吟喘息，面對着生產者不能消費是因為消費者不夠的荒謬矛盾而束手無策。生產資料的擴張力毀裂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加的桎梏。生產資料脫出這種桎梏時獲得的解放，乃是生產力不斷和日益加速發展的唯一先決條件，因而也就是生產本身實際上無限增長的唯一先決條件。但還不止如此。生產資料轉歸社會所有，不但會消除掉對於生產的現有人為障礙，而且還會消除掉對於生產力和生產品的直接浪費和毀滅現象，即目前必然伴隨着生產發生而在危機時期則更達到最大規模的浪費和毀滅現象。此外，這種占有制還會消滅現在統治階級及其政治代表的窮奢極欲的浪費，因而為社會節省出大量的生產資料和生產品。通過社會生產，不但有可能給社會一切成員保證豐裕的和不斷改進的物質生活條件，而且還有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才干獲得自由發展和運

用——这种可能性现在是第一次达到了，但它现在是确实已经达到了。

一旦社会掌握生产资料时，商品生产，从而生产产品对于生产者的统治，就将被消除下去。社会生产内的无政府状态，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人的生存竞争停止了。因此，人在这时——在某种意义上是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并从野兽的生存条件过渡到真正人的生存条件。围绕人们并且至今一直统治着他们的生活条件，现在落到受人支配和管理的地位，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真正的和自觉的主宰，因为他们已成为自己社会化生活的主人了。他们自己社会行动的法则，一直是作为异己的、统治着他们的自然界法则而跟他们相对立的，那时则将被人们完全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也就将服从于他们的统治。人们的社会生存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而跟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要成为他们自己的自由事业了。从来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异己势力，现在要受人本身管制了。而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开始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到那时，由他们所发动起来的社会原因才在很大的和日益增长的程度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1877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1955年中文版，第151—152页）

（三）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夺取社会权力，并且运用这个权力把脱出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所有。这样，它就使生产资料摆脱它们先前作为资本所具有的全部属性，而使它们的社会本性能够完全自由发展起来。从这时起，依照预先规定的计划来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颠倒时代的现象。随着社会

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消逝，国家的政治威权也将消亡下去。人既已终于成了自身社会生存的主人，因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1877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1955年中文版，第154页）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可能实现的，在这个制度中，现代的阶级区别将消逝下去，而且在这个制度中——也许要经过一个短期的，不免有些困苦的，但无论如何，在道义上很有益的过渡时期以后，——由于社会全体成员现有巨量生产力有计划的利用和进一步的发展，在大家都同样必须劳动的条件下，生活资料、享乐资料、一切体力和智力所赖以发展和应用的资料，都将愈益充分地交归大家支配。……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莫斯科1955年中文版，第55页）

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者呢？

“共产主义者”是拉丁语源的名词。“共产主义者”一语是导源于“公共”一字。所谓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说：土地和工厂一概是公共的；公共劳动，——这就是共产主义。

（列宁：“青年团底任务”，1920年，“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12页）

三 电气化和共产主义 社会的物质基础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采用拉姆赛的这种能“解放”千百万矿工及其他工人劳动的方法，就能立刻缩短一切工人的工作日，例如从8小时缩短到7小时，甚至更少些。所有工厂和铁路的“电气化”，一定能使劳动条件更合乎卫生，使千百万工人免除烟雾、灰尘和泥垢之苦，能很快地把骯髒的令人厌恶的工作間变成清洁明亮的、适合人工作的实验室。家家户户有了电灯和电气取暖设备，就能使千百万“家庭女奴隶”不再把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消磨在烏烟瘴气的厨房里。

(列宁：“技术的伟大胜利之一”，1913年4月，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9卷，第42页)

小册子(指克尔日札諾夫斯基的“俄国电气化的基本任务”——本书编者)的作者十分正确地选了下面一句格言作为小册子的题词：“蒸气时代是资产阶级的时代，电气时代是社会主义的时代。”我们必须给新的经济建设造成新的技术基础。这个新的技术基础就是电气。……。我们必须让农民看到，电气化将把城乡连接起来，在电气化这种现代最高技术的基础上组织工业生产，就能消除城乡间的悬殊现象，提高农村的文化水平，甚至消除穷乡僻壤那种落后、愚昧、粗野、贫困、疾病丛生的状态。

(列宁：“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1920年2月，“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3页)

……不能再訂一个計劃，不是技术計劃(制訂技术計劃当然需要很多人参加，是不能倉促从事的)，而是政治計劃或者說是国家計劃，即給无产階級规定的任务。

大致內容如下：在十年(五年?)內建立起二三十个(或三十至五十个?)用泥炭、水力、頁岩、煤或石油发电的电站，使全国各地布滿半徑400俄里(或者，至少是200俄里)的发电中心(大致地、粗略地把整个俄国区划一下)。必要的机器和模型現在就要开始購買。在十年(二十年?)內使俄国成为“电气化”的国家。

我想，这样一个“計劃”(我再重复一遍，不是技术計劃，而是国家計劃)，这样一个計劃的草案，你是能够拟訂出来的。

这个計劃要馬上拟訂出来，要通俗易懂，讓群众看到一个光輝灿烂的(而又有充分科学根据的)远景，只要努力工作，一二十年内，我們就可以使整个俄国的工农业电气化。我們將有許多多机器奴隶为我們工作(究竟是几千还是几百万馬力或瓩??这一点誰也不知道)，如此等等。

最好再繪制一张俄国略图，标出各个发电中心和区域的分布情况，也許这还办不到吧?

再說一句，必須讓工人群众和觉悟的农民群众看到一个一二十年的偉大綱領。

(列宁：“致格·馬·克尔日札諾夫斯基”，1920年，
“列宁論重工业的发展和全国电气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0—61頁)

格·馬：我有这么一个想法：

必須宣傳电的常識。怎样宣傳呢？不仅用口头宣傳，而且要用实际例子宣傳。

这怎么說呢？这就是說，最重要的是普及电。因此，現在就必

須拟定一个使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家家有电灯的规划。

要做到这点需要有很长的时间，因为无论电灯（2000万—4000万盏）、电线或其他器材，在很长时间内都会感到不足的。

但是规划还是馬上就需要，尽管它要許多年才能实现。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应当立刻制定一个简单的规划。第三点，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善于发动群众竞赛，发挥群众的主动性，使他們能立即着手工作。

能不能立刻制定一个内容大致如下的规划：

（1）在一年内做到乡乡（10000—15000）有电灯。

（2）在两年内做到村村（50万—100万，也许，不超过75万）有电灯。

（3）首先讓农村閱覽室和工兵农代表苏維埃有电灯（两盏）。

（4）立刻准备电线杆。

（5）絕緣体应立刻自己准备（比如，能否由当地小型的陶器厂来燒制？）。如何如何准备。

（6）制造电线用的銅呢？由各县各乡自行收集（巧妙地暗示利用銅鐘和其他东西）。

（7）电的教育应如何如何进行。

能否考虑和研究这一规划，并发出相应的指示？

（列宁：“致格·馬·克尔日札諾夫斯基”，1920年，
“列宁論重工业的发展和全国电气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5—96頁）

能不能在代表大会閉幕以后（而不是現在）立即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提出一个开展电气化运动的切实计划：

大致如下：

(1) 每县至少要迅速建立一个电站。

(2) 这个电站必须成为进行教育、举办讲座、组织参观等等的中心，并让全体居民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先从青年开始，或按乡进行等等）。

(3) 凡现在可以开始准备的东西，要立刻摊派给居民去收集（铜需要250万普特，立刻摊派2500万普特，让人们自觉地收集铜罐、铜把手等等东西；电线杆等等也可以这样做）。

(4) 立刻开始土方工程，把这项任务摊派给各县。

(5) 把全体工程师、电气技师、数理系毕业生等等都动员起来。他们的义务是：每周至少做2（4？）次讲演，至少要教会10个到50个（？）人懂得电的常识。执行者受奖，不执行者坐牢。

(6) 要赶紧写几本通俗小册子（并且从德文翻译一部分），把你那本“书”，改写成几篇更加通俗的文章，供学校和农民阅读和学习。

关于以下两方面的一些详细办法：

(甲) 宣传教育；

(乙) 立刻从各地开始执行这个计划。

（列宁：“致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1920年，
“列宁论重工业的发展和全国电气化”，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第97—98页）

如果不把俄国推进一步，使它比先前有更高的技术，那就谈不到恢复国民经济，谈不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因为不实行电气化就不能提高工业。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至少需要十年，并且要吸收大批技术人员参加这项工作，他们将向苏维埃代表大会提出一系列文件来详细说明这一计划（列

宁指的是电气化材料汇编。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电气化计划。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向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莫斯科1920年出版。——本书编者)。没有十年的时间，我们就不能实现这个计划的基本部分——建立能把全部工业转移到现代基础上的30个最大的电站区。显然，从大机器生产的条件来看，全部工业不经过这样的改建，社会主义建设就只是一些法令的总和，只是工人阶级与农民在政治上的联系，只是帮助农民挣脱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统治的救星，只是世界各个强国的榜样，而不会有自己的基础的。共产主义是以苏维埃政权这一能使被压迫群众完成各项事业的政治机构为前提的，——否则共产主义便不可想象。

(列宁：“我国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1920年，“列宁论重工业的发展和全国电气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2—93页)

电气化将使俄国得到根本的改造。在苏维埃制度基础上实行电气化，会最终奠定我国共产主义的基础，奠定没有剥削者、没有资本家、没有地主、没有商人的文明生活的基础。

(列宁：“答英国‘每日快报’记者问”，1920年2月，“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6页)

我们知道，如果不恢复工业和农业，并且还不是按旧方式来恢复，那末共产主义社会是建设不成功的。必须在现代最新科学成就的基础上恢复工业和农业。你们知道，这样的基础就是电气化；只有全国一切工业和农业部门都电气化的时候，只有当你们真正担负起这个任务的时候，你们才能替自己建成老一代人所不能建成的共产主义社会。

(列宁：“青年团底任务”，1920年，“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05页)

我们看到，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工作成绩，就是写了这

样一本书，这本书今天或明天就要分发给大家。我希望，你们不会被这本书吓倒。我认为，我不难使你们相信这本书的特殊意义。在我看来，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党纲。

.....

这个党纲不象我们的真正党纲那样不许修改，只有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才能修改。不，这个纲领在每个工厂里，每个乡鎮中天天都会改进、修改、完善和变更。我们需要这个纲领，它是展示在整个俄国面前的第一个草图，它是一个为期不下十年和表明怎样把俄国转到共产主义所必需的真正经济基础上去的伟大的经济计划。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列宁全集”
俄文第4版第31卷，第482—483页）

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否则国家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比资本主义软弱，而且在国内也比资本主义软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把经济基础从小农的变为大工业的。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化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

但是应当知道并且记住，当我们有文盲的时候是不能实现电气化的。所以我们的委员会还应该努力消灭文盲。和过去相比，委员会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和所需要的相比，那就做得很少。劳动人民不但要识字，还要有文化、有觉悟、有教养；必须使大多数农民都能正确地了解我们所面临的任務。这个党纲应当成为各个学校必须讲授的主要课本。在这个党纲中，除了实现电气化的总计划以外，你们还会看到一些为俄国的每个地区制定的专门的计

划。每一个到地方上去的同志，都会得到关于如何实现他那一地区的电气化，如何由黑暗过渡到正常生活的明确的计划。同志们，对于交付给你们的计划可以并且应当在当地加以比较、研究和检验，努力做到在每个学校，每个小组中回答甚么是共产主义这一问题的時候，不仅谈到党纲上已经写好的东西，并且还要谈到怎样才能摆脱黑暗状态。

.....

必须使每一个工厂，每一个电站都变成教育的基地，如果俄国到处都有电站和强大的技术设备，我们的共产主义经济建设就必定成为未来社会主义的欧洲和亚洲的榜样。

(列宁：“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1920年，“列宁论重工业的发展和全国电气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8—110页)

每一个电站和每一个具有起码的设备的工厂和国营农场都应当成为介绍电气和现代工业的中心，成为宣传电气化计划和系统讲授这一计划的中心。应当动员一切受过足够的科学训练或实际训练的人来宣传电气化计划和讲授理解这一计划所必需的知識。

(列宁：“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电气化报告的决议案”，“列宁论重工业的发展和全国电气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1—112页)

电气化的意义

1. 现代技术。
2. 恢复生产力。提高生产力。
3. 集中——maximum。
4. 共产主义 = 苏维埃政权 + 电气化。
5. 统一的总计划：集中人民的注意力和力量。

6. 提高劳动者的文化。

7. 不光是認識字。

(列宁：“关于电气化的几点意見”，1920年12月，
“列宁論重工业的发展和全国电气化”，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4頁)

社会主义的唯一物質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俄国共产党策略的报告大綱(草案)”，1921年6月，“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86頁)

……大机器工业及其在农业中的运用，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經濟基础，只有具备这样的基础，才能进行順利的斗争，使人类摆脱资本主义的桎梏，使千百万人不要因为英国强盗或德国强盗、日本强盗或美国强盗等等夺取瓜分世界的优势而遭到杀戮和殘害。

(列宁：“給全俄电气技師第八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的賀信”，1921年10月，“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頁)

在农村中广泛建立小型电站，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应该坦自地說，这方面往往有些分散，但分散也有一些分散的好处。这些小型电站在农村中形成了新的現代大工业的中心。这些中心虽然很小，但是，它們究竟向农民說明，俄国不会停留在手工劳动上，不会永远使用簡陋的木犁，而会向另一个时代迈进。农民群众会逐渐意識到我們应当而且能够把俄国安置在另一种基础上。……农民群众的覺悟正在提高，其中一部分原因正是我国小电站比大电站增加得快。

(列宁：“全俄苏維埃第九次代表大会”，1921年12月，“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1—142頁)

一个电站也没有的县份，应该尽快地建立电站，即使是小型的也好，使这些电站成为当地进行上述宣传教育（指全俄电气化计划的宣传——本书编者）的中心和鼓舞这方面各种创造精神的中心。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1921年12月，“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2页）

……在恢复大工业方面必须尽速和尽可能地取得巩固的成绩，没有这个条件，就谈不上整个劳动解放事业的成功和社会主义的胜利……

（列宁：“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1922年1月，“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9页）

列宁说“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并不是要说明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将有怎样一种政权，也不是要说明如果我们认真地实行国家电气化，就等于已经实现共产主义了。

列宁讲这句话是要说明什么呢？在我看来，他不过是要说明：要走向共产主义，单靠苏维埃政权是不够的；要走向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必须使国家电气化，使整个国民经济转到大规模的生产；为了达到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决心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列宁的这句名言只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通过电气化走向共产主义。

（斯大林：“答库什特谢夫”，1928年，“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69页）

四 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 可以大大发展

……我們的看法是，創造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那些力量（蒸汽機、現代機器生產、大量的移民、鐵路、輪船、世界貿易等），那些現在由於不斷重復着的商業危機正破壞和徹底消滅資產階級社會的力量，即那些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將來也就完全足以使一切相互關係在短期內變成相反的關係，足以使每個人的生產力大大提高，以至一個人生產的東西可以供二個人、三個人、四個人、五個人、六個人消費；城市工業將來可以不必有充足的人力，而把與以前完全不同的力量調到農業部門去；這時，科學最終也將會在農業中大規模地、象在工業中一樣徹底地加以採用；東南歐和美洲西部天然就極為肥沃的地區將以前所未有的大規模來進行開墾。如果這些地區全部被開墾以後，發生產品不足的現象，那末，還可以有充分的時間來防止這種危險。

（恩格斯：“致弗·阿·朗格的信”，1865年3月29日，
“馬恩書信選集”，俄文版，第172頁）

……只有一個按計劃生產和按計劃分配的自覺性的社會生產組織，才能在社會方面把人們提升到其餘動物之上，也如生產一般已在單純生物學方面提升了他們一樣。歷史的發展使這種組織日益成為必要，也日益成為可能。從這個組織起將開辟一個新歷史時代的紀元，那時人們自身及其活動的一切部門，包括自然科學在

內，將獲得如此巨大的進步，以致使得至今所作出的一切都黯然失色。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一書導言”，1875—1876年，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2卷，莫斯科1955
年中文版，第75頁）

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保證新社會制度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資本主義造成了在奴隸制度下所沒有過的勞動生產率。資本主義可以被徹底戰勝，而且一定會被徹底戰勝，因為社會主義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

共產主義就是利用先進技術的、自願自覺的、聯合起來的工人所創造出來的較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所以異常寶貴，因為它是共產主義的實際開端，而這是極稀罕的，因為我們現時所處的階段，“只是實行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第一步”（如我們黨綱中完全正確地所說的那樣）。

（列寧：“偉大的創舉”，1919年6月，“列寧全集”第29卷，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8—389頁）

五 有計劃地发展生产,充分發揮 地方和群众的創造性

……社会那时就应当考虑,靠它所掌握的资料能够生产些什么,并根据这种生产力和广大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应该把生产提高多少或縮減多少,应该允許生产或限制生产多少奢侈品。但是,为了正确地判断这种关系,判断合理的社会机构的生产力能提高到什么程度,請讀者讀一讀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同时也讀一讀傅立叶的著作。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綱”,1844年1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5頁)

……随着基础的消灭,私有制的消灭,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調节(这种調节会消灭人們对于自己产品的异化关系),供求关系的統治也将消失,人們将使交換、生产以及它們之間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

(馬克思:“德意志思想体系”,1845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俄文第2版,第34頁)

过程(指生产过程——本書編者)愈采取社会的規模,愈失去純粹个人的性質,簿記——当作生产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就愈成为必要。所以,簿記对于資本主义生产,比它对于手工业經營及自耕农經營的分散的生产,更为必要;它对于社会共同的生产,又比它对于資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但簿記費用,会因生产

集中，簿記越是轉化為社會的簿記，而越是減少。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63—1867年，
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45頁）

若我們設想一個非資本主義的社會，那就是設想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貨幣資本就會完全消滅，從而，由此引入的交易上的煙幕也會消滅。問題會簡單還原為：社會必須預先計算，能用多少勞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在某種事業上，而不致有害。例如鐵路的建築。那必須有一個長期間（一年或一年以上）不提供任何生產資料或生活資料，也不提供任何有用的效果，但會從全年的總生產中，奪去很多的勞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63—1867年，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7—378頁）

只有在生產受社會的實際的預先決定的統制的地方，社會才會在被用來生產某種商品的社會勞動時間的範圍，和這種商品所滿足的社會需要的範圍之間，創立聯繫。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63—1867年，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5頁）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廢止以後，但社會化的生產維持下去，價值決定就仍然在這個意義上有支配作用：勞動時間的調節和社會勞動在不同各類生產間的分配，最後，和這各種事項有關的簿記，會比以前任何時候變得重要。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63—1867年，
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16頁）

……每個小孩子都知道，一個民族如果停止工作，——不用說是停止一年，就是只停止幾個星期——就會餓死的。同樣大家也知道，為了要有適合於各種不同需要量的產品量，就需要有不同的

和数量一定的社会綜合劳动量。显而易见，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消灭；所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

（馬克思：“致留·庫格曼”，1868年7月11日，“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1955年中文版，第462頁）

所以，正与民主集中制一点不排斥自治制和联邦制一样，民主集中制不但一点不排斥各地区甚至国家的各社团制定各种国家生活形式、社会生活形式、經濟生活形式的最充分的自由，反而是以这种自由的存在为前提的。把民主集中制同官僚主义和墨守成規混为一談，这是再荒謬不过的了。現在我們的任务正是要把民主集中制貫徹到經濟方面去，保証一些經濟企业如铁路、邮电以及其他运输部門等能在动作的时候步調绝对地整齐一致，同时，从真正民主的意义上来了解的集中制，預先假定了可能（这是历史上第一次造成的可能）充分地、自由地發揮不仅是地方的特点，而且是地方的創举、地方的主动精神和达到共同目的的各种道路、方法与手段。因此組織竞赛的任务有两方面：一方面，組織竞赛要貫徹如上所述的民主集中制；另一方面，組織竞赛就是說有可能发现改組俄国經濟制度的最正确、最經濟的道路。一般說来，这条道路是尽人皆知的，就是过渡到以机器工业为基础的大經濟去，过渡到社会主义去。但是这种过渡的具体条件和形式，必然而且應該依开始建立社会主义时的那些条件的不同而成为多种多样的。地方的特点，經濟结构的特征，生活方式，居民的准备程度，执行某种計劃的企图，——所有这一切都会有力地影响到国家的某一个劳动公社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使之具有特殊性。这种多样性愈繁杂，——当然如果它沒有发展到去标新立异的話——則我們就能愈可靠愈迅速地保証达到民主集中制和实现社会主义經濟。我們当前的唯

一任务就是組織競賽，也就是說，保證一切公開，一切公開，就能使國家的各社團熟悉各地區的經濟發展的情形；其次，保證能比較國家的某個公社和另一個公社向社會主義前進時的成就；第三，保證其他社團有可能實際利用某一個社團創造的經驗，保證有可能互相交換那些在國民經濟或國家管理的相當部門中充分表現出優點的物力和人力。我們備受資本主義制度的壓抑，我們今天甚至不可能確切地想象到，究竟在勞動群眾中，在一個大國的各種各樣的勞動公社中，在那些過去象無聲無息地執行着資本家的指示的死人那樣工作過的知識分子的力量中，蘊藏着多么豐富的力量，我們甚至不可能確切地想象到，在社會主義社會制度之下蘊藏着怎樣的力，和能夠發揮出怎樣的力。我們的任務就是為這些力量掃清道路。

- （列寧：“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一文的初稿”（摘錄），1918年3月，“列寧論工業化”，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6—27頁）

……現在我們特別明顯地見到，馬克思主義該是如何正確地說無政府主義和無政府工團主義系資產階級的思潮，說它們對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主義是處於如何不可調和的矛盾地位。力求將蘇維埃的，即由國家實行統計和監督的思想灌注到群眾的意識中，力求實現這種思想，力求打破養成人們把獲得衣食看作“私人”事情，把買賣看作“只是與我有關”的這種舊時惡習，——這便是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偉大鬥爭，這便是社會主義自覺勢力反對資本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發勢力的鬥爭。我們已將工人監督制定為法律，可是這種制度還剛剛開始浸潤到生活中，甚至還剛剛開始浸潤到無產階級廣大群眾的意識中去。至於在产品之生產與分配方面不實行清算清報制，便會使社會主義幼芽陷於滅亡，……在工人監督還沒有成為事實以前，在先進工人還沒有办好監督事

宜，沒有实行胜利的和无情的进攻动作去反对破坏这种监督或不关心这种监督的人們以前，便不能由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即工人监督）进到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二步，即实行由工人調节生产。

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当它是作为由許多生产消費公社构成的体系，而这些公社都誠实計算自己的生产和消費，节省劳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因而能够减少每日劳动時間到七小时或六小时以至于更少的時間，——只有在这种情形下，它才能产生。在这里，若不办妥对粮食和粮食生产（随后，再对一切其他必需品）实行最严格的，包括一切的全民統計和监督，是不行的。资本主义遺給了我們一种群众組織，能便于我們对产品分配实行广泛的統計和监督，——这就是消費协社。

（列宁：“苏維埃政权底当前任务”，1918年4月，“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85—386頁）

六 共产主义的劳动

傅立叶第一个确立了社会哲学的伟大原理，这就是：因为每个人天生就爱好或者喜欢某种劳动，所以这些个人爱好的全部总和就必然会形成一种能满足整个社会需要的力量。从这个原理可以得出下面一个结论：如果每个人的爱好都能得到满足，每个人都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那末，即使没有现代社会制度所采取的那种强制手段，也同样可以满足一切人的需要。这种论断尽管听起来是非常武断，可是经过傅立叶的论证以后，就象哥倫布豎雞蛋一样，成了无可辩驳的、几乎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傅立叶证明，每个人生下来就有一种偏好某种劳动的习性；绝对懒惰是胡说，这种情形从来未曾有过，也不可能有；人类精神本来就有活动的要求，并且有促使肉体活动的要求；因此就没有必要象现今社会制度那样强迫人们活动，只要给人们的活动天性以正确的指导就行了。接着他确立了劳动和享受的同一性，指出现代社会制度把这二者分裂开来，把劳动变成痛苦的事情，把欢乐变成大部分劳动者享受不到的东西，是极端不合理的。然后他又指出，在合理的制度下，当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兴趣工作的时候，劳动就能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成为一种享受。我在这里当然不能把傅立叶的自由劳动理论全部加以叙述，可是我想上面讲的已足以使英国社会主义者相信，傅立叶主义是完全值得他们注意的。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3年10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8页）

在資產階級社會里，活的勞動不過是增殖已經積蓄的勞動的一種手段。在共產主義社會里，已經積蓄的勞動只不過是擴大、豐富和促進工人的生活過程的一種手段。

所以，在資產階級社會里是過去支配着現在，而在共產主義社會里則是現在支配着過去。在資產階級社會里，資本擁有獨立性和個性，而勞動的個體卻被剝奪了獨立性和個性。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1—482頁）

一個人“在他健康、力氣、活動、技巧和熟練程度的正常情況下”，也需要一定分量的勞動，一定分量地停止空閑，這同亞當·斯密的觀點是根本格格不入的。當然，勞動的分量本身是由外界的情況決定的，即由所要達到的目的和為達到這種目的而用勞動去克服的種種困難決定的。但是，這種克服困難的做法本身，就是自由的實現；其次，這種外在的目的從表面看起來只是一種外在的自然必要性，它被看作是個人本身提出來的目的，即自我實現、主觀的客觀化，因而這是真正的自由，這種自由的表現也就是勞動，——這一點，亞當·斯密也是沒有料想到的。當然，他有一點是正確的：在奴隸、徭役和僱傭勞動等等勞動的歷史形態中，勞動始終是使人感到厭惡的，始終是一種外來強制的勞動，相反地，不勞動才是“自由和幸福”。這在以下兩方面是正確的：一方面，這是一種對抗條件下的勞動；因此，另一方面，這種勞動還沒有給自己創造出主觀和客觀的條件，使它變成一種能吸引人的勞動，變成個人的自我實現，而自我實現也根本不意味着這種勞動純粹是一種消遣，純粹是一種歡樂，不能象博立叶那樣極其幼稚地、按照巴黎輕佻婦女的理解來理解它。其實，自由的勞動，如作曲家的勞動，同時又是一種非常嚴肅的事情，是一種高度緊張的努力。勞動生產的勞動要能

获得这种性质，就只有：(1)它具有社会的性质；(2)它具有科学的性质，它同时又是普遍的劳动，又是人的努力，这种人不是作为经过一定形式训练的自然力，而是在生产过程中不表现为纯粹自然的、天然生长的形态，而表现为进行支配全部自然力的活动的主体……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
莫斯科1939年德文版，第504—505页)

所以，资本家节省生产资料的热情，是可以理解的。是否能够做到一点也不让损失不让浪费，是否能够做到使生产资料只依生产自身必要的方法来消费，一部分是取决于劳动者有怎样的熟练与教育，一部分是取决于资本家曾如何惩戒结合的劳动者。这种惩戒，在劳动者是为自己的计算而工作的社会状态中，就是不必要的，而在现今盛行的计件工资制度中，也几乎全然是不必要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63—1867年，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9页)

当社会掌握全部生产资料，使之可以根据社会的计划来运用它们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直到现在居支配地位的、生产资料对于人的奴役。自然，社会如不把每个人解放，它自己也是不能得到解放的。所以旧的生产方式，应该彻底地被改变，特别是旧的分工应该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它使得一方面谁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供给每人以全面发展并运用自己一切体力智力的可能，它(生产劳动。——译者)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是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从一种重负，变成一种快乐。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8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0页)

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比赛，反而是破天荒第一次造成真正大规模地，真正广阔地运用比赛的可能，吸引真正大多数劳动群众来参加这种使他们能显现自己身手，能发挥自己能力，能表露出自己才干的工作，而才干在民众中乃是取之不尽的泉源，可是资本主义把这才干成千成万以至成百万地压抑、蹂躏和窒息了。

现在当社会主义政府执政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组织比赛。

.....

只有现在才真正使群众有广泛的可能来表现进取心、比赛和大胆倡首精神。赶走了资本家或至少是实行真正工人监督来制裁他的每个工厂，赶跑了地主剥削者并已夺去其土地的每个农村，现在，而且只有现在，才成了使劳动者可以表现自己能力，可以稍为翻身，可以扬眉吐气，可以觉得自己是人的这种活动场所。千百年来都是替别人劳动，替剥削者做奴役式苦工的人，经过了这样的时光之后，现在才第一次有可能来为自己工作，而且是凭靠一切最新技术和文化的成果来工作。

.....

用自为的劳动，即用在全国的（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在国际的，在世界的）巨大范围内有计划有组织劳动来代替奴役劳动，这种伟大更替，除了要用“军事”办法来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之外，还需要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施展出组织上和组织家的巨大努力。组织任务是采用军事办法无情镇压昨日的奴隶主（资本家）及其奴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爷们的任务溶为一体而不可分割的。昨天的奴隶主及其在知识界中的仆仆们总是这样想，这样说：我们从来都是组织者和长官，我们曾号令一切，我们想仍旧当这样的人物，我们不会来听从那些“老百姓”，那些工人和农民的话，我们不会服从他们，我们要把知识变作保护钱囊特权和资本对人民统治

的武器。

資產者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总是这样說着，想着，行動着。从自私自利的观点上看来，他們的行為是很自然的：农奴制地主所豢养的那些食客和寄生虫，戈果里所描写的那些牧师、司書、官吏等类人物，痛恨別林斯基的那些“知識分子”，也“很难”与农奴制分离。可是剝削者及其在知識界中的奴仆們的事业决毫无希望。工人和农民正在打破他們的反抗——可惜还打得不十分坚决无情，——并且一定会打破这种反抗的。

“他們”以为“老百姓”，即“普通”工人和貧苦农民，决办不好社会主义革命所加到劳动群众肩上的那种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真正英勇偉大的組織任务。“沒有我們是不行的”——那些慣于替資本家和資本主义国家效劳的知識分子这样安慰自己說。他們这种厚顏无耻的打算决不会实现：富有学識的人現在就已分化出来，轉到人民方面，轉到劳动群众方面，帮助民众来打破資本仆役們的反抗。而具有組織才能的人物在农民和工人階級中是很多的，这些人材現在剛剛才自觉有力，醒悟起来，趋向于生动的、創造性的偉大工作，独立从事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設事业。

現在最主要任务之一，——如果不是唯一最主要任务的話，——就是要尽量广闊地发展工人以及所有一切被剝削劳动群众在創造性的組織工作中所表現的这种自动倡首精神。无論如何都要打破那种荒謬、粗野、卑鄙齷齪的旧成見，似乎管理国家，管轄社会主义社会的組織建設工作，只有所謂“上等階級”，只有富人或受过富有階級教育的人，才能胜任。

这是成見。支持这种成見的，則是那些腐敗慣例，頑固守旧，奴才习气，尤其是資本家齷齪的私利观念，这些人正是乐于借管理来搶劫，为搶劫而管理。这样不行。工人們一分鐘也不会忘記自

己需要有知識力量。工人們在求知方面表現得非常熱心，又恰恰是在現時，這就證明無產階級對於這一點沒有什麼迷誤，也決不會有迷誤的。可是組織家的工作是凡能識字，善於知人，有實踐經驗的普通工人和農民都可以勝任的。這樣的才幹，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藐視所鄙視的“老百姓”中，是多得很的。這樣的才幹，在工人階級和農民中，乃是取之不盡的泉源，並且是一個最豐富的泉源。

工人和農民還有些“胆怯”，還未習慣到他們現在是統治階級，他們還不夠堅決。革命是不能在畢生都迫於飢餓貧困而不得不在鞭笞威脅下工作着的千百萬人中，一下子就造成這種品質的。可是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正是喚醒着這些品質，打破一切舊障礙，斬斷陳腐的桎梏，把勞動群眾引上獨立創造新生活的大道，十月革命的力量就在這裡，它的生命力就在這裡，它的不可戰勝性也就在這裡。

.....

工人和農民還有些“胆怯”，他們應該免除這種毛病，而他們定會脫掉這種毛病。若沒有有學識的人、知識分子、專門家的意見和指示是不行的。每個多少精明的工人和農民對於這點，都知道得很清楚，我們人中的知識分子決不能抱怨，說工农方面不充分注意他們的意見，對他們的同志尊敬態度不夠。但意見和指示是一回事，組織切實的統計和監督却是另一回事。知識分子往往能提供極好的意見和指示，可是到了要實行這些意見和指示，要真正切實監督來把言論變成事實時，他們却“笨手笨腳”，無力得可笑，無力得可恥，無力得荒謬絕倫。

所以在這一方面，若沒有從“老百姓”出身，即從工人和勞動農民出身的實際組織家的幫助，沒有這些人的領導作用，是無論如何

也不行的。“万事皆人为”，——工人和农民应当把这个真理記得烂熟。……

必須在工农出身的实际組織家們中間組織比賽。应当反对知識分子所爱好的一切死板公式以及想从上面規定統一模型的企图。死板公式和从上面規定統一模型的办法是与民主集中制和社会主义的集中制沒有任何共同之点的。在細則方面，在地方特征方面，在处事方式方面，在实践监督的方法方面，在消灭和制裁寄生虫（富人和騙子，知識分子中的懈怠者和狂人等等等等）的手段方面的多样性，在基本上、根本上、主要問題上，不仅不会破坏統一性，反而会保證統一性。

巴黎公社作出了把自下的首倡、主动精神、自由机动、宏伟毅力和那自愿实行而与死板公式絕不相容的集中制互相配合起来的偉大模范。我們的苏維埃現在也是遵循着这种道路。可是它們还有些“胆怯”，还没有开展自己的能力，还没有“浸入”到自己建立社会主义秩序的新的偉大創造工作中去。必須使各地苏維埃更大胆、更有主动精神地来从事工作。必須使每个“公社”——每个工厂，每个乡村，每个消費协社，每个供給委员会都能来实际組織对劳动和对产品分配的統計与监督，都能在这方面互相比賽。这种統計和监督的綱領是簡單明了，誰都懂得的：就是要使每个人都有面包吃，每个人都不穿坏鞋子和破衣服，都有温暖的住宅，誠实工作，使任何一个騙子（其中也包括不愿作工的懶汉）都不致逍遙法外，而是坐在牢獄里，或受到最苦重的强迫劳动的处分，使任何一个违反社会主义規則和法令的富人都不會逃脫騙子所遭受的命运，而这种命运照道理也是富人所應該遭受的。“不劳动者不得食”——这就是社会主义实践的訓条。这就是要在实践上办好的事情。我們的“公社”，我們由工农出身的組織家，尤其是知識分子

出身(其所以說尤其,是因為他們太慣于, 过分慣于以自己的普泛指示和決議案自豪)的組織家, 若有這樣的實踐成績是應自豪的。

各公社和城鄉小支部, 都應當自動制定出成千成百的對富人、騙子和懶漢作實際統計和監督的方式與辦法, 並在實踐中把它們試驗好。在方式與辦法方面的多樣性, 是生命力的保障, 是勝利地達到共同一致目標的保證, ……

究竟在哪一個公社里, 在大城市中哪一個街坊里, 在哪一個工廠里, 在哪一個鄉村中, 已經沒有飢餓者, 沒有失業者, 沒有富足的懶漢, 沒有資產階級奴仆中的惡徒以及自稱為知識分子的怠工者; 哪里對於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事情作得多些; 哪里多給窮人建造了良好的新房屋, 多把窮人安置到富人房屋里去居住; 哪里對於正常供給貧家每個小孩一瓶牛奶的事情作得多些; ——正是在這些問題上, 各公社、村社、消費生產協社、共耕社和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應當開展比賽。正是在這種工作上, 組織家的才干應當實際顯現出來, 並應提拔這種人才去參加全國範圍的管理事業。組織家的人才在民眾中是很多的。不過他們被壓抑住了。應該幫助他們發揮起來。

(列寧: “怎樣組織比賽”, 1918年, “列寧文選”兩卷集
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第305—313頁)

學習作工, 這是蘇維埃政權應該向民眾盡量提出的一個任務。資本主義在這方面的最新發明, 即太羅利制——也和資本主義其他一切進步一樣——包含着兩種成分, 一種是資產階級剝削的最巧妙的殘酷手段, 另一種是許多最豐富的科學成就, 即按科學來分析勞動中的體力動作, 消除多余的笨拙的動作, 制定最精確的工作方法, 實行最完善的統計和監督制等等方面所獲得的成就。蘇維埃共和國, 在這方面無論如何都要採用科學和技術上一切有

价值的成就。社会主义实现的程度如何，正是要靠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与资本主义最新进步相结合这方面的成功来决定。应该在俄国研究与教授泰勒制，有系统地试行这个制度并使它适应于我国条件。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4月，“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89—390页）

模范的生产工作，模范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对取得和分配每普特粮食所表现的模范的关心和诚实，模范的食堂，某个工人住房和某个街区的模范的清洁卫生工作，——这一切是我们的报刊和每个工农组织应当比现在更加十倍注意和关心的对象。所有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幼芽，照顾这些幼芽是我们共同的和首要的义务。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91—392页）

要实现共产主义，绝对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把劳动最高度地最严格地集中起来，这就要首先克服工人在职业上和地区上的散漫性和分散性，因为这种散漫性和分散性是资本有力量和劳动没有力量的根源之一。反对行会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反对行会的利己主义的斗争是与消灭城乡对立的斗争紧密联系着的，进行这一斗争有很大的困难，如果不预先大力提高人民的劳动生产率，要广泛地开展这一斗争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还是应该立即着手进行这一工作，开始时不妨在地方的小范围内试办，以便把各行业各地区要采取的各种不同的措施的效果加以比较。苏维埃政权应当采取比以前更广泛更有系统的办法，在工会的参加下，动员所有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来完成一定的社会工作。

（列宁：“共（布）党纲草案”，1919年2月，“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1页）

工人自己发起和組織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具有极大的意义。显然,这还只是开端,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开端。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因为这是战胜自身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这是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遺留給工农的习惯。当这种胜利巩固起来时,而且只有那时,新的社会紀律、社会主义紀律才会建立起来;只有那时,退回到资本主义才不可能,共产主义才真正是不可战胜的。

(列宁:“偉大的創举”,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73頁)

我极詳尽地引証了关于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資料,因为这无疑是共产主义建設事业的极重要的一面,对于这一面,我們的报刊沒有充分注意到,我們大家也还没有作出足够的估計。

少唱些政治高調,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的、被生活檢驗过的共产主义建設事实——我們全体,我們的作家、鼓动員、宣傳員、組織員等等都应该不倦地重复这个口号。

在无产阶级革命后的初期,我們首先忙于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战胜剝削者,击破他們的阴谋(如黑帮、立宪民主党人以至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参加过的企图出卖彼得格勒的“奴隶主的阴谋”),这是必然而不可避免的。但除了这个任务以外,同样不可避免地要提出(愈往前去就愈要提出)建設共产主义、創造新的經濟关系、建立新社会这一更重要的任务。

我曾屢次指出,例如三月十二日我在彼得格勒工兵农代表苏維埃會議上講話时就曾指出,无产阶级專政不只是对剝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这种革命暴力的經濟基础,它富有生命力和必获胜利的保証,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劳动組織。实質就在这里。共产主义力量的泉源

和必获全胜的保证就在这里。

农奴制的社会劳动组织靠棍棒纪律来维持，劳动群众极端愚昧，备受压抑，横遭一小撮地主的掠夺和侮辱。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靠饥饿纪律来维持，在最先进最文明最民主的共和国内，尽管资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民主有很大的进步，但极大多数的劳动群众仍旧是一群愚昧无知的雇佣奴隶或贫苦农民，备遭一小撮资本家的掠夺和侮辱。共产主义(其第一步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则靠推翻了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来维持，而且愈往前去就愈要靠这种纪律来维持。

这种新的纪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出自善良的愿望，它是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物质条件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成长起来。没有这种物质条件就不会有这种纪律。代表这种物质条件的是大资本主义所创造、组织、团结、训练、自发和锻炼出来的一定历史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历史学的、哲学的、科学的拉丁名词译成普通话，那就是说：

在推翻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推翻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的和一般工厂的工人，即产业工人，才能领导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我们要顺便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科学区别，只在于前者是从资本主义中生长起来的新社会的第一阶段，后者是这个新社会的更高的阶段。)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0—382页)

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

所創造出來的較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所以異常寶貴，因為它是共產主義的實際開端，而這是極稀罕的，因為我們現時所處的階段，“只是實行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第一步”（如我們黨綱中完全正確地所說的那樣）。

普通工人起來克服極大的困難，奮不顧身地設法提高勞動生產率，設法保護每一普特糧食、煤、鐵及其他產品，這些產品不歸勞動者本人及其“近親”所有，而歸他們的“遠親”即歸全社會所有，起初聯合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然後聯合為蘇維埃共和國聯盟的千百萬人所有，——這也就是共產主義的開始。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諷笑了資產階級民主制的自由人權大憲章的浮華辭藻，諷笑了所有關於一般自由平等博愛的美麗辭句，這些辭句迷惑了各國的市儈和庸人，迷惑了現在的卑鄙的伯爾尼國際的卑鄙英雄們。馬克思用無產階級的平凡的、質樸的、實在的、日常的問題提法來和這種堂皇的人權宣言相對立。由國家縮短工作日，就是這種提法的標本樣式之一。無產階級革命的內容愈展開，馬克思意見的全部正確性和深刻性在我們面前也顯得愈清楚，愈透徹。真正共產主義的“公式”與考茨基派、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及伯爾尼國際中他們的親愛“兄弟們”的華麗、圓滑、堂皇辭藻不同的地方，就是這種“公式”把一切歸結於勞動條件。少談些什麼“勞動民主”，什麼“自由、平等、博愛”，什麼“民權”等等空話吧。現代有覺悟的工人和農民從這些夸大的詞句里，是不難看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欺詐手腕的，正象每個有生活經驗的人，望見“善良君子”極“光滑的”面貌和外表，就能一下子正確地斷定他“大概是個騙子”。

少說些漂亮話，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多關心每一普特糧食和每一普特煤吧！多設法使飢餓的工人和襁褓的農民所必需的每一普

特粮食和每一普特煤，不是用投机买卖或资本主义方式获得，而是象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粗工和铁路员工一样用普通劳动者自觉自愿的奋不顾身的英勇工作来获得。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8—390页）

为了取得胜利，为了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解决双重的或二位一体的任务：第一、用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的无限英勇精神吸引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鼓舞他们，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去推翻资产阶级和完全粉碎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第二、把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以及所有小资产阶级引上新的经济建设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新的劳动组织的道路，这种劳动组织把科学和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果同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的普遍联合结合起来。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4—385页）

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那时人们从事劳动都是由于觉悟到必须为共同利益而工作。

（列宁：“在农业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9年，“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4—175页）

我们所谓共产主义是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习惯于履行社会义务而不需要特殊的强制机关，不拿报酬地为大家工作已成了普遍的现象。显然，在刚刚采取措施来彻底战胜资本主义的人看来，“共产主义”还很远很远。……如果把采取“共产党”这个名称解释为现在正在实现共产主义制度，那就会是极大的歪曲，那就会造成从事无谓的吹牛的实际害处。

正因为这样，对待“共产主义”这个词要十分审慎。也正因为

这样，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見諸于实践后就有了特殊的价值，因为就在这种极小的事情中开始出现了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

（列宁：“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1919年，“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2—253頁）

在我們經濟制度中暂时还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东西。“共产主义的东西”只是现在在星期六义务劳动出现的时候才开始产生的，在这种时候，没有任何政权、任何国家来规定定额，而每个人都来为社会进行规模巨大的无报酬的劳动。这不是农村中常见的邻舍间的帮忙，而是为了全国需要进行的、大规模组织起来的、无报酬的劳动。因此，不仅把“共产主义”这个词用做党的名称，而且把它专门用来指我們生活中真正实现着共产主义的那些经济现象，是会更正确一些的。要说在俄国现在的制度中也有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那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其他都不过是为反对资本主义和巩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社会主义只有完全取得胜利以后，才会生长出共产主义，生长出我們从星期六义务劳动中看到的那种不是书本上的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当中的共产主义。

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原则意义就是如此，它表明这里正在产生、正在开始产生一种崭新的、违反资本主义旧有的一切惯例的东西，一种比战胜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更高级的东西，即广泛组织起来以满足全国需要的无报酬的劳动。

（列宁：“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1919年，“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4—255頁）

从原则上来看，除了星期六义务劳动以外，我們再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表明我們不仅叫做共产党员和想做共产党员，而且真正在实现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不只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愿意忠实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人，都应该拿出全

部精力来解释这个运动和实际进行这个运动。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原则意义就是如此,因此,每一个党代表会议都必须提出这个问题,并根据理论和实践来讨论这个问题。

(列宁:“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1919年,“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5—256页)

义务星期六的目的和任务:

(1)义务星期六是宣传义务劳动制和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的形式之一。

(2)义务星期六应当成为共产主义劳动形式的实验室。

(3)义务星期六首先应从特别重要和紧迫的工作开始。

(4)在义务星期六间的工作量应不低于规定的定额,而义务星期六参加者应争取超额完成这种定额。

(列宁:“对义务星期六条例草案的补充”,1920年,“列宁文集”第24卷,1933年俄文版,第203页)

共产主义劳动,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为社会造福的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不是为了享有取得某种产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没有报酬条件的劳动,是根据为公共利益劳动的习惯、根据必须为公共利益劳动的自觉要求(这已成为习惯)来进行的劳动,这种劳动是健康的身体的自然需要。

大家都明白,我们,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制度,还远不能广泛而真正普遍地实行这种劳动。

但是提出这个问题,整个先进无产阶级(共产党和工会)和国家政权提出这个问题,就已经是在这条路上前进了一步。

要成就一件大事业,必须从小事做起。

另一方面，“大事业”成功之后，推翻资本家私有制并把政权交给无产阶级的政治变革实现之后，要在新基础上建设经济生活，又只能从一点一滴做起。

星期六义务劳动、劳动军、劳动义务制，——这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劳动与共产主义劳动的各种具体方式。

（列宁：“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1920年4月，“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75页）

改造一切劳动的习惯和风气是几十年的事情。我们要互相提出庄严的和坚决的保证，我们准备忍受任何牺牲，我们将在这反对习惯势力的最艰难的斗争中挺住并坚持下去，我们将双手不停地工作几年以至几十年。我们要努力消灭“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诅咒的常规，克服那种认为劳动只是一种负担，而凡是劳动都应当付给一定报酬的习惯。我们要努力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灌输到群众的思想中去，变成他们的习惯，变成他们的生活常规，我们要逐步地坚持不懈地实行共产主义纪律，推行共产主义劳动。

（列宁：“从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到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1920年5月，“列宁全集”第31卷，俄文第4版，第103页）

有时有人说：既然有了社会主义，为什么还要劳动呢？从前劳动，现在还劳动，难道还不到不劳动的时候吗？同志们，这种说法是根本不正确的。这是懒汉的哲学，而不是诚实的劳动者的哲学。社会主义决不否认劳动。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是建筑在劳动上的。社会主义和劳动是彼此分不开的。

我们的伟大导师列宁说过：“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什么意思呢？列宁的话是反对什么人的呢？是反对剥削者，反对那些自己不劳动而强迫别人劳动，靠剥削别人发财致富的人的。还反对

什么人呢？还反对那些好逸恶劳，想靠别人养活的人。社会主义需要的不是好逸恶劳，而是所有的人都诚实地劳动，不是为别人劳动，不是为富豪和剥削者劳动，而是为自己、为社会劳动。

（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33年2月19日，“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23页）

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第二个泉源，就是我国已没有剥削现象了。我国的人不是替剥削者做工，不是替不劳而获者做工生财，而是为自己做工，为自己的阶级做工，为自己这个由工人阶级优秀分子掌握政权的苏维埃社会做工。正因为如此，所以劳动在我国有着社会的意义，它是一件光荣体面的事情。在资本主义下，劳动是私人个人性质的劳动。你做得多些么，那就让你多赚些钱去过你自己的生活吧。谁也不知道你，而且谁也不愿意知道你。你是替资本家做工么，你是替他们生财么？又怎能不是这样呢？人家雇佣你，也就是要你去替剥削者生财哩。你不愿意这样干么，那就请你滚到失业工人队伍中去苟延残喘吧，而我们是随时都能雇得其他的更驯服的工人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资本主义下，人的劳动是不受重视的。在这种条件下，当然不会有什么斯达汉诺夫运动发生。可是，在我们苏维埃制度条件下，却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这里，劳动者是备受尊敬的。在这里，他并不是替剥削者做工，而是为自己做工，为自己的阶级做工，为社会做工。在这里，劳动者不会觉得自己是个无人过问的人，零丁孤苦的人。恰巧相反，在我们这里，劳动者觉得他是自己国家中的自由公民，是一种社会活动家。他好好做工，尽力效劳社会，就是一位劳动英雄，就会荣光遍体。显然，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有斯达汉诺夫运动诞生出来。

（斯大林：“在第一次全苏联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会议上的演说”，1935年11月，“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84—785页）

七 劳动時間的縮短

……其实我們可以設想，在这样的組織（指共产主义社会对劳动力的合理組織——本書編者）下，由于利用了現在完全沒有利用的或者利用得不够恰当的劳动力，每个人的一般工作時間就会比現在縮短一半。

（恩格斯：“在愛北斐特的演說”，1845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12頁）

假定进行集体生产，确定時間自然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社会用来生产小麦和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時間愈少，用来进行其他的生产——物質和精神的生产的時間就愈多。無論是个个人，無論是社会，其发展、需求和活动的全面性，都是由節約時間来决定的。一切节省，归根到底都歸結为時間的节省。每个人应当合理地支配自己的時間，以便获得应当具备的各方面的知識或者滿足对他的活动的各种要求，同样的，社会也应当适当地支配自己的時間，以便达到那种适应于它的整个要求的生产。因此，节省時間以及在各个生产部門中有計劃地分配劳动時間，就成了以集体生产为基础的首要的經濟規律。这甚至是极其高級的規律。但这和用劳动時間来測定交换价值（劳动或劳动产品）有本質的區別。同一个劳动部門中每个人的劳动和各种各样的劳动，不仅在数量上不同，而且在質量上也不同。各种物品的純数量上的差別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它們的質量上的同一性。也就是从数量上測定劳动。

它的質量的同類性，同一性。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之一“貨幣論”，
“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4卷，第117—119頁)

增加的勞動生產力與增加的勞動強度，從一方面說，有相同的結果。它們都會增加一定時間內取得的生产物總量。因此，二者都會把勞動者生产他的生活資料或其等價所需的勞動日部分縮短。勞動日的絕對的最小界限，一般說，是由這種必要的但能夠壓縮攙來的勞動日部分形成。把全勞動日壓縮到這個界限，以致剩餘勞動消滅的事情，在資本制度之下是不可能的。資本主義生产形态的廢除，才允許勞動日限制到必要勞動的程度。但這時候，要是其他各種事情不變，必要勞動的範圍就會擴大。一方面，因為勞動者的生活條件將會成為更豐富的，他的生活要求將會成為更大的。另一方面，現在剩餘勞動的一部分，到那時，會算作必要勞動。那就是，成為社會準備基金與積累基金形成上必要的勞動。

勞動生產力愈增加，勞動日便愈能縮短；勞動日愈縮短，勞動強度便愈能增加。從社會的觀點來考察，勞動生產率隨它的經濟一同增進；這種經濟，不僅包含生产資料的經濟，且包含一切無用勞動的避免。資本主義生产方式，雖然一方面在各個營業內部厲行經濟，同時又由它的無政府的競爭制度，造成社會生产資料與勞動力的最無限制的浪費，並引起種種機能，那在今日雖然是必不可缺少的，但就其自体說，是多餘的。

在勞動強度與勞動生產力不變的時候，勞動越是均等地分配于社會一切有工作能力的成員間，一個社會階層越是不能把勞動的自然必要性，由他自己轉嫁于別人，社會勞動日中必須用來从事物質生产的部分就會越是縮小，個人从自由活動，精神活動，和社會活動的時間部分就會越是增大。從這方面看，勞動日縮短的

絕對的界限，就是勞動的普遍化。在資本主義社會，一個階級的自由時間，是由社會大眾全部生活時間轉化為勞動時間這件事，生出來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63—1867年，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50—651頁）

……一般地說，那總必然是剩餘勞動，是超過一定需要程度以上的勞動。它在資本主義制度內，和在奴隸制度等等內一樣，只有一個對抗的形態，並且要由社會一部分人的完全游惰而無所事事來作為補充。為了要對意外的事變有所保險，為了要有必要的，和需要發展及人口增加相適應的累進的擴大再生產（從資本主義的觀點說，那是叫做積累），一定量的剩餘勞動是必需的。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依一種方式，在各種條件下，把這種剩餘勞動強取出來，以致和以前的奴隸形態，農奴形態等等相比較，可以更有利於各種生產力的發展，更有利於社會關係的發展，並且更有利於各種為一個高級新形態作準備條件的要素的創造。所以，資本一方面會引導到一個階段，在那裡，社會一部分犧牲別一部分而實行強制并獨占社會發展（包含它在物質方面和知識方面的利益）的情形會消滅；另一方面，它又為這各種關係創造物質的手段和萌芽，它們在一個高級社會形態內，允許這種剩餘勞動，和從事物質勞動一般所需時間的較大的縮短，結合在一起。因為，看勞動生產力是怎樣發展，剩餘勞動可以在小的總勞動日內成為大的，在大的總勞動日內成為較小的。如果必要的勞動時間=3，剩餘勞動=3，則總勞動日=6，剩餘勞動的比例=100%。如果必要勞動=9，剩餘勞動=3，則總勞動日=12，剩餘勞動的比率只=33⅓%。然後，在一定時間內，從而在一定的剩餘勞動時間內，究竟有多少使用價值被生產，也看勞動的生產率而定。社會的現實財富，和社會再生產過程

不断扩大的可能性,不是依存于剩余劳动的大小,而是依存于它的生产率和它所借以进行的丰度大小不等的各种生产条件。事实上,自由的领域,是在必要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开始的。依照事物的性质,那就是在狭义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未开化人为要满足他的需要,为要维持并再生产他的生命,必须与自然相斗争;同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并且,在一切社会形态内,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内,他都必须这样做。他发展了,这个自然必然的领域会跟着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同时,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也会扩大。在这个范围内,自由不过能够在这一点上面形成:社会化的人,共同结合的生产者,会合理规律着他们和自然间的物质变换,把它放在他们的共同管理下,不讓它当作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他们,但用最少的力量的支出,并在最与人性适合也最光荣的条件下,把它实行。但这个领域,总归是一个必然的领域。在这个领域的彼岸,把本身当作目的的人力发展,真正的自由领域,方才开始。并且这个自由领域,也只有在那个当作基础的必然领域上,方才可以繁荣起来。劳动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63—1867年,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72—1074页)

所有这些,现在已不是什么幻想、什么虔诚的愿望。在近代的生产力的发展之下,只要有生产力社会化所引起的那种生产的增加,只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妨害和扰乱,消灭它所造成的生产品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只要这样,就足以使工作时间,在大家参加劳动的情况下,减到非常短促的——就现在眼光看来——程度。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8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0页)

如果一切人都必须劳动,过度劳动和游惰的对立消灭了——

如果資本不在了，生产物不复給予对于他人剩余劳动的要求权，結果就必定会是如此——并且，如果把資本所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加在考察中，社会6小时内生产的必要超过額，比現今12小时内生产的，将会更多，同时，一切（劳动者，还会）有6小时的“由他們支配的时间”，即真正的富；这种时间，不由直接生产的劳动吸收，但（可以游离出来）供他們享受，供他們安享，从而，使他們有自由活动和发展的余地。时间便是能力等等的发展地盘。人們知道，經濟学家也曾由如下的理由，来辯护工資劳动者的奴隶劳动：即，这种奴隶劳动，会为別一些人，为社会的別一个部分，从而，为工資劳动者的社会，創造安逸，即創造自由的时间。

或者，它也能包含这样的意思：劳动者現今要在再生产他自身現今必要的时间以上，再劳动6小时（但以后就不必劳动更多的时间）。如果資本消灭了，劳动者将会只劳动6小时，游惰者也必須同样劳动。所以，一切人的物質財富，都将由此被压下，而落到劳动者（現在）的水平。但一切人都有发展自己的自由时间。这似乎不会是著者的見解，因为他是把劳动者現在必要的时间，看做是非人道的最低限。

关于这点，著者自己分明是不明白的。但無論如何，这个美丽的命題总是保存着。“一个国家是真正富裕了，如果不要劳动12小时，只要劳动6小时。富就是人所支配的时间，不是别的什么”。

里嘉图在論“价值与富”那一章也說，真正的富是这样成立的：即，由尽可能少的价值，創造出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来；換言之，是由这样成立：即，在尽可能短的劳动时间内，在物質財富上，創造出尽可能大的超过額来。在这里，“人所支配的时间”和他人劳动时间内創造出来的享受，也表現为真正的財富，但象一切在資本主义生产上出現的东西一样，是表現在对立性上。富和价值的对立性，

在里嘉图的場合，后来是表现在这个形态上：即，純收入，和总收入相比，应求其尽可能的大。这又在这个对立的形态上，指示了：其時間只一部分或全然不被吸收在物質生产上但会享受物質生产的結果的社会諸階級，和那些其全部時間被吸收在物質生产上但其消費只成为生产成本上一个項目，只成为这种劳苦动物得以生存的条件諸階級相对而言，应尽可能成为多数的。社会常常被希望只有尽可能最小的部分，被判定要成为劳动奴隶，要从事强制劳动。但从資本主义的观点看，这也就是能够达到的最高点了。

我們的著者把这一层發揮了。就是交換价值废止了，劳动的時間也依然是富的創造的实体，是生产所必要的成本的尺度。但自由的時間，人所支配的時間，就是富自身——一方面为生产物的享受，一方面为自由的活动。这种自由的活动，不象劳动一样由外在目的的强制所决定。劳动是必須履行的，其履行是自然的必然性，或如人們所說，是社会的义务。

不待說明，已經明白，只要劳动時間被限制在一个正常的标准上，只要那不是为別一个人做，而是为我自己做，同时，主人和奴隶等等的社会对立性又废止，这种劳动時間，当作现实的社会劳动，当作自由時間的基础，就将会取得一个完全不同的自由的性質。一个有自由時間的人的劳动時間，比劳动兽类的劳动時間，有更高得多的品質。

(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史”第3卷，1861—1863年，
三联書店1949年版，第297—299頁)

泰罗制(逕自違背它的創始人的本意)准备着这样一个时代的来临：无产階級把全部社会生产掌握在自己手中，指定工人自己的委員會去合理地分配并調整全部社会劳动。大生产、机器、铁路、电话——所有这一切将有无限的可能性把組織起来的工人的工作

時間縮減為現在的四分之一，並保證他們享受到等於現在四倍的福利。

社會勞動一旦從資本的奴役下解放出來，工人委員會就會在工人聯合組織的幫助下，實行這種合理地分配社會勞動的原則。

（列寧：“泰羅制是機器對人的奴役”，1914年3月，
“列寧論勞動”，工人出版社1956年版，第285頁）

八 科学技术的发展再不受到限制

……共产党人必须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的关系下，已经取得的工艺学上的真理才能在实践中实现。……

（注：马克思的这封信没有保留下来，引文摘自1851年6月1日丹尼尔斯给马克思的回信）

（马克思：“给罗特兰·丹尼尔斯的信”，1851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1936年俄文第一版，第91页）

……对于资本，机器的使用必须为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的差所限制。劳动日分为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分割，是一国和一国不同的；在同国，又是一时期和一时期不同的；在同时期，又是一职业部门和一职业部门不同的。并且，劳动者的现实工资，有时会跌在他的劳动力的价值以下，有时会高到以上。机器的价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格二者之差，仍然可以大有变化；就令生产机器所必要的劳动量和它所代替的劳动总量二者之差仍旧不变。（第2版注。——所以，机器在共产主义社会的使用范围，和它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使用范围，是完全不同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74页）

他们觉得，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使他们摆脱神甫的统治，才能使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成人民的力量，才能使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奴仆、从自私自利的国家寄生虫、从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

由的脑力劳动者！只有在劳动的共和国中，科学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1871年，“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3卷，俄文版，第343页）

……只有一个按计划生产和按计划分配的自觉性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们提升到其余动物之上，也如生产一般已在单纯生物学方面提升了他们一样。历史的发展使这种组织日益成为必要，也日益成为可能。从这个组织起将开辟一个新历史时代的纪元，那时人们自身及其活动的一切部门，包括自然科学在内，将获得如此巨大的进步，以致得使至今所作出的一切都黯然失色。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书导言”，1875—1876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75页）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科学摆脱资产阶级的桎梏，摆脱资本的奴役，摆脱对卑污的资本主义私利的奴隶地位。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根据科学的见解来广泛推行并且真正支配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那就是如何做到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的生活，使他们有可能享受物质福利。

（列宁：“1918年5月26日在第一次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27卷，俄文版，第375页）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因而，不是保证最大限度的利润，而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不是带有从高涨到危机以及从危机到高

漲的間歇状态的生产发展,而是生产的不断增长;不是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而来的技术发展中的周期性的間歇状态,而是生产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不断完善。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1952年,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36頁)

在教科書未定稿中說:“在苏联,在机器能給社会节省劳动的一切場合下,都是使用机器的。”这完全不是应有的說法。第一,机器在苏联总是給社会节省劳动的,因此在苏联的条件下机器不給社会节省劳动的情形是根本沒有的。第二,机器不仅节省劳动,而且同时还減輕工作人員的劳动,因此,与資本主义的条件不同,在我国的条件下,工人是极乐意在劳动过程中利用机器的。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1952年,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9頁)

九 彻底消灭人力物力的浪费

在现在的社会里，人力的更大浪费表现在有钱人滥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上。我根本不打算在这里谈那种仅仅为了炫耀自己而占用了许多劳动力的、无益的、简直是荒唐的浪费现象。但是请你们去看一下富翁的公馆、富翁的内室，然后告诉我，许多人服侍一个人，因而弄得无事可干，或者至多也只做些由于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中而必须做的工作，这难道不是劳动力的荒唐的浪费。所有这些女仆、厨子、听差、车夫、家人、园丁等等到底干些什么呢？一天只有那么少的几分鐘他们是真正用来使他们的主人生活得愉快，使他们的主人易于自由地发挥和利用自己的人的特性和才能；一天又有多少鐘点他们是用来做下面这些仅仅由于我们的社会关系安排得不好而产生的事情，这就是站在馬車的侍从座上，满足主人的癖好，牽着只小狗跟在主人后面，以及其他各种可笑的事情。在合理地組織起来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能够生活，他们不再成为老爷們的癖好的奴隶，而且也想不到这些癖好。在这样的社会里，目前浪费在服侍人們过奢侈生活的劳动力自然就轉而为大家造福，为劳动者自己造福。

.....

諸位先生，你們想一想上面所談的一切（我还可以举出許多別的例子來說明現代社会如何浪费劳动力），你們就会发现人类社会拥有极其丰富的生产力，这些生产力只要合理地組織起来，妥善地

加以調配，就可以給一切人帶來最大的利益。根據這一切，你們就可以斷定，擔心公正地分擔社會活動以後每個人的勞動負擔就會大得使他不可能去做別的事情，那是多么沒有根據。其實我們可以設想，在這樣的組織下，由於利用了現在完全沒有利用的或者利用得不够恰當的勞動力，每個人的一般工作時間就會比現在縮短一半。

但是共產主義的組織因利用目前被浪費的勞動力而表現出的優越性還不是最重要的。把個別的力量聯合成社會的集體力量，以從前彼此對立的力量的一種集中為基礎來安排一切，才是勞動力的最大的節省。在這裡，我贊成英國的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的一些主張，因為這些主張最實際、最完善。歐文提議建造一些大公寓來代替現在那些房屋分散而且彼此妨礙的城市和村莊。每一公寓占地長寬各約一六五〇英尺，附有大花園，可以舒適地居住兩三千人。顯而易見，建造這種能使住戶享受現代最好的住宅設備的房屋，比起為同樣多的人建造單獨的、多半沒有那麼舒適的現有式樣的住宅來，要便宜得多和容易得多。現在幾乎每幢大廈都存在的許多房間常年空着或者每年只使用一兩次的現象就可以消滅，而且不會有任何不方便；儲藏室和地下室等等的用地也同樣可以大大節省。要是深入地看一下家務瑣事，那末公共經濟的優越性就表現得特別明顯。現在的分散經濟，就拿取暖來說，不知浪費了多少勞動和物資！每一個房間必須有一個火爐，每一個火爐必須分別生火、添煤和照顧；必須把燃料送到每一個房間，而爐灰還得加以清除。可是象目前的一些大的公共建築物，如工廠、教堂等，裝置一個巨大的總的取暖設備，比如說，用一個發熱中心和一些蒸氣管子來代替這些單獨的火爐，是多么簡單和便宜。其次，瓦斯燈目前費用還很貴，因為連最細的管子也得敷設在地下，而管子又因為

我們城市里需要照明的面积很大,必須敷設到很远的地方。可是,如果象上面所說的那樣来安排这一切,所有一切就都集中在一六五〇英尺見方的地面上,而瓦斯灯的数目并不会减少,結果,这种照明的費用無論怎样也不会比一个中等城市所花的費用更多。再其次,我們拿做飯來說,在現在这种分散經濟的情況下,每一个家庭都单独准备一份自己所必需的、分量又不多的飯菜,单独备有餐具,单独僱用廚子,单独在市場上、在菜場里向肉商和面包商購買食品,这白白占据了多少地方、浪費了多少物品和劳动力!可以大胆地假設,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务所,从事这一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就会很容易地解放出来,而其余的三分之一也能够比現在更好、更專心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最后,看看收拾房屋的工作吧!要是这些工作也組織起来和正确地加以分配(在那种条件下这是完全可能實現的),那末打扫和收拾这种建筑物难道不比打扫和收拾两三百幢单独的房屋容易万倍嗎?而象現在这样安排,两三百幢房屋中住的人也就不过两三千人呵。

(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說”,1845年2月8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10—613頁)

……生产資料轉归社会所有,不但会消除掉对于生产的現有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掉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品的直接浪費和毀灭現象,即目前必然伴随着生产发生而在危机时期則更达到最大規模的浪費和毀灭現象。此外,这种占有制还会消灭現在統治階級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浪費,因而为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資料和生产品。通过社会生产,不但有可能給社会一切成員保証丰裕的和不断改进的物質生活条件,而且还有可能保証他們的体力和智力才干获得自由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現在是第一次达到了,但它現在是确实已經达到了。〔有几个数字可以提供出

一种近似的概念，表明现代生产资料即使在资本主义压制下也具有莫大的扩张能力。根据吉芬的最新统计，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国富总额约计如下：

1814年 22亿英镑 = 440亿马克

1865年 61亿英镑 = 1,220亿马克

1875年 85亿英镑 = 1,700亿马克

至于在危机时生产资料和生产产品被消灭的情况，那末根据德国工业家第二次大会（一八七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柏林）所作的计算，在最近一次危机中，单是德国铁工业所遭受的一般损失就达四亿五千五百万马克。——这是恩格斯加的附注。）

（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1877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51—152页）

一〇 消灭货币和实行 产品交换问题

……今天是資本以及工人們相互竞争的結果的东西，如果一旦取消劳动和資本的关系，明天就会成为以生产力总额对現有的需要总额的关系为基础的一个实在的协定。

但是这样的协定就是个人交换的死刑：……

（馬克思：“哲学的貧困”，1847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6頁）

自然，所有这一切措施不能一下子都实行起来，但是它們将一个跟着一个实行。只要向私有制一发起猛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繼續向前迈进，把全部資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整个交换都愈来愈多地集中到国家手里。上述一切措施都是为了这一个目的。无产阶级的劳动将使国内生产力日益增长，随着这种增长，这些措施实现的可能性和由此而来的集中化程度也将相应地增长。最后，当全部資本、全部生产和全部交换都集中在人民手里的时候，私有制将自行灭亡，金錢将变成无用之物，生产增加了，人也改变了，那时，旧社会的各种关系的最后形式也才会消失。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68頁）

我們在生产过程中来考察的个人的劳动，就是他直接用来购买产品、购买他本身生产的对象的货币；但这是特殊的货币，用这种货币只能购买这种特定的产品。为了直接成为一般货币，它一开始就不应当是一种特殊劳动，而应当是一般劳动，即它一开始就应当是一般生产中的一个环节。但是在这种前提下，不是交换赋予劳动以一般的性质，而是事先确定的劳动的集体性决定它是产品生产的一个参加者。生产的集体性一开始就使产品具有集体性、一般性。在生产中实行的原始交换（不是交换价值的交换，而是被集体的需求、集体的目的所制约的行为的交换）一开始就包含着个人参加产品的集体生产的因素。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情况下，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成为一般的劳动。在以生产的集体性为基础的情况下，劳动在交换之前就成为一般的劳动，也就是说，产品的交换一般不是充当个人参加一般生产的媒介的中间手续。媒介自然是需要的。在以个人的独立生产为出发点的、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情况下（不管这种独立生产是确定不变的，还是后来由于这些人的相互关系而有所改变），媒介是通过商品、交换价值、货币的交换而表现的；所有这些都是同一关系的种种表现。在以生产的集体性为基础的情况下，前提本身就是媒介，即以集体生产为前提，集体性是生产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是集体性的劳动。不管这个人创造的或者帮助创造的产品的物质样式怎样特殊，他用自己的劳动购买的不是一定的特殊的产品，而是集体产品的一定的部分。因此，他不需要交换特殊的产品。他的产品不是交换价值。这种产品不需要预先变为一种特殊的形式，以便使个人的劳动取得一般性质。这里是以使个人能够参加集体消费的劳动组织，来代替在交换价值的交换中必然产生的劳动分工。在第一种情况下，生产的社会性是在后

来把产品变为交换价值和这些价值进行交换的时候表现出来的。
在第二种情况下，生产的社会性是前提，不管是参加产品的生产还是参加消费，都不需要互相没有关系的东西或劳动产品的交换来作媒介。它是以个人进行生产活动的社会条件为媒介的。因此，想要把个人的劳动（及其劳动产品）直接变为货币、变为能兑现的交换价值，就是直接把这种劳动确定为一般劳动，也就是否定必须把劳动变为货币和交换价值，以及使劳动依赖私人交换的那些条件。这种要求只有在已经不可能提出这种要求的条件下才能得到满足。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情况下，劳动的前提恰恰就是：不管是个别人的劳动或者是他的劳动产品，都不直接带有一般的性质；这种劳动只有用实物媒介，只有借助于和它不同的货币才能取得这种形式。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之一“货币论”，“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4卷，俄文版，第117—119页）

有多种事业，它们会在长期间取去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但不会在这期间内提供任何有效用的生产物。有多种事业，则不仅在一年间，继续地或多次地，取去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且也同样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社会化生产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决定前一类事业应以什么规模进行，才不致有害于后一类。社会化的生产，就下一点说，是和资本主义的生产一样：在劳动期间短的各职业部门，劳动者仅在短期间内提去生产物，而不将生产物提回；劳动期间长的各职业部门，则有长期间仅有提去，而没有提回。所以，这一种情形，是起因于各该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而非起因于它的社会形态。但在社会化的生产中，货币资本已不复存在。社会将会分配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于不同的营业部门。生产者們比方说将会得到一种纸的凭证，凭此在社会的消费品储存中，取去一个与他们

的劳动時間相符的数量。这种凭証，不是貨幣。它是不流通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63—1867年，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36—437頁)

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資料，并以直接社会化样式来把它們应用于生产之时，每一单独个人的劳动，無論其特殊的有用性是如何的不同，总是一开始就成为社会的劳动。在这場合上，为着决定生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就可以不必采取間接的道路；日常的經驗直接地显示出它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社会可以簡簡單單地来計算：在蒸汽机中，在一百公升的最近所收获的小麦中，在一百平方公尺的一定質地的棉布中，包含着几多小时劳动。因为到那时，生产品里面所包含的劳动量，社会直接地絕對地知道，所以它决不会想到还用相对的运动的不充分的尺度（虽然以前无可奈何地采用着）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就是說，还用第三种生产品来表现这些劳动量，而不用它們自然的适当的絕對的尺度——時間。这是同样的不必要，正好象化学家如果能够以适当的尺度，即以原子的实际重量，以一兆分之一，或一兆兆分之一公分的重量，来絕對地表现原子量，那么他就可不必再用間接方法，以它們对于氢原子的比例来表现各种不同元素的原子量。所以，在上述前提条件之下，社会就不須使其产品带上什么价值。一百平方公尺的布，在生产上，譬如說需要一千小时劳动，社会再不会把这一簡單的事实，用迂迴的无意义的方法来表现，說这布具有一千劳动小时的价值。自然，就在这个場合上，社会也应当知道，某种消費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它应当使自己的生产計劃适合于生产資料，而劳动力亦特別地包括于生产資料之中。各种消費品的有用效果（它們被相互計較并与它們的制造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較）最后决定着这一計劃。那时人可以非常簡單地处置一切，而再不必求助

于有名的“价值”(恩格斯注:在制定生产计划时,上述有用效果和劳动化费的比较,正是应用于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8年,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第326—327页)

(5)在分配方面,苏维埃政权现在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目的是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生产——消费公社中,这种公社能把整个分配机构严格地集中起来,最迅速、最有计划、最节省、用最少的劳动来分配一切必需品。合作社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过渡手段。利用合作社和利用资产阶级专家是同类的任务,因为领导资本主义留给我们的合作社机关的是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和经营作风的人。俄共应当继续贯彻自己的政策:责成全体党员在合作社内工作,指导他们,同时在工会的帮助下,以共产主义的精神发挥联合在合作社中的劳动居民的自动性和纪律性,做到使全体居民都加入合作社,并使这些合作社融合为一个自上而下全国统一的合作社;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就是要经常保证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阶层有占优势的影响,并在各地实际试行种种办法,以促进和实现从旧的资本主义类型的小资产阶级合作社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所领导的生产——消费公社的过渡。

(6)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初期,立即消灭货币是不可能的。因此,居民中的资产阶级分子能够继续利用仍是私有财产的纸币,利用这些使剥削者有权取得社会财富的证券,来投机、发财和掠夺劳动者。单靠银行国有化来同资产阶级掠夺的这种遗毒作斗争是不够的。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来准备消灭货币,首先是以存款摺、支票和短期领物证等等来代替

貨幣，建立有錢一定要存入銀行的制度等等。準備和實行諸如此類的措施的实际經驗將表明其中哪些措施是最適當的。

(列寧：“俄共(布)黨綱草案”，1919年2月，“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1—92頁)

……貨幣是社會財富的結晶，是社會勞動的結晶，貨幣是向一切勞動者征收貢物的憑據，貨幣是昨天的剝削制的殘余。這就是所謂貨幣。能不能一下子把貨幣消滅呢？不能。還在社會主義革命以前，社會主義者就說過，貨幣是不能一下子就廢除的，而我們根據切身的經驗也可以証實這一點。在貨幣消滅之前，平等始終只能是口頭上的、憲法上的，同時每個有貨幣的人都有实际的剝削權利，但是要消滅貨幣，需要很多技術上的成就，而困難得多和重要得多的是組織上的成就。所以我們不能一下子廢除貨幣。我們說，貨幣暫時還要保留下來，而且在從資本主義舊社會向社會主義新社會過渡的時期，還要保留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平等如果同勞動擺脫資本壓迫的利益相抵觸，那就是騙人的東西。

(列寧：“全俄社會教育第一次代表大會”，1919年5月19日，“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1頁)

糧食稅，是從極度貧困、經濟破壞和戰爭所迫使採取的特殊的“戰時共產主義”，進到正常的社會主義產品交換制的一種過渡形式。而正常的社會主義產品交換制，又是從由於小農在居民中占優勢而具備一些特點的社會主義，進到共產主義的一種過渡形式。

(列寧：“論糧食稅”，1919年4月，“列寧全集”第32卷，俄文第4版，第321頁)

我們需要組織一種能夠象每個人估計自己的收支預算一樣來估計并滿足全國城鄉需求的溝通城鄉的分配機構。

一旦我們把這一切都做到了，我們就可以認為不需要貨幣的

时候到来了。

(斯大林：“和外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1927年11月5日，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95页)

当然，在出现了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的一个无所不包的生产部门，来代替两种基本生产部门即国营部门和集体农庄部门之后，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就会作为国民经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消失了。但是，只要这个条件还不具备，只要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生产部门的时候，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便应当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必要的和极其有用的因素而仍然保存着。怎样来建立这种单一的统一的部门呢？是让国营部门干脆吞没集体农庄部门，——而这是很难设想的（因为这会被了解为对集体农庄的剥夺），——还是组织统一的全民的（有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代表参加的）经济机构，即起初有权统计全国一切消费品，而经过一个时期也有权例如以产品交换方式来分配产品的经济机构呢？这是一个特别的、需要单独讨论的问题。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15页)

有人说，价值法则是一切历史发展时期都一定适用的恒久的法则。如果价值法则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二阶段时期会丧失其为交换关系调节者的效力，那末它在这个发展阶段中仍将保持其为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相互关系的调节者、各个不同生产部门劳动分配的调节者的效力。

这是完全不对的。正如价值法则一样，价值是与商品生产的存在相关联的一种历史范畴。商品生产一消失，价值连同它的各种形式以及价值法则，也都要随之消失。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二阶段上，用于生产产品的劳动量，将不

是以曲折迂迴的方法，不是凭借价值及其各种形式来计算，如象在商品生产制度下的情形那样，而是直接以耗费在生产产品上的时间数量即钟点数量来计算的。至于说到劳动分配，那末各个生产部门间的劳动分配，将不依靠那时已失去效力的价值法则来调节，而是依靠社会对产品的需要量的增长来调节的。这将是这样一种社会，在那里，生产将由社会的需要来调节，而计算社会的需要，对于计划机关将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20页)

薩宁那和温什尔两同志的基本错误，是在于他们不了解商品流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和意义，不了解商品流通是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大概他们以为，就是有商品流通，也可以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去，商品流通是不会妨碍这个事业的。这是由于不了解马克思主义而犯的严重错误。

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里批评杜林主张的在商品流通条件下活动的“经济公社”时，确凿证明商品流通的存在必然要使杜林的所谓“经济公社”去复活资本主义。大概，薩宁那和温什尔两同志是不同意这一点的：那末，他们就更站不住脚了。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从这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出发：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依照需要来分配产品的共产主义原则，是排斥任何商品交换的，因而也排斥把产品转化为商品，同时也就是把产品转化为价值的。

.....

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必须将集体农庄生产的剩余品从商品流通系统中排除出去，把它们列入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间的产品交换系统中。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我們还没有发达的产品交换制度,但是有以“换货”为形式的农产品产品交换的萌芽。大家知道,对植棉、种麻、种糖罗葡和其他的集体农庄的产品早已进行“换货”了。诚然,这是不完全的、部分的“换货”,但总算是在“换货”了。要顺便指出:“换货”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应该用“产品交换”来代替它。任务是在于,要使农业的一切部门中都培植这些产品交换的萌芽,并把它们发展成为广大的产品交换系统,以便集体农庄在交出自己的产品时不仅取得货币,而主要是取得必要的制成品。这样的制度需要大量地增加城市送交农村的产品,所以,推行这种制度无需特别急忙,要随着城市制成品积累的程度而定。但是应该一往直前、毫不犹豫地推行这种制度,一步一步地缩小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而扩大产品交换的活动范围。

这样的制度既缩小着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就使社会主义易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此外,它使我们有可能把集体农庄的基本财产、集体农庄生产的产品包括进全民计划化的总的系统中。

(斯大林:“答A·B·萨宁那和B·Γ·温什尔两同志”,1952年9月,“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4—85,86页)

—— 生产产品的分配和消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他們(指圣西門派——本書編者)的經濟學說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他們公社的每个社員分得的产品，首先是以他的工作量、其次是以他所表現的才能决定的。德国共和主义者白尔尼正确地批駁了这一点，他認為才能不該給以報酬，而应看做先天的优越条件；因此为了恢复平等，必須从有才能的人应得的产品中間扣除一部分。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3年10月23日和11月初，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7頁)

生产物底使用乃由消費者們所处的社会关系来决定，而这些社会关系本身却被建立在階級对立底基础上。

.....

在沒有階級对抗和沒有階級的未來社会中，用途大小就不会再由生产所必要的時間的最低額来确定，相反地，花費在某种物品生产上的時間将由这种物品的社会效用大小来确定。

(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5頁)

然而，不言而喻，即令是在受現代大工业制約的社会生产条件下，每个人也能保証获得“自己劳动的十足收入”，只要这句话一般是含有意思的话。但是，这句话只有加以广义的理解才会含有意

思，即必須理解成这样：不是每一单个工人成为这种“自己劳动的十足收入”的所有者，而是整个純由工人組成的社会全体成为他們劳动的全部生产品的所有者，由这个社会把这生产品的一部分分配給自己的成員以供消費，一部分用以补偿和增大自己的生产資料，一部分积累起来作为生产和消費的后备基金。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1872年6月—1873年2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545頁）

3.“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資料提高为整个社会的財產，并要求在公平分配劳动所得下集体調节全部劳动。”

“把劳动資料提高为整个社会的財產”，显然是說把它們“变为整个社会的財產”。但这不过是順便說一句而已。

什么是“劳动所得”呢？是劳动产品还是产品价值呢？而在后一場合，是产品的总价值抑或只是劳动加在消費掉的生产資料的价值上去的那部分价值呢？

“劳动所得”是拉薩尔为代替明确的經濟概念而提出的一个模糊观念。

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

难道資產者不是断定說，現代的分配是“公平的”嗎？并且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現代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唯一“公平的”分配嗎？难道經濟关系是由法权概念来調节，而不是相反，不是由經濟关系产生出法权关系嗎？并且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不是抱有关于“公平的”分配的各种极为不同的观念嗎？

为了要知道“公平的分配”一語在这种場合是指什么东西，我們必須把第一条和本条对照一下。后者假定一个社会，里面“劳动資料是社会的財產并且全部劳动是由集体調节着”，而在第一条里我們則看到，“劳动所得应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屬于社会一

切成員”。

“屬於社會一切成員”？這也屬於不勞動者嗎？那末“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又何在呢？只是屬於社會中勞動的成員嗎？那末社會一切成員的“平等的權利”又何在呢？

但是“社會一切成員”和“平等的權利”顯然只是些空話。問題的實質在於：在這個共產主義社會里，每個勞動者都應當得到拉薩爾式的“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

如果我們把“勞動所得”這個說法首先當作勞動產品的意思來看，那末集体的勞動所得就是全部社會產品。

現在從它里面應該扣去：

第一，補償消費掉的生产資料所需要的費用。

第二，用以擴大生产的附加部分。

第三，為預防不幸事故、自然災害等而用來保險的後備基金或保險基金。

從“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裏作出這些扣除乃是一種經濟上的必要，而扣除多少，應當按照現有的資料和力量來確定，部分地應當按照或然論來確定，但無論如何不能根據公平原則來扣除。

剩下的是全部產品中的其他一部分，即作為消費品用的那一部分。

在把這個剩下的部分進行個人分配之前，從里面又得扣除：

第一，一般的不屬於生产的管理費用。

這一部分和它在現代社會中所占的數額比較起來，將會立即大大縮減，並將隨着新社會的發展而日益減少。

第二，作為共同滿足需要的費用，如學校、保健機關等費用。

這一部分和它在現代社會中所占的數額比較起來，將會立即大大增加，並將隨着新社會的發展而日益增加。

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而设立的基金等，简言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方济贫的费用。

只有现在我们才谈得上讨论中说到的——在拉薩尔的影响下仅仅如此偏狭地说到的——那种“分配”，就是说，才谈得上在集体的个别生产者中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品。

“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有折有扣的”了，虽然从一个生产者私人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他这个社会成员谋福利。

也如“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一语已经消失了那样，一般“劳动所得”一语现在也在消失下去。

在一个根据集体主义原则组织起来而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消费在产品生产上面的劳动，在这里也同样很少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即很少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质特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劳动已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全部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于是，“劳动所得”这一由于意义含糊就是现在也不能接受的说法，便丧失了任何意义。

我们这里所说的不是已经在自身基础上发展了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因此在各方面，即在经济、道德和智慧方面都还保留其所由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每一个别的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中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股份。例如，社会的工作日就是一些个人工作小时的总和；每一个别生产者个人的工作時間就是社会的工作日里由他所供给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的工作日里占有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收据，证明他供给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

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收据又从社会储备中领得与其劳动量相等的那么多的消费品。他以一种形态给与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态全部取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那个商品交换的原则,因为商品交换是同等价值的交换。内容和形式在这里都改变了,因为在变更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之外,谁都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供给,另一方面,也因为除了个人的消费品之外,再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但是,说到消费品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着在商品等价物的交换里也通行的那个原则,即一种形态的一定数量的劳动可以与另一种形态的同量劳动交换。

所以,这里平等的权利在原则上仍然是资产阶级式的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但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则只是平均地存在着,而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有一方面还仍然受资产阶级范围的限制。生产者们的权利是与他们供给的劳动成正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平等的尺度——劳动——来计量。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贡献的劳动量较多,或者能够工作的时间较长;而劳动,为了要使它成为一种尺度,就应当按照时间长度和劳动强度来确定,不然劳动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个平等的权利,对于不同等的劳动是个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的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象所有其他的人一样都只不过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認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認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种天然特权。所以根据其内容来讲,它象一切权利一样是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根据它的性质来讲,只有在使用平等的尺度时才能存在;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只

有在下述場合才能用同一的尺度去計量，即以同一的觀點來看待他們，從一個確定的方面來對待他們，譬如就象在上述場合一樣，把他們只當做工人看，在他們身上再也看不出別的什麼，撇開其他一切東西不說。其次，一個工人已經結婚了，另外一個則沒有；一個工人的兒女較多，另一個工人的兒女較少等等。在同等的勞動下，亦即在同等享受社會消費品存額的條件下，某一個人在實際上所領得的比另一個人多些，某一個人就會比另一個人富些等等。為要避免這一切，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

但是這些缺點，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中，在它經過長久的孕育苦痛以後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里產生出來的形態中，是不可避免的。法權永不能超過社會經濟制度以及由此經濟制度所決定的社會文化發展程度。

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上，當那奴役人們、迫使其服從社會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後；當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已隨之消失後；當勞動已經不單單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已成為樂生的第一要素時；當生產力已隨着每個人在各方面的发展而增高，一切公共財富泉源都盡量涌現出來時，——只有那時，才可把資產階級式的法權的狹隘眼界完全克服，而社會就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我較為詳細地一方面談到了“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另一方面談到了“平等的權利”和“公平的分配”，這是為了要指出：人們一方面企圖重新強迫我們黨接受那在過去曾有一些意思，但現在已變成陳詞爛調的見解作為教條，另一方面又打算用民主主義者和法國社會主義者所慣用的思想上的、法學上的以及其他的謬言，來歪曲那曾化費很大力量才能輸給黨，但現在已在黨內扎了根的現實主義觀點，——人們這樣做是犯了多么大的罪惡呵。

除了上述的一切之外，把分配看作是事物的本質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錯誤的。

消費品的任何一种分配，始終只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后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則决定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質。例如，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以資本私有制和土地私有制为其形式的物質的生产条件，掌握在不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則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也就要自然而然产生出現代的消費品分配。如果物質的生产条件将是工人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结果也就要产生出跟現代不同的消費品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即由于它，某部分民主主义亦然）从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們那儿学了一套手法，即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賴生产方式的东西，并由此把問題描述成这样：仿佛社会主义主要是在分配問題上打圈子。但是真正的关系既然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車呢？

（馬克思：“哥达綱領批判”，1875年5月，“馬克思 恩格斯文选”
两卷集第2卷，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9—23頁）

最后，讓我們变一个方向，想象一个自由人的公社，他們用共有的生产資料 (Produktionsmittel) 劳动，并且意識地，把許多个人的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支出。在此，魯滨孙的劳动的一切性質都重演了。不过不是个人地，而是社会地重演。魯滨孙的生产物全部是个人的生产物，从而，直接对于他是使用对象。公社的总生产物，是一个社会的生产物。这生产物的一部分，会再用作生产資料。它依然是社会的。那一部分，就当作生活資料 (Lebensmittel) 为公社各分子所消費，所以是必須分配在他們之間的。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社会生产有机体 (gesellschaftliche Produktionsorganismus) 的特殊方式，及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

度而变化。仅为便于与商品生产相类比起见，我们假定，各生产者
在生活资料中所得而有的部分，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所以，劳
动时间将会有二重作用。劳动时间之社会的计划的分配，使不同
的劳动机能，与不同的需要，保持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
同时又当作一种尺度，来计量生产者个人在总劳动中参加的部分，
从而也计量各个人在共同生产物中可以消费的部分。无论在生产
上面还是在分配上面，人们对于他们的劳动，对于他们的劳动生产
物的社会关系，在这里，都是最简单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3—1867年，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1—62页）

……剩余生产物（从价值方面看，只有新加的劳动表现在其
内）的一部分，必须当作保险基金（Assekuranzfond）来用。在这
里，这个保险基金是不是由生产公司当作一种特殊营业来管理，不
会在事情的性质上引起变化。而在所得中，也只有这个部分，既不
当作所得被消费，也不一定当作积累基金来用。它实际上是当作
积累基金来用，还是只补偿生产上的意外，完全取决于偶然。而
剩余价值，剩余生产物，从剩余劳动中除了用在积累上，即用在
再生产过程扩大上的部分，也只有这个部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废止之后，必须继续存在。这当然以这个事实作为前提：通例由直
接生产者消费的部分，不以现今这样的最低限度为限。除了要
有一种剩余劳动，为那些为了年龄的原故还不能或已不能参加生
产的人而做以外，一切为养活不劳动者而做的劳动，都会消灭。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63—1867年，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10页）

……如果我们把工资还原为它的一般基础，那就是，还原为自
己的劳动生产物中加入劳动者个人消费内的部分；如果我们把这

一个部分从資本主义的限制解放出来，把它扩大到一方面为社会已有的生产力（那就是他自己的劳动当作现实的社会劳动所具有的社会生产力）所許可，另一方面为个人的完全发展所必要的消費的范围；如果我们把剩余劳动中剩余生产物，减少到在社会已有生产条件下所必要——一方面为了要形成一个保險基金和准备基金，另一方面为了要按照社会需要所决定的程度来不断将再生产扩大——的程度；最后，如果我们把（1）必要劳动和（2）剩余劳动內，包括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須为社会上还不能劳动或已經不能劳动的成員而做的劳动，那就是，如果我们把工資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特殊的資本主义性質除掉，留下来的，便不是这各种形态，而只是它們的基础，那是一切社会化的生产方式所共有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63—1867年，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47—1148頁）

……已經发展到資产階級不能控制的程度的社会生产力，仅仅在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階級去掌握它，并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成員不仅有可能参加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財富的分配和管理，并經過全部生产的有計劃的組織，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所制成的产品增加到能够保證每个人一切合理需求都得到日益滿足的程度。

（恩格斯：“卡尔·馬克思”，1877年6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
两卷集第2卷，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63頁）

对于要把人类劳动力从商品地位中解放出来的社会主义來說，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应当認識这个真理，即：劳动沒有价值，而且不能有价值。有了这种認識，那么一切欲在将来把生活資料的分配当作某种高等工資来調劑的企图（这种企图是从幼稚的工人

社会主义遺傳給杜林先生的，就失去了根据了。由这个認識又产生第二个認識，即：分配既为純粹經濟的緣由所支配，那么它将被生产的利益所調剂，而最能促进生产的发展的分配方式是那种能使一切社会成員全面地发展、保持并运用自己能力的分配方式。自然，杜林先生所傳得的有教養的階級的思維方式，不得不惊奇，怎么在将来会达到这样的时侯。那时，不会再有职业的拉車者和建筑师，而在半点鐘內作为建筑工來发号施令的人，过一下子就可以推車，直至以后他再被需要來当建筑师活动的时候为止。把拉車职业永久化的社会主义，真好！

如果劳动時間的等价，包含这样的意义，以为每个劳动者在同一的時間內生产同样的价值，而不必預先定出任何平均的东西，那么这显然是錯誤的。两个人在一小時內所生产的物品，虽在同一工业部門內，但因劳动的强度和劳动者的技巧程度的不同，也总是各不相同的；这样的不幸，——或許只有象杜林先生那样的人才会把它看成不幸，——不是任何經濟公社，至少不是我們地球上的任何經濟公社所能挽救的。这样說來，一切劳动的完全等价，还剩了些什么呢？一点沒有什么，只有吹牛的詞句——这种詞句的經濟基础，只是在于杜林先生沒有能力对于价值被劳动所决定和价值被工資所决定这二者进行区别，——一点沒有什么，只有簡單的勅令，及新經濟公社的基本規律，說：相等劳动時間的工資，應該相等！可是，法国的共产主义工人和魏特林早已为他們的工資平等說，举出更好得多的理由了。

关于复杂劳动的較高工資之全部重要問題，怎样解决呢？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教養熟練劳动者的費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來負擔的；所以熟練劳动力的較高工資，也首先是归于私人。熟練的奴隶，卖得貴些，熟練的工人也得到較高的工資。在社会主义地

組織起來的社會里，這種費用，由社會來償付，所以複雜勞動所創造的成果，即更多的價值，也歸於社會。工人自身，不能要求任何額外報酬，從這上面，更得出這樣的實際的結論：工人對於“全部勞動產品”的得意的要求，又一次顯出是有缺陷的。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8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第207—208頁）

……當我們開始按照最後已被認識的近代生產力的本性去處置它的時候，生產的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就要為生產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所代替，這種生產，是以滿足全社會以及社會每一成員的需要為目的的。那時資本主義的占有方式——在這方式中，生產品起初奴役生產者，以後又奴役占有者——也將被以現代生產資料的本身性質為根據的新的占有形式所代替，一方面，是生產品的社會的直接的占有，用以作為維持生產及擴大生產的資料，另一方面，是直接的個人的占有，用來作為生活及娛樂的資料。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8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第293—294頁）

在“人民論壇報”上也發生了關於未來社會中產品分配的辯論：這種分配將是依照勞動量進行，還是依照其他什麼方式進行呢。人們對於這個問題，是一反唯心主義者所謂公平原則的空話而處理得極為“唯物主義的”。然而，很奇怪的是誰也沒有想到，分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所被分配的產品數量，而這種數量當然隨着生產和社會組織的進步而改變，從而分配方式也應該隨着改變的。但是，在所有參加辯論的人看來，“社會主義社會”並不是一種經常改變、經常進步的東西，而是一種穩定性的、一成不變的東西，因而它應當有個一成不變的分配方式。合理地推論起來時，只能（一）設法發現將來由以開始的分配方式，（二）盡力找出進一步

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方向。可是，在整个辯論中，我沒有发现一句話是談到这点的。

(恩格斯：“致斐·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487頁)

……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取酬。我们党看得更远些：社会主义必然会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4月10日，“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頁)

……在我们苏联这里，群众的消費(購買力)的增长总是超过生产的增长，推动生产向前发展，而相反地在他们资本家那里，群众的消費(購買力)的增长从赶不上生产的增长，并且总是落在生产后面，往往使生产陷入危机。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0年6月，“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82頁)

……社会主义，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不是要縮减个人需要，而是要竭力扩大和发展个人需要，不是要限制或拒絕滿足这些需要，而是要全面地充分地滿足有高度文化的劳动人民的一切需要。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报告”，1934年，“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18頁)

只有将来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們劳动由社会方面所得的报酬，不是以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为标准，而是以各取所

需的原則,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可說我們建成了共产主义社会。

(斯大林与霍尔瓦德底談話,1936年,“斯大林逸集”

第5卷,北京新华書店1949年版,第233頁)

一二 平等和平均問題

“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这句用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的话，也是很成問題的。在各个国家、省份甚至各个地方之間，在生活条件方面总是要存在某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来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阿尔卑斯山居民与平原居民的生活条件总是有所不同。把社会主义社会当作平等乐园的观点是个与“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有联系的片面的法国观点，——这个观点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曾是正当的，但是现在这个观念則象以前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应当克服下去，因为它只能引起混乱，并且因为現在已經有了闡述这个問題的更精确的方法。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的信”，1875年3月18—28日，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4年莫斯科中
文版，第40—41頁）

我們力求使任何劳动的报酬一律平等，力求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但在目前只是开始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我們决不能給自己提出立刻实现这种平等的任务。因此，在一定的時間內仍要給專家們較高的报酬，使他們工作得比以前不是坏些而是好些，为了同一目的，也不能取消鼓励成績优良的工作特别是組織工作的奖金制度；在完全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奖金是不需要的，但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代，如理論和苏維埃政权一年来

的經驗所証实的，沒有獎金是不行的。

(列寧：“俄共(布)黨綱草案”，1919年2月，“列寧全集”
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0—91頁)

恩格斯說得萬分正確：平等的概念如果與消滅階級無關，那就是一種極端愚蠢而荒謬的偏見。資產階級的教授們企圖用平等這個概念來證明我們想使一個人同其他的人平等。他們企圖用他們捏造的這種無稽之談來責備社會主義者。但是他們由於自己無知，竟不知道：社會主義者，即現代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說過，如果不把平等理解為消滅階級，平等就是一句空話。我們要消滅階級，從這方面說，我們是主張平等的。但是硬說我們想使所有的人彼此平等，那就是無謂的空談和知識分子的愚蠢的捏造，這些知識分子有時裝腔作勢，玩弄字眼，然而毫無內容，儘管他們把自己稱為作家，有時稱為學者，或者稱為別的什麼人。

所以我們說：我們要爭取的平等就是消滅階級。因而也要消滅工農之間的階級差別。這正是我們的目的。工農之間還有階級差別的社会，既不是共產主義社会，也不是社會主義社会。當然，從一定的意義上來解釋社會主義這個字眼，是可以把這種社会叫做社會主義社会的，但這是一種詭辯，是字眼上的爭論。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爭論字眼是沒有必要的。有一點很清楚：只要工農之間的階級差別還存在，我們就談不上平等，就不能不加以防備，以免幫助了資產階級。

(列寧：“關於用自由平等口號欺騙人民”，1919年5月19日，
“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1—322頁)

路德維希：我非常感謝你的這個聲明。請允許我向你提出下面的問題：你談到“平均主義”，而且這個名詞對普遍的平等來說帶有

一定的諷刺意味。但是要知道，普遍的平等是社会主义的理想。

斯大林：所有的人都領取同样的工資、同等数量的肉、同等数量的面包，穿同样的衣服，領取同样的和同等数量的产品，——这种社会主义是馬克思主义所不知道的。

馬克思主义只是說：在階級还没有彻底消灭的时候，在劳动还没有从生存手段变成人們的第一需要，变成为社会謀福利的自愿劳动的时候，人們将按自己的劳动来領取工作报酬。“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这就是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公式，也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的公式。

只有在共产主义的高級阶段，每个人一方面按自己的能力来劳动，另一方面将按自己的需要来領取劳动报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十分明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同的人具有而且将来也会有不同的需要。社会主义从来不否認人們在口味上、在需要的数量和質量上的差別。只要讀一讀馬克思对施蒂納平均主义趋向的批判，只要讀一讀馬克思对一八七五年“哥达綱領”的批判，只要讀一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后来的著作，你就会看到他們对平均主义的抨击是多么尖銳。平均主义的根源是个体农民的思想方式，是平分一切財富的心理，是原始的农民“共产主义”的心理。平均主义和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只有不懂馬克思主义的人才这样幼稚地設想，似乎俄国布尔什維克想把一切財富聚集在一起，然后把它們平均分配。和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人就是这样設想的。象克倫威尔时期和法国革命时期的原始“共产主义者”那样的人就是这样設想共产主义的。但是，馬克思主义以及俄国布尔什維克和这种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斯大林：“同苏联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1931年，
“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4—105
页)

……他們(指一部分黨員——本書編者)認為黨既然宣布了勞動組合是集體農莊運動的基本形式，那就是遠離了社會主義，從公社即從集體農莊運動的高級形式向低級形式后退了。試問，為什麼呢？原來是因為勞動組合里没有平等，因為在勞動組合里還保存着組員的需要和個人生活上的差別，而在公社里却有平等，因為在公社里社員的需要和個人生活狀況都是平均的。但是，第一、我國現在已經沒有這種在需要和個人生活方面都拉平，都實行平均主義的公社了。實踐證明，如果公社不放棄平均主義，不在實際上改為勞動組合，那末它們就一定會滅亡。所以不必去援引世界上已經不存在的東西。第二、任何一個列寧主義者，只要他是一個真正的列寧主義者，都知道在需要和個人生活方面的平均主義是一種反動的小資產階級謬論，這種謬論適合於某種原始的禁慾主義教門，但是不適合於按照馬克思主義組織起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因為不能要求所有的人的需要和口味都一樣，所有的人的個人生活方式都一樣。最後，難道在工人中間不是保存着需要和個人生活上的差別嗎？這是不是說，工人比農業公社社員距離社會主義更遠呢？

看來，這些人以為社會主義要求社會成員的需要和個人生活都是平均的，相等的，一律的。不用說，這種設想和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毫無共同之處。馬克思主義所了解的平等，並不是個人需要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平均，而是階級的消滅。這就是說：(甲)在推翻和剝奪資本家以後，一切勞動者都平等地擺脫剝削而得到解放；(乙)在生產資料轉歸全社會公有以後，對於大家都平等地廢除

生产資料私有制；(丙)大家都有按各人能力劳动的平等义务，一切劳动者都有按劳取酬的平等权利(社会主义社会)；(丁)大家都有按各人能力劳动的平等义务，一切劳动者都有各取所需的平等权利(共产主义社会)。同时，馬克思主义認為，無論在社会主义时期或共产主义时期，各人的口味和需要在質量上或在数量上都不是而且也不能是彼此一样，大家平等的。

这就是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

任何其他的平等都是馬克思主义沒有承認过而且現在也不承認的。

如果由此做出結論，說社会主义要求社会成員的需要都是平均的，相等的，一律的，要求他們的口味和个人生活都是一律的，說按馬克思主义者的計劃大家都应当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和同量的飯食，那就是胡說八道，謾蔑馬克思主义。

現在应当了解，馬克思主义是平均主义的敌人。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共产党宣言”中就痛斥了原始的空想社会主义，因为它鼓吹“普遍的禁慾主义和粗鄙的平均主义”而称它为反动的社会主义。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論”一書中，用了整整一章来严厉批判杜林提出来和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对立的那种“激进派的平均主义社会主义”。

.....

毫無疑問，个别党员对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这种糊涂观点和对农业公社的平均主义自向的迷恋是同我們“左派”糊涂虫的小资产階級观点一模一样的。“左派”糊涂虫有一个时候把农业公社理想化到这种地步，甚至企图在工厂里建立公社，在公社里，熟練工人和非熟練工人各按自己的职业工作，但是必須把工資交出来混在一起，然后再平均分配。大家知道，“左派”糊涂虫的这些平

均主义的儿戏使我們的工业受到了,多大的損害。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4年，“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3—316页)

一三 再生产問題

第一部类再現于商品生产物形态上的不变資本价值，会部分地加入它当作生产物所出生产部門(或个别营业)，充作生产資料。例如，谷物加入谷的生产，煤炭加入煤炭生产，机器形态上的鉄加入鉄的生产等等。

第一部类不变資本价值由以构成的部分生产物 (Teilprodukte)，縱令不是直接再加入該特殊的或个别的生产部門，也只不过要变更位置。它們将会用它們的自然形态，加入第一部类别一个生产部門；第一部类别的生产部門的生产物，又在自然形态上将它們替换。要之，这不过是生产物的位置轉換。它們全会在第一部类，成为替换不变資本的因素，不过不是在第一部类的这一群，而是在其中的別一群。在这場合，第一部类諸个别資本家間将会发生交换，但这种交换，是以一种自然形态上的不变資本，交换別一种自然形态上的不变資本，以一种生产資料交换別一种生产資料。这种交换，是第一部类各个相异的个别不变資本部分互相交换。所以，假使生产物不会直接在本生产部門当作生产資料应用，它就会由它自己的生产場所，移到別的生产場所，并互相替换。換句話說(与第二部类剩余价值的情形相似)，第一部类每个資本家，会当作这4000不变資本的共同所有者，依照比例，从这个商品总量，取出一部分，作为他所必要的适合的生产資料。如果生产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資本主义的，那很明白，第一部类这个生产物，将会同样不

断地为再生产的目的,而再当作生产资料,被分配在该部类各生产部门之间;那就是,一部分直接留作它当作生产物所从出的生产部门,另一个部分就向别的生产部门移入,从而在第一部类各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发生一种不断的来往。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1863—1867年,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25—526页)

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形态一旦停止,我们当前的命题,就会归着到下述一点:死灭掉的从而必须在自然形态上替换的固定资本部分(在这里,是指那种在消费资料生产上发生机能的固定资本),会逐年发生变动。如果它在某年特别大(象人一样超过平均死亡率),它在以后诸年就一定会依比例减小。消费资料年生产上必要的原料,半制品,和补助材料的量——在其他各种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却不会因此减少;所以,生产资料的总生产,在一个场合必须增加,在另一个场合必须减少。这个情形,只能由不断的相对的过剩生产来救治;那就是,一方面必须有一定量的固定资本,比直接需要的更多;另一方面,并且特别是原料等物品的储存,也要比直接的常年的需要更大。(这一点,对生活资料方面说,是尤其适合的。)这种过剩生产,等于是社会对于它自己的再生产所需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内,这种过剩是一个无政府的要素。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1863—1867年,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85—586页)

……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决不只限于反映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它同时还包含有对于一切社会形态——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发生效力的许多关于再生产的基本原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这些基本原理,诸如关于社会生产之分为生产资料

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的原理；关于在扩大再生产下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占优先地位的原理；关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的对比关系的原理；关于剩余产品是积累的唯一源泉的原理；关于社会基金的形成和用途的原理；关于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的原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这一切基本原理，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有效的，而且任何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计划国民经济时，不运用这些原理也是不行的。……

列宁、马克思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列宁批判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意见，是大家都知道的。在这些意见中，大家知道，列宁承认，马克思关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对比关系的公式，也就是雅罗申柯同志所极力反对的公式，不论对于社会主义或“纯粹共产主义”、即共产主义第二阶段，都是有效的。

至于马克思，那末大家知道，他不喜欢离开对资本主义生产法则的研究，他在自己的“资本论”中，并没有研究过他的再生产公式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的问题。然而，他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十章“第一部类的不变资本”这一节中，论述第一部类的产品在这第一部类内部的交换时，曾顺便指出，这一部类内的产品交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下那样不断地进行。马克思说：

“如果生产是社会公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那末很明显，第一部类的产品，为了再生产的目的，将作为生产资料同样不断地重新分配于这一部类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一部分直接留在生产它自己的生产部门，另一部分则转到另一些生产部门，于是在这一部类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就建立起不断对流的运动。”（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

因此，虽然馬克思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法則，但他决不認為他的再生产理論仅仅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才是有效的。恰恰相反，他显然認為他的再生产理論对于社会主义生产也是有效的。

應該指出，馬克思在“哥达綱領批判”中，在分析社会主义經濟和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經濟时，是从他的再生产理論的基本原理出发的，显然他認為这些基本原理对于共产主义制度是一定适用的。

也应该指出，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論”中，批判杜林的“社会制度”和說明社会主义制度的經濟时，也是从馬克思的再生产理論的基本原理出发的，認為这些基本原理对于共产主义制度是一定适用的。

事实就是如此。

（斯大林：“关于Л·Д·罗申柯同志的錯誤”，1952年5月22日，

“苏联社会主义經濟生活”，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2—74頁）

一四 生产公社、消费公社

我的提議是要使合作社深入 (Einrücken) 到現有的生产中。應該把土地交給合作社，否則土地就要被資本主义方式所利用。与这种情况相似，巴黎公社曾要求工人們根据合作社原則把工厂主关闭了的工厂拿到自己手里来。这就是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在向共产主义經濟过渡的时候，我們必須大規模地采用合作社生产作为中心环节，关于这一點馬克思和我从来沒有怀疑过。但問題的提出應該是这样的：社会（在起初是国家）掌握生产資料的所有权，所以合作社局部的利益不能凌駕全社会的整体利益之上。

（恩格斯“給倍倍尔的信”，1886年1月20—23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俄文第一版，第524頁）

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

初步提綱：

粮食人民委員部关于“供应局”、“代表委员会”的草案以及最高国民經济委员会关于“区域国民經济委员会”的草案使人产生一种必須把这些組織联合起来的思想。大約是：

供应委员会？

供应和销售委员会？

初步提綱：

基层单位应当是工兵农代表苏維埃所屬的供应和銷售的消費生产委员会(供銷委员会,这种委员会比采購貿易委员会好),作用相当于供应委员会和銷售机构的乡联合会。乡的管界必要时可以改变。

在城市中,也許以街坊委员会或街道委员会作为基层单位。

如果能够各地建立起这样的基层单位委员会,那末把这些委员会联合起来,就会形成一个能够正确組織全体居民必需品的供应和正确組織全国范围内的生产的网。

也可能以包括有商业服务人员等等在内的“工农代表苏維埃”来代替这些“联合会”。

每一个这样的联合会或者委员会(或者供銷委员会)将按銷售生产和供应产品种类分成部或者科,以便全面的調整生产和消費(每一个供銷委员会都应该有财务科和出納科)。社会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可以有权征收所得稅,可以无息地貸款給无产者,以及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的情况下,銀行应该同国家儲蓄銀行合併,应该把賬目納入全国簿記,納入国家收支的总賬。

产品只能有一个供銷委员会运往另一个供銷委员会,同时只能在供銷委员会之間进行交易,禁止一切私人間的銷售。个人根据乡(一般的是“基层的”,即下级的)供銷委员会的凭証,可以向中央倉庫購買产品,但必須把它記在乡和其他供銷委员会的賬目中(在小单位內或者購買零碎的产品不在此例)。沒有供銷委员会的凭証,不得私运产品。

这就要把农业人民委员会、工商业人民委员会、劳动人民委员会、粮食人民委员会、最高国民經济委员会、財政人民委员会、铁道人民委员会合併起来。

注意:“供銷委员会”如下:乡供銷委员会、县供銷委员会、省供

銷委員會、區域供銷委員會、(Σ Σ (总合——原編者注)=最高国民經济委員會)。供銷委員會的各部如下：中央紡織部、中央糖业部、中央煤炭部等等。(Σ Σ =最高国民經济委員會)，中央銀行等。

注意：城市中富人区(或者富人的別墅区等)，那些工农所占的百分比低于60%的区域，应该服从工兵农代表苏維埃的代表。

(列宁：“关于消費公社的法令草案”，1917年12月25—28日，“列宁全集”第36卷，俄文第4版，第425—426頁)

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当它是作为由許多生产消費公社构成的体系，而这些公社都誠实計算自己的生产和消費，节省劳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因而能够减少每日劳动時間到七小时或六小时以至于更少的時間，——只有在这种情形下，它才能产生。在这里，若不办妥对粮食和粮食生产(随后，再对一切其他必需品)实行最严格的，包括一切的全民統計和监督，是不行的。资本主义遺給了我們一种群众組織，能便于我們对产品分配实行广泛的統計和监督，——这就是消費协社。在俄国，这种組織比之先进国家里发展得微弱些，可是它們还是包括有一千万以上的社員。日前頒布的关于消費协社的法令，是一个非常有意義的現象，它鮮明地表明出現时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状况底特点和任务。

(列宁：“苏維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0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86頁)

公社和劳动組合不同，劳动組合只把生产資料公有化，而公社在不久以前不仅把生产資料公有化，而且把每个社員的生活也公共化了，就是說，公社社員和劳动組合組員不同，他們沒有私有的家禽、小家畜、奶牛、谷物和宅旁園地。这就是說，在公社中，与其說是照顧到社員的个人生活利益，把它和公共利益結合起来，不如說

是为了达到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而用公共利益把社员的个人利益压抑下去了。很明显，这是公社的最大弱点。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公社没有得到广泛发展，而只有几个或几十个。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公社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而避免垮台，就不得不放弃生活公共化的办法，开始按劳动日计算，把谷物分给各户，允许社员私有家禽、小家畜、奶牛等等。但是实际产生的结果是公社实际上改为劳动组合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正常发展的利益要求这样做。

这当然不是说公社根本不需要了，它不再是集体农庄运动的高级形式了。不，公社是需要的，它当然是集体农庄运动的高级形式，但不是目前的在技术不发达和产品不足的基础上产生并且自然改为劳动组合的公社，而是将来的在技术更发达和产品十分丰富的基础上产生的公社。……将来的公社是从发达的富裕的劳动组合中成长起来的。将来的农业公社是在劳动组合的田地上和养殖场中有了丰富的谷物、家畜、家禽、蔬菜和其他各种产品的时候，在劳动组合中附设有机械化洗衣坊、现代化厨房、食堂、面包厂等等的时候，在社员看见从农场方面领取肉类和乳类比自己饲养奶牛和小家畜便宜的时候，在女社员看见在公共食堂吃饭、向面包厂取面包、在公共洗衣坊洗衣比自己料理这些事情方便的时候产生出来的，将来的公社是在更发达的技术和更发达的劳动组合的基础上，在产品十分丰富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劳动组合转变为将来的公社的过程应当随着全体社员对这种转变的必要性的确信程度而逐步地进行。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4年，“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1—313页）

一五 工农业的结合,城乡差别的消灭

大工业在农业范围引起的最有革命性的一件事,是剿灭旧社会的堡壘——农民(Bauer)——而用工资劳动者去代替他们。社会变革的要求与阶级对立的情形,在农村,因此就和在城市归于平衡了。最陈旧最不合理的经济方法,为科学之意识的工艺学的应用所代替了。农业和手工制造业借以在它们的幼稚未发展形态上结合起来的原始家族脐带的裂断,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完成的。但在二者对立发展所开出的形态的基础上,它同时又为一个新的较高级的综合——农业和工业的结合——造成了物质的前提。……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
1953年版,第617—618頁)

这样,资产阶级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就因碰到城乡对立而显然遭到失败了。这里我们就达到了问题的中心点。住宅问题,只有当社会已经改革到使人可能着手消灭城乡对立,消灭这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已弄到极端迫步的对立时,才能获得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决不能消灭这种对立,反而不得不使它日甚一日地尖锐化。现代第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已经正确地认识了这一点。在他们的模范结构中,城乡对立已不存在了。因此,这里的情形恰好与查克思先生断定的相反;并不是解决住宅问题同时

使社会問題得到解决,而只是由于解决社会問題,即由于废除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才使解决住宅問題成为可能。要想解决住宅問題而又把現代的大城市保留起来,是很荒謬的。但是,現代的大城市只有在消灭了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才能被废除,而当消灭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一事开始进行时,問題就会不是在于务使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小屋子,而是在于作全另一种事情了。

但是,每一社会革命都是:起初不免要拿起現有的东西,并且凭借現有的手段来矯正最难容忍的弊害。上面我們已經看到:把属于有产阶级的豪华住宅一部分实行剝夺,并把其余一部分强迫征用,就可以立刻帮助把住宅缺乏現象消除。

(恩格斯:“住宅問題”,1872年6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
两卷集第二卷,莫斯科1955年中文版,第566—567頁)

消除城市与乡村間的对立并不是空想,正如消除資本家与雇工人間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消除这种对立一天天地愈来愈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沒有人曾比李比赫在他論农业化学的著作中更坚决地要求了这点,那里他始終認为首要的要求是人应把取自土地的东西还给土地,并証明說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存在阻碍了这一点的实现。当你看到单只倫敦一地每日都要化費巨額資金,才能把較之全薩克森王国所生产的更多的粪傾抛到……海里去;当你看到必須有多么巨大的建筑物才能使这些粪不致败坏倫敦全城,——那末你就知道消除城乡間的对立的这个空想是具有极实际的基础了。甚至較小的柏林在自己的髒污中喘息至少也有三十年了。……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并使交通工具随着由此产生的需要扩充起来。——当然是以废除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們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

棲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掙脱出来。断定說人們只有在消除城乡間的对立后才能够从他們已往历史所鑄造的枷鎖中完全解放出来，这种断語完全不是空想；只有当人們企图“从現存关系出发”，預先規定一种应该用以解决現存社会中所特有的某种对立的形式时，那才是空想。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1872年6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
两卷集第1卷，莫斯科1955年中文版，第603—604頁)

大产业教导我們，为着技术的目的，把分子的运动(这种运动，多多少少地随处可以实现)改变为集团的运动；这样，大工业就在极大程度上使工业生产解脱地方的限制。水力是和地方相連的，可是蒸汽力則是自由的。如果水力必然地带着一種乡村的性質，那末蒸汽力就并不一定与城市相連。只有資本主义式的蒸汽力的应用，才使它主要地集中于城市之中，而把工厂的乡村轉成为工厂的城市。可是因此，它就破坏了生产的正常过程的条件。蒸汽机的首先需要，以及大工业中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門的主要需要，是要有比較清洁的水。但是，工厂的城市，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触鼻的污水。这样，虽然集中于城市是資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可是每个工业資本家个别地总是經常企图把自己的企业从工业生产所必然造成的大城市迁移到农村区域去。这一过程在兰开郡和約克郡的紡織工业区域里都可以詳細看到：在那些地方，資本主义大工业不絕地从城市迁往乡村，所以就不絕地造成新的城市。在金屬制造工业的区域里，也发生同样情形，在那里，同样的結果，还部分地为別种原因所造成。

要消灭这种新的罪恶的循环，要消灭經常重复产生着的近代工业的矛盾，就只有消灭工业的資本主义性質才有可能。只有根据統一的总計划来协调地配合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許工业

在全国作这样的分配，使之能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和发展。

所以，城市与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但是可能的；它甚至是工业生产本身以及农业生产所直接必需的，而且在社会卫生上，更是必要的。只有用融合城市和乡村的方法，才能除去现在的空气、水及土地的污毒，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之下，现在衰弱的城市居民，才能达到这样的境地，使他们的粪尿不是产生疾病，而是用来作为农业的肥料。

资本主义工业，已使自身对于本身所需原料的地方生产所造成的狭隘范围，采取比较独立的地位。纺织工业所加工的，主要是从外输入的原料。西班牙的铁矿石，在英国和德国加工；西班牙和南美的铜矿石，在英国加工。每个煤矿区域，把燃料供给那些远在外国的逐年扩大的工业区域。在欧洲的全部沿海地方，蒸汽机都用英国的煤，有的地方用德国和比利时的煤。解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桎梏的社会，可以在这方面更往前迈进。它（上述的社会。——译者）造就了全面发展的生产者的一代，这些生产者，懂得整个工业生产的科学基础，并且其中每人从头到尾地实际经历过整个系列的生产部门。这样的社会，将造成新的生产力，此种生产力，是可以绰绰有余地超出那种从很远的地方运输原料和燃料所化费的劳动。

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配，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裂的条件，所以就从这方面来说，城市和乡村的分裂的消灭，也不是什么空想。自然，文明留给我们以大城市中的遗产，要消除它，自然需要许多的时间和努力。但是这种遗产是必须被消除而且定要被消除的，虽然这是一个极长期的过程。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8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2—313页）

虽不幸但却自由的瑪尔克的恢复,只有一个好处:在这种恢复后,农民所处的地位比瑪尔克——在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即工人的协助下——能够自力更生,只要他想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话。(注:在单行本中做了如下的补充:“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恢复瑪尔克,但不是过去那种陈腐落后的形态,而是年轻的瑪尔克;也就是说,把公社的土地占有制加以革新,使这种占有制不仅使小农社员能够得到大经济的一切好处和使用农业机器,而且能向他们提供各种条件,使他们除了农业之外还能借助蒸汽或水力组织大工业,同时这种工业是依靠公社自身而不是依靠资本家。

大规模的农业和农业机械的使用——换句话说,这就是意味着,大多数现在自耕土地的小农的农业劳动将成为多余的了。为了使这些从农业中排挤出外的人不致失业,不致聚集在城市,建立在乡村中的工业就必须吸收他们;而且,要使这种工业对这些人有利,这种工业只能是大规模的,是使用蒸汽或水力的。

如何组织这项工作呢?请德国的农民好好想一想罢。能够帮助你们的只有社会民主党人”。——原编者注)

(恩格斯:“瑪尔克”,188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5卷,俄文第1版,第645页)

普林诺姆说了一句在我们看来是很真实的话:现代农业——就其技术与经济底一般水平来说——是接近于马克思叫作“工厂手工业的工业”发展阶段。手工劳动与简单合作之占优势,机器之零星使用,比较小的生产额(比方说按一个企业每年所售出的生产产品总数计算),大多数场合上比较小的市场规模,大生产与小生产之联系(后者象家庭手工业者对于大手工工厂厂主一样供给前者以劳动力,或者是前者从后者收买“半制品”,例如,大农户从小农户收买甜菜、牲畜等等),——这一切标志实际上都说明着:农业还

不會达到真正的、馬克思主义下的“大机器工业”阶段。在农业中，还没有那結合成一个生产机构的“机器体系”。

当然，不可夸大这个比較：一方面，农业具有着一些绝对不可能排除的特殊性（如果撇开以人工生产蛋白質与食品的过于辽远与过于成问题的可能性不談的话）。由于这些特殊性，大机器生产在农业中决不会赋有象它在工业中所赋有的一切特点。另一方面，在工厂手工业中，工业的大生产已經达到了对于小生产的支配与巨大的技术优越性。小工业者很久以来就企图以延长劳动时间与减少需要的方法来麻痺这个优越性，而这正是家庭手工业者与現代小农底显著特征。……

（列宁：“土地問題与‘馬克思底批判家’”1901—1907年，“土地問題理論”上卷，解放社1949年版，第116—117頁）

……赫尔茲在自己的書中写道：

“城市与乡村間的差异的消灭，的确是旧的空想主义者（甚至“宣言”——指馬克思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譯者）的基本愿望，——但是我們不相信：那包含着把人类文化导向到可能达到的最高目的的一切条件的社会制度，真是会消灭象大城市那样的精力与文化底偉大中心，并且为着取悅受了侮辱的美学情感，竟会摺弃那些沒有它們而进步就不可能的艺术与科学丰富宝藏”。

社会民主党人善于尊視精力与文化的偉大中心之历史功績，——这是他們以自己的一种不可調和的斗争所証明了的，这种斗争就是反对把一般人口，特别是农民与农业工人束縛于一个地方。因此，与批判家們截然不同，他們沒有被任何企图供給“农人”以冬季“雇佣”的地主的釣餌所捕获。但是对資本主义社会中大城市的进步性之断然承認，一点也不阻碍我們把消灭城市与乡村間的对立包括在自己的理想中（并且包括在自己的行动綱領中，因为

我們把不能實現的理想委諸斯徒魯威與柏狄也夫先生們了)。認爲這等于擯棄科學與藝術的寶藏，是不正確的。恰恰相反：爲了使這些寶藏爲全體人民所能接受，爲了消滅千百萬鄉村人口之與文化的隔離——馬克思十分恰當地把這叫作“鄉村生活的痴愚”，——這是必要的。現在，當電力能夠傳播到很遠地方的時候，當運輸技術非常提高，能夠在較小的（比較現在）運費下以一小時二百多俄里的速度載運來客的時候（在曼切斯特與利物浦之間修築這樣一條路的計劃之未被國會通過，僅僅是由于鐵路大企業主之懼怕舊公司崩潰而有的自私自利的反對。），絕對沒有任何技術上的阻礙可以使幾世紀來堆積于少數中心的科學與藝術的寶藏不爲或多或少平均地分布于整個國家的全體人民所享受。

如果沒有什麼東西阻礙城市與鄉村間的对立之消滅（當然應當想象到這種消滅不是在一个行動之下，而是要經過許多的措施），那末就決非單是美學情感要求這樣了。在大城市中，人們窒息在——如果用恩格斯的說法——他們自己的糞坑里，凡是能力所及的人都定期地逃開城市去尋求新鮮的空氣與清潔的水。工業也移住在鄉間，因為它也需要清潔的水。利用瀑布、運河與河流來獲得電力，將給與這種“工業的散布”以新的推動。最後，——可是並非最不緊要，——合理地利用對於農業是十分重要的一般城市穢物，特別是人類糞尿，也要求着城市與鄉村間的对立之消滅。批判家先生們決意把他們農業學上反對的論據指向着馬克思與恩格斯理論的這一點（批判家先生們寧肯避免充分地分析這個理論，——在“反杜林論”里恩格斯在這個問題上曾經把這個理論特別詳細地說明了，——並且象平常一樣只限于把某個布倫達諾思想的斷片簡單地注釋一下）。他們論據的綫索是這樣：李比格證明了必須歸還土地以我們取自它的那么多東西。因此他認爲把城市穢物

拋擲到海里与河里，是对农业所必需的物質的荒謬和野蛮的浪費。考茨基同意李比格的理論。但是現代农业学指出了：不用廐肥而用人造肥料，以某种細菌注射給积聚淡素的莢状植物等等，就完全能够恢复土地的生产力。因此，考茨基与一切“正統派”都只不过是落后的人們而已。

因此，——我們回答道，——批判家先生們除了平常无数次地歪曲事实以外，在这里又歪曲一次。把李比格的理論說明了以后，考茨基立刻就指出：現代农业学証明了“完全不用廐肥”是充分可能的（“土地問題”第50頁；参看上面引用的一段），但是他又加上道：比起城市排泄方式所引起的人类粪尿的浪費，这是一种弥縫的手段而已。如果批判家們能够在問題的本質上进行爭論，那末他們就應該駁倒这一点，——指出这并不是—种弥縫的手段。可是他們連想也沒有想到这样做。不用說，人造肥料之代替自然肥料的可能性，以及这种代替（部分地）之成为事实，一点也沒有駁倒：无謂地拋擲自然肥料，并且在这种場合上污染市郊与工厂区域的河水与空气，这是不合理的。在大城市周围，現在存在着一些沟渠农場，它們利用城市穢物而对农业极有好处，——但是这样也只利用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穢物而已。考茨基在他的書第11頁上回答批判家們当作新东西向之提出的反駁，即現代农业学駁倒了城市在农业上剝削乡村的这个論据，他这样說道：人造肥料“使避免土地肥沃性之减少成为可能，但是逐渐加多地使用这些人造肥料的必要性，只意味着农业許多負担中的一个負担，而这些負担决不是自然的必然性，而是从現存的社会关系中所产生的。”（当然，人造肥料，——考茨基往下說道，——不会随着資本主义的崩潰而消灭，但是它們将以特殊的物質丰裕土地，而不会执行恢复土地的肥沃性的整个任务。）

在我們加上了着重點的語句中，包含着批評家們如此熱心地加以蒙蔽的問題的全部“症結”。那些象布尔加科夫先生一樣以比社會問題更可怕和重要的“谷物問題”來威吓無產階級的著作家們，那些熱狂於人工的節制生育，說“調節人口增加”將是農民幸福的“基本的（原文如此！）經濟條件”（第2部第261頁），說這種調節值得“重視”，說“農民人口的增加在多愁善感的（?!）道德家中間激起許多偽善的憤慨（只是偽善的憤慨嗎？而不是反對現代社會秩序的合法憤慨嗎？），好象放縱的淫樂（原文如此！）本身是一種道德性”（同上）的著作家們，——象這樣的著作家們自然地一定努力於蒙蔽那阻止農業進步的資本主義的障礙，把一切都轉嫁在自然的“土地收益遞減的規律”身上，主張消滅城市與鄉村間的对立是“完全的幻想”。但是這些車爾諾夫先生們一定要具有怎樣無限的輕浮，才會重復這樣的論據並且同時責難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家們“缺少原則性而且是折衷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俄國財富”第11期，第246頁）！？車爾諾夫先生責難別人缺少原則性並且是機會主義者，——難道還能有比他更滑稽的人物嗎？

（列寧：“土地問題與‘馬克思底批判家’”，1901—1907年，
“土地問題理論”上卷，解放社1949年版，第132—138頁）

當工人階級戰勝一切資產階級的時候，它將奪取大業主的土地，將在大的地主田莊上來創立協作經濟，由工人共同協力耕種土地，自由選舉可靠的人來當管理員，配備有各種機器來減輕勞動，接班工作，每日至多八小時（或甚至六小時）。那時候，就是仍想照舊單獨經營的小農，也不會為市場而經營，不會為出賣給別人而經營，而為工人協作社而經營；小農將供給工人協作社以糧食、肉、青菜，而工人也將無代價地供給他以機器、耕畜、肥料、衣服以及農民所需要的其他一切東西。那時候再不會有大業主與小業主為金錢

而进行的斗争,那时候再不会有替别人作雇佣劳动的事情,而所有的劳动者都将为自己工作,工作中的一切改良和全部机器都将有利于工人自身,将减轻他们的劳动,将改善他们的生活。

(列宁:“告农村贫民书”,1903年,“论工农联盟”,
莫斯科1956年中文版,第131页)

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3页)

把这种报纸分成工业报和农业报是有害的,因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使工业和农业接近并且统一起来。实际上,工业无产阶级在城市和乡村,特别是在农业生活都市化和全国电气化事业上的领导作用,正需要有既适合工人又适合农民的统一的生产报纸(和对生产宣传的统一领导)。

(列宁:“生产宣传提纲”,1920年11月18日,“列宁全集”
第31卷,俄文第4版,第377页)

我们还没有做到通过工业品和农产品的直接交换来实现城市和乡村间、工业和农民经济间的这种结合,这种经常联系。所以没有做到,是因为我们的工业不够发达,我们还没有遍布全国各地的供应机关,而整个国民经济在战后又处于破坏状态。

(斯大林:“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1924年,
“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1页)

必須最大限度地供給农村拖拉机，因为这是使农业进行技术革命的手段，也是在农村中創立文化技术基地的方法。最后，必須实行电气化計劃，因为这是使农村接近城市和消灭城乡对立的手段。

（斯大林：“問題和答复”，1925年6月，“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2頁）

“在世界革命以后”，当我們的建設工作百倍加强的时候，工人和农民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經濟集团势必消失，变成土地和工厂的劳动者，就是說，他們的經濟地位将是平等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說，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将逐漸变成一个融合物，变成一个完整的統一体，变成一个由过去是工人和农民后来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所組成的社会主义社会。

（斯大林：“关于工人階級的同盟者农民”，1926年，“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90頁）

首先就要說到对宪法草案第一条的修正。这里有四个修正。……第四个修正是主张用“集体农庄庄員”或“社会主义农业劳动者”几字来代替“农”字。

是否应当采納这些修正呢？我認为是不应当的。

……。提出这个修正（指第四个修正——本書編者）的人，大概不是指現有社会而言，而是指将来社会，指将来已沒有階級，而工人和农民都已变成統一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的劳动者的社会而言。

（斯大林：“論苏联宪法草案”，1936年，“列宁主义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78—680頁）

城市和乡村間、工业和农业間的对立的基础，已經被我国現今的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

当然,这不是說,城市和乡村間对立的消灭应当引导到“大城市的灭亡”(見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不仅大城市不会灭亡,并且还要出現新的大城市,它們是文化最发达的中心,它們不仅是大工业的中心,而且是农产品加工和一切食品工业部門强大发展的中心。这种情况将促进全国文化的繁荣,并使乡村的生活条件向城市看齐。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經济問題”,1952年,
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3頁)

至于消灭城市(工业)和乡村(农业)間、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間的差別的問題,却完全是另一种性質的問題。這個問題沒有被馬克思主义的經典著作家們提出来过。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實踐所提出的新問題。

這個問題是不是臆造出来的呢?它对于我們有沒有什么實踐的或理論的意义呢?决不能把這個問題看作是臆造出来的。恰恰相反,它对于我們是极其重要的問題。

例如,如果拿农业和工业的差別來說,那末在我国,这种差別不仅归結为农业的劳动条件与工业的劳动条件不同,而首先和主要是归結为在工业中我們有生产資料和产品的全民所有制,而在农业中我們却有着不是全民的,而是集团的、集体农庄的所有制。前面已經說过,这种情况引导到商品流通的保存,只有工业和农业間的这个差別消失时,商品生产及其一切后果才会随之消灭。因而,不能否認,农业和工业間的这个本質差别的消失,对于我們应当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关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間本質差別的問題,也必須这样說。這個問題对于我們也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在开始展开群众性的社会主义竞赛以前,我国工业的发展是进行得并不順当的,有

許多同志甚至提出了要降低工业发展速度的問題。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太低，远远落后于技术人員的水平。然而当社会主义竞赛在我国已具有群众性的时候，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正是在这以后，工业就以加快的速度向前迈进了。为什么社会主义竞赛具有了群众性呢？因为在工人中間有了整批整批的同志，他們不仅掌握了基本的技术知識，而且更前进了，与技术人員站在同一水平上，开始糾正技师和工程师的缺点，打破已經陈旧的現行定額，采用新的更加现代化的定額等等。假如不是少数工人，而是大多数工人都把自己的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到了工程技术人員的水平，結果会怎么样呢？那我国的工业就会提高到其他国家工业所不能达到的高度。因而，不能否認，用提高工人文化技术水平到技术人員水平的办法，来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間的本質差別，对于我們是不能不有头等重要意义的。

某些同志断定說，經過一个时期，不仅工业和农业間、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間的本質差別会消失，而且它們之間的任何差別也会消失。这是不对的。工业和农业間本質差別的消灭，不能引导到它們之間任何差別的消灭。由于工业和农业中的工作条件有差別，工业和农业間的某种差別虽然是非本質的，无疑是会存在的。甚至在工业中，如果指的是各种不同的部門，那末工作条件也不是到处一样：例如，煤矿工人的工作条件不同于机械鞋厂工人的工作条件，采矿工人的工作条件不同于机器制造业工人的工作条件。如果这是对的，那末工业和农业間的某些差別，就更加要保存下来了。

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間的差別，也必須这样說。它們之間就文化技术水平悬殊來說的本質差別，无疑是会消失的。但是某种非本質的差別还会保存下来，至少是因为企业領導人員的工

作条件与工人的工作条件不一样。

持有相反論断的同志們，大概是依据我的某些言論中大家知道的一个說法，在那里說到了工业和农业間、体力劳动和腦力劳动間的差別的消灭，而沒有附带說明，那是指本質差別的消灭，而不是一切差別的消灭。同志們正是这样了解了我的說法，認為它的意思是說一切差別的消灭。但这就表明，这个說法是不确切的，不能令人滿意的。必須把它抛弃，用另一个說法，即用工业和农业間、体力劳动和腦力劳动間本質差別的消灭与非本質差別的保存的說法去代替它。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1952年，
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4—26頁)

一六 工业的合理分布,工业区和农业区的融合

科学院已开始对俄国自然生产力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调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应立即委托科学院。

建立一系列由专家组成的委员会,以便尽速制定改造俄国工业、振兴俄国经济的计划。

计划中应包括:

如何合理地分布俄国工业,使工业接近原料产地,并使得在从原料加工转到以后各个程序时即转到半制品加工和最后制成成品时能把劳动力的浪费减少到最低限度。

从工业尽量现代化尽量大规模化的角度,特别是从托拉斯的角度,来把生产合理地合并和集中于少数最大的企业。

最大限度地保证现在的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乌克兰及德国人占领的各省不在内)能在一切最主要的原料和工业品上自给自足。

特别注意工业及运输业的电气化和电力在农业中的运用。利用次等燃料(泥炭、劣质煤)以便在开采燃料和运送燃料上用最少的花费来取得电力。

注意水力和风力发动机,特别是它们在农业中的运用。

(列宁:“科学技术工作计划草稿”,1918年4月,“列宁论工业化”,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0—81页)

首先,应当注意到,把我国各地区划分为工业区和农业区的那种旧的分法已经过时了。我国不再有供给工业区以粮食、肉类、蔬菜的纯粹农业区,同样也不再可能指靠从外面,从其他地区得到一切必需的农产品的纯粹工业区。发展的趋势是我国所有的地区都要成为或大或小的工业区,而且愈往前去,它们也就愈会成为工业区。这就是说,乌克兰、北高加索、中央黑土区和其他从前的农业区已经不能再象过去那样把大批农产品运往别处,运往工业中心,因为现在它们必须供给本地日益增多的城市和工人了。由此可见,每个地区如果不愿意陷入困难的境地,那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农业基地,自己出产蔬菜、马铃薯、油类和乳类,并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出产粮食和肉类。你们知道,这件事情是完全做得到的,而且现在已经在做了。

任务在于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件事情进行到底。

其次,应当注意到,把我国各地区划分为消费区和生产区的那种大家知道的分法也开始失去它的绝对性质了。象莫斯科省和高尔基省这样的“消费”区今年也交给国家8,000万普特左右的粮食。这当然不是一件小事情。在所谓消费地节约有500万公顷灌木丛生的荒地。大家知道,这一带的气候并不坏,雨水不少,没有旱灾。如果清除这些土地上的灌木并采取一些组织措施,那就会有一个广大的谷物区,这个谷物区在当地单位面积产量一般很高的情况下,每年所能提供的商品谷物不会少于伏尔加河下游区或伏尔加河中游区现在供给的数量。这会给予北部各工业中心很大的帮助。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4年1月28日,“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94—295页)

一七 全面发展,体力劳动和 腦力劳动差别的消灭

个人的全面表现,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作用受到个人本身駕馭的时候,才不再成为理想,成为口号,这也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思想体系”,1845—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3卷,第282頁)

最后,分工又为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証,即:只要人們是处在自然发生的社会里,因而只要是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分裂的事实存在着,因而只要活动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分工,則人类本身的行为就成为与人对立的异己力量,它控制着人,而不是人支配着它。本来劳动一开始划分,每个人便各有一个既定的、專屬的活动領域,这就限制了他,使他摆脱不了;他是猎人,是漁夫,或是牧人,或是批判的批評家。如果他不願失去生活資料,他便必須安分守己——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人不是只有一个專屬的活动領域,而是随便在哪一行业里都可鍛炼自己,社会調节着一般生产,因而我也才能够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早晨打猎,下午捕魚,傍晚畜牧,飯后批評批評,随我兴之所至,用不着做猎人,做漁夫,做牧人,或做批評家。这种固守一种社会活动,这种把我们自己的生产物强变为控制我們的物的力量,以致它脱离了我們的监督,破坏我們的期待,毀灭我們的計算,正是历来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契机之一。

.....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思想体系”，1845—1846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3卷，第31—32頁，轉摘自“馬克思恩格斯論宗教”，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6—27頁)

由于分工的結果，艺术天才只是集中地表现在个别人身上，而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却无从发挥。即使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出色的画家，但是这也决不排斥使他成为一个别具风格的画家的可能性，因此，“人类的”和“单个人的”劳动的区别在这里毫无意义了。在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中，就绝对消除了完全由于分工而造成的艺术家对于地方的和民族的局限性的依赖性，使他不再束缚于某一艺术领域之内，而仅仅当一名画家、雕刻家等等，因此只要用他的活动的一种称呼就足以表明他的职业发展的局限性和他对分工的依存性。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而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从事的活动之一的人们。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思想体系”，1845—1846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3卷，第393頁)

我們在前面已經表明，要消灭我們的相互关系同个人的分离和对立、个性对偶然性的屈从、个人的私人关系对共同的阶级关系的屈从等等这样一种制度，归根到底要取决于分工的消灭。我們也會表明，只有当交往和生产力发展到这样普遍的程度，以致私有制和分工变成了它們的桎梏的时候，分工才会消灭。我們接着指出，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私有制才会消灭，因为交往的現有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們，即才可能使它們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命活动。我們也會表明，現在个人必須消灭私有制，因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已經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在私有制的統治下竟成了破坏的力量，同时

还因为阶级对立达到了极点。最后我们也指出：私有制和分工的消灭，同时也就是个人在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建立的基础上的团结一致。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即在个人独特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单一的社会内——，这种发展正是由个人的联系决定的，这种联系是通过三个方面，即通过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合作以及以现有生产力为基础的个人的普遍性表现出来的。因此，这里指的是在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个人（更不用说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革命了，因为它本身就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共同条件），而决不是任何偶然的个人。当然，个人的相互关系的意识在个人那里也会变成完全另外一种东西。因此，它既不会是‘爱的原则’或 *dévouement*（忘我精神——原编者），也不会是利己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思想体系”，
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2版第3卷，第440—441页）

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格。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癡呆。

（马克思：“哲学底贫困”，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2页）

……阶级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到那时现在这种分工也将完全消失，因为要把工业和农业生产提高到上述的那种水平，单靠机械的和化学的辅助工具是不够的，还必须相应地发展人们运用这些工具的能力。当十八世纪的农民和手工工场工人被吸引到大工业中以后，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而完全成为另一种

人,同样,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生产的社会管理不能由现在这种人来进行,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只隶属于某一个生产部门,受它束缚,听它剥削,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只能发展自己能力的一方面而偏废了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个生产中的某一个部门或者某一个部门的一部分。就是现在的工业也渐渐不能使用这样的人了。由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的工业,就更加需要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能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因此现在已被机器动摇了的分工,即把一个人变成农民、把另外一个人变成鞋匠、把第三个人变成工厂工人、把第四个人变成交易所投机者的这种分工,将要完全消失。教育可使年轻人很快就能够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就会使他们摆脱现代这种分工为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的各方面的才能,而同时各个不同的阶级也就必然消失。因此,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一方面不容许阶级继续存在,另一方面这个社会的建立本身便给消灭阶级差别提供了可能性。

由此可见,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将是同样的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单从物质方面的原因来看,这已经是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了。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只是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表现,它是进一步发展的阻碍,这种阻碍在目前已经深深地感到了。

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

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0—371页）

手工制造业使劳动者化为一个畸形体。拉布拉达诸州的屠户，专为毛皮或脂肪，而杀去兽的全身；同样，手工制造业也牺牲一个生产冲动和生产能力的世界，温室似地，助长他的部分熟练。不仅特殊的部分劳动，分配在不同的个人间；各个人现在也被分割而转化为一种部分劳动的自动的原动机。……

……手工制造业分工的一个产物，是物质生产过程的精神能力，当作别人的所有物，当作支配劳动者的权力，和劳动者相对立。这个分离过程，开始于简单的协作，发展于手工制造业，完成于大工业。在简单的协作上，资本家是在一个一个的劳动者面前，表现为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在手工制造业上，劳动者被畸形化为部分劳动者。大工业则把科学当作一种与劳动分离并为资本服务的独立的生产能力来利用。……

亚当·斯密说：“大多数人的悟性，都是由他们日常的工作必然形成的。终生从事少数种简单工作的人……没有使用悟性的机会。……他们通常是尽人类之所能，成为最愚钝最无智的。……单调的固定的生活，自然会坠落他的志气。……那还会破坏他的身体的活动力，使他在惯作的部分工作之外，不能活泼地，持久地，运用自己的力量。他在他的特殊职业上，取得了技巧，但这种技巧的取得，不免把他的理智的、社会的、斗争的德性牺牲掉。在每一个工业的文明的社会内，这都是贫穷劳动者（即人民大多数）必须

陷入的状态。”……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63—1867年，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35—437頁)

机器虽在技术方面扫除了旧的分工制度，但这个制度，……在資本手里，当作劳动力剝削的手段，用更可厌的形态，系統地再生产出来，确立起来。以前是終生專門使用一种部分工具，现在是終生專門服侍一个部分机器。机器被濫用了，其目的，在使劳动者自己，从幼时起，即变为部分机器的一部分。……

……机器劳动既然使神經系統极度疲乏，同时又抑压筋肉的多方面的作用，并在心身两方面，不許有自由的活动。

……生产过程的精神能力与筋肉劳动分离了。此种能力已轉化为資本对于劳动的支配权。如我們以上所說，这种分离与轉化，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上面完成的。个别的什么也沒有了的机器劳动者，可以还有部分的熟練，但这种熟練，在科学面前，在惊人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体劳动面前，是当作极微細的附項，消灭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63—1867年，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12—514頁)

……从前各种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在本質上是保守的，近代工业的技术基础却是革命的。它会使劳动者的机能及劳动过程的社会結合，由机器，化学过程，及其他各种方法，而与生产的技术基础一同不断地发生革命。它还使社会內部的分工不断发生革命，使大量的資本和大群的工人，不絕从一个生产部門投到別一个生产部門。所以，大工业的性質，一方面必致引起劳动的变更，机能的流动，和劳动者的全面的运动性。但在別方面，它又在它的資本主义形态上再生产了旧式的分工，及其凝固的特殊性。这是一种

絕對的矛盾。我們曾經看到，这个絕對的矛盾，怎样夺去了工人生活状态的安靜，安定，安全；并在夺去工人的劳动手段时，不断夺去他的生活資料，威胁着要使他自己和他的部分机能一同变成过剩的；这种矛盾，又怎样爆发成为工人階級的不断的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費，和社会无政府状态的荒廢。惟以上皆属于消极方面。劳动的变更，現在固然只当作无可如何的自然律，并以自然律在遇到障碍时，無論在何处都会有的盲目的破坏力，来发生作用，但大工业还由它的激变自身，把下述的事情，当作生存还是死亡的問題：那就是，把劳动的变更和劳动者尽可能最大的多方面性，当作一般的社会的生产法則来承認，并使各种关系和这个法則的正常实现相符合。它还把这个当作生存还是死亡的問題：为变化着的資本剝削欲准备好，随时讓它去利用的貧穷劳动人口的惊人的多，要由人对于时时变化的劳动需要随便怎样都可以利用的性質去补充；只当作一个社会部分机能負担者的部分个人，要由一个完全发展的，把不同社会机能当作互相替换的活动方法来作的个人去补充。这个革命过程的以大工业为基础的自然发展的要素之一，是工艺学校与农业学校，別一个是职业学校。工人子女，在那里，对于工艺及各种生产工具的实际使用法，受得若干的教育。工厂法，当作最早的从資本手里逼出的貧弱的讓步，虽然不过把小学教育和工厂劳动相結合；但沒有疑問，工人階級在不能避免地夺得政权以后，还会在理論方面和实用方面，使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內占得位置。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63—1867年，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95—597頁）

……正是由于有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方才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有了可能在大家合

理分工条件下，不仅生产出充分的物品来满足一切社会成员的大量消费和造成丰富的后备储藏，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可以从历史上留传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公共生活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承受而已，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公有物，促使其进一步的发展。关键就在这里。人的劳动生产力一发展到这样的高度，则用以支持统治阶级生存的任何借口便归于消灭。要知道，辩护阶级差别的最后理由总是说：一定要有一个阶级无须每日疲劳于图谋生计而有暇为社会从事精神劳动。这种至今还有过不少历史理由的废话，已被近百年来的工业革命一劳永逸地斩掉根蒂了。统治阶级的存在，日益愈加成为阻挠工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同样也是阻挠着科学和艺术发展，特别是阻挠着文明公共生活方式发展的障碍。从来没有什么人比我们现代的资产阶级更为不学无术的了。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
莫斯科1955年中文版，第543—544页）

在生产自发地发展起来的一切社会中（近代社会也正是这样的社会），不是生产者支配着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支配着生产者。在这样的社会中，每种新的生产的杠杆，必然地转成为生产资料奴役生产者的新工具。在大工业发生前最有强大力量的生产的杠杆——即分工，尤其是如此。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已使乡村人口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中，而城市居民，则为各人专门的手艺所奴役。它（城市与乡村的分离。——译者）破坏了乡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破坏了城市居民的体力发展的基础。如果农民拥有土地而手工业者具有手艺，那么在同等的程度

之下，土地支配着农民，而手艺支配着手工业者。随着这种分工，人自己也分成几部分。为着行动的某一方面的发展，一切其他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就遭受了牺牲。人身的残缺，与分工同时并进，它在手工工场中，达到了最高的发展。手工工场，把手工分成个别的精细的动作，而把每种动作，分给个别工人，作为他们终生的职业，使他一生束缚于一定的精细动作和一定的劳动工具之上。“它(手工工场——译者)人为地养成工人的精细技艺的发展，压抑整个生产的冲动和谋划，而使工人变成畸形人……个人的本身被分解开来，转成为执行该一部分工作的自动机”(马克思)，这种自动机，在许多场合上，简直是通过工人的肉体的和精神上的残废，才得以完成的。大工业的机械，更把工人从机器的地位转成为机器附属品的角色。“终身的管理部分工具的专长，转成为终身的、为精细机器服务的专长。机器被滥用来使工人从其极早的儿童时代起就转成为精细机器的组织部分”(马克思)。不仅是工人，而且直接或间接剥削工人的阶级，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的活动的工具所奴役：精神上空虚的资本家，为自己的资本及自己的利润欲所奴役；律师为自己的化石似的法律观念所奴役，这种观念，作为独立的力量支配着他；一般的“有教养的阶级”，为各种地方限制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自身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近视性所奴役，为自己的残缺的专门教育和终身束缚于这一专门技能的事实所奴役，——虽然他们的专门技能，只是在于坐吃现成，无所事事。

乌托邦主义者已经充分明白地了解分工所造成的结果，一方面是它所引起的工人的残缺，他方面是劳动行为的残缺，这种劳动行为，只是在于单调地机械地终身重复同一的动作。欧文和傅立叶也要求废除城市与乡村间的对立，以为这是消灭旧的一般分工制度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他们两人都以为人口应该分成一千六百

人到三千人的集团，分布全国，每个集团在其领土之中央住居极大的宫殿，而进行共同的家计。虽然傅立叶在有些地方也说到城市，但是这些城市本身只是由相互毗连的四五个大宫殿来组成的。根据这两个乌托邦主义者的计划，每个社会成员，既从事农业又从事工业。在傅立叶看来，手工业手工工场在产业中操着最主要的作用，相反的，在欧文看来，大的工厂生产，却已经操着最主要的作用，他还以为在家计的工作上也应该应用蒸汽的和机器的力量。但他们两个都要求每人在农业上、在工业上，都有尽可能更多的行业的调换，使得按照这种情形，青年可在教育中尽可能地学会更全面的技术活动。根据这两个人的意见，人应该通过全面的实际活动，来全面地发展自己的能力，劳动应该重新获得它在分工以后所丧失的那种引入性质，——首先就是象上面所说那样，经常调换行业，而且相适应地使劳动的每一“会期”（“Séance”，用傅立叶的话）不能过长。上述的两位乌托邦主义者，都远远地超出了杜林先生所承袭的剥削阶级的见解，这种见解，以为城市与乡村间的对立，按照事物的本性，是不能除去的，这种见解拘束于这样的狭隘的观念，以为一定数目的“人”，应该被命定生产某一种物品，它要使人們因生活方式而分别的“经济变种”的存在永存不灭——这些人，由于不致力于别种事情而仅仅致力于一种事情，所以感到满足，因之他们是这样的空虚，使他们甚至以自身被奴役、被转成单调动物为快乐。和“癡人”傅立叶的最狂勇的幻想中所包含的根本思想相较，和“粗野、无力及贫弱”的欧文的最贫弱的思想相较，自身为分工所支配的杜林先生，正是一个目光如豆的侏儒。

……解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桎梏的社会……造就了全面发展的生产者的新一代，这些生产者，懂得整个工业生产的科学基础，并且其中每人从头到尾地实际阅历过整个系列的生产部门。这样

的社会,将造成新的生产力。……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8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03—313頁)

資本主义所必然遺留給社会主义的,一方面是工人中間有旧的,历来形成的职业上和手艺上的分立;另一方面是职工会,它們只是很緩慢地,經過許許多多年才可以而且定会发展成为規模較大、行会气味較少的生产工会(不仅包含同行、同艺和同一职业,并包含整个生产部門),然后經過这种生产工会,进而消灭人与人中間的分工,以及教育,訓練和培养出具有全面知識的,受有全面訓練的人,即能够作所有一切事情的人。共产主义正是向这个方向走去,它必須向这个方向走去,并且定能到达这个目的,不过須要經過許多年份。目前就企图具体实现那完全发展的、完全巩固和形成的、完全开展和成熟的共产主义所将造成的此种未来結果,这无异于教四岁的小孩去学高等数学。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1949年中文版,第715—716頁)

在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級阶段乃是这样一个制度:其中“粗”工和“細”工間的区分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間的矛盾已完全消除,劳动一律平等。在社会中占統治地位的是真正共产主义的原則: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27頁)

馬克思和列宁說过:熟練劳动和非熟練劳动之間的差別,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即使在階級消灭以后,也还会存在;这种差別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会消失。……

(斯大林:“新的环境和新的經濟建設任务”,1931年,“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4頁)

可是，斯达汉諾夫运动底意义还不只于此。它的意义还在于它准备好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

.....。

.....只有在工人阶级文化技术水准提高到工程师、技师水准的基础上，才可消灭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間的对立性。如果以为沒有提高到这个水准的可能，那就是可笑的想法了。这在苏維埃制度下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这里全国的生产力摆脱了资本主义底枷鎖，劳动摆脱了剝削制度的压迫，工人阶级掌握着政权，工人阶级底青年有受到完备技术教育的一切机会。毫无疑义，一定要把工人阶级文化技术水准提到这样的高度，才可打破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間对立性底基础；也只有这样，才可保证必要的高度劳动生产率与十分丰富的消费品，以便开始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

（斯大林：“在第一次全苏斯达汉諾夫工作者會議上的演說”，1935年，“列宁主义問題”，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42—643頁）

一八 教育和文化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說認定，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业已改变的教育的产品，——这种学說忘記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身必須是教育成的。因此，这种学說必然导致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比如罗貝尔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

环境改变和人們活动改变的一致，只能看作和合理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馬克思：“费尔巴哈論綱”，1845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1955年中文版，第402頁）

所有这些对于共产主义的物質产品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資备，同时又推广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消灭階級性的所有制——在資产者看来就是消灭生产本身，同样，消灭階級性的教育，在他們看来，就等于消灭整个教育。

資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于絕大多数人來說不过是把人变成机器的附屬品罢了。……

但是，你們却硬說，我們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們最亲密的关系（按指家庭关系——摘者注）。

难道你們的教育不是由社会来决定的嗎？不是由你們借以进行教育的那些社会关系决定的么？不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間接的干涉决定的么？共产党人并没有臆造什么社会

对教育的影响；他們仅仅要改变教育的性質，想要使教育摆脱統治階級的影响。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5—486頁）

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免费教育。取消現今形态的厂内童工劳动。将教育同物質生产結合起来等等。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5—486頁）

工厂法中关于教育的規定尽管整个說来是意义不大，但是毕竟把小学教育宣布为必須的劳动条件了。这些規定的成功，第一次証明了，教育与体操和体力劳动的結合是可能的，也就是說，体力劳动和教育与体操的結合是可能的。工厂視察員在听取学校教师的証明以后，很快就发觉，工厂儿童与正規地白天上学的学生比較，虽然受教育的时间少一半，但学的东西一样多，而且往往更多。“問題很簡單。他們虽只上学半日，但是他們始終是有朝气的，几乎总是能够并且愿意学习的。劳动和学习相互交換的制度，使工作与教育交互成为休息和精神恢复的事情，可見，这种制度比連續不断做这两件事情中的一項，是对儿童更适合得多的。一个从早晨起坐在学校內的儿童（尤其是暑天），不能和一个工作回来精神飽滿的儿童相比的。”关于这一点，西尼耳1863年在爱丁堡社会学大会的演說，也可以为証。在那里，除了別的事情，他曾說明，上层和中层階級儿童的片面的、不生产和長時間的受业时间，徒然增加教师的劳动，“同时不仅无益地，而且直接有害地使儿童浪費时间、健康和精力”。正如欧文詳細說明过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产生了未来时代的教育萌芽，这种教育使每一个超过一定年龄的儿童把生产劳动跟上课和体操結合起来，这不仅是增加社会生

产的一个手段,并且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63—1867年,參見
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90—591頁)

我們認為,現代工業吸引男女兒童和少年參加社會生產的大事業的趨勢是進步的、健康的、合乎規律的趨勢,雖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它是畸形的。在合理的社會制度下,每個兒童從九歲起都應當成為生產工作者,正如每個有勞動能力的成人都應當服從一般的自然規律一樣,這個規律就是:為了要吃飯,他應當勞動,不僅用腦來勞動,而且用手來勞動。

但是目前我們所談的男女兒童和少年應當分為三類,要採取三種不同的態度來對待他們:第一類包括9—12歲的兒童,第二類包括13—15歲的兒童,第三類包括16—17歲的兒童。我們建議法律對兒童在任何作坊或家庭里的每日勞動時間作如下的限制:第一類兒童二小時;第二類四小時;第三類六小時。第三類兒童在勞動時至少應當停工一小時用來吃飯或休息。

也許,小學教育最好從九歲開始;不過我們這裡只談反對社會制度趨勢的一種最必要的消毒劑,這種制度把工人降低為積累資本的簡單工具,把那些被貧困壓得喘不過氣來的父母變成出賣自己親生兒女的奴隸主。兒童和少年的權利應當得到保護。他們自己沒有能力來保護自己。因此社會有責任來保護他們。

如果中、上層階級輕視對自己子女應盡的責任,這是他們的錯誤。享有這些階級特權的孩子們,卻不免被這些階級的偏見所害。

對工人階級說來,情況完全不同。工人的行動不自由。在很多場合,他們甚至過於無知,不能正確理解自己孩子的利益或人類發展的正常條件。但是無論如何,工人階級的最有教養的一部分

会完全了解，他們的階級的未來，也就是人類的未來，完全取決於正在成長的工人一代的教育。他們知道，首先應當使兒童和少年不受現代生產體系的破壞作用的危害。這只有通過變社會意識為社會力量的途徑才能辦到，在目前的條件下，只有通過國家政權強制執行的普遍的法律才能辦到。工人階級要求有這種法律，決不是為了鞏固政府的權力。相反地，工人階級應當把目前用來反對他們的政權變為自己的武器。工人通過普遍立法能夠得到靠許多分散的個人努力所無法得到的東西。

從這一點出發，我們說，如果不把勞動和教育結合起來，父母和企業主在任何場合都不可能解決兒童和少年參加勞動的問題。

我們把教育理解為以下三件事：

第一：智育。

第二：體育，即體育學校和軍事操練所傳授的那種東西。

第三：技術教育，這種教育要使兒童或少年了解一切生產過程的基本原理，同時使他們獲得使用一切生產的最簡單的工具的技能。

智育和體育以及技術教育的課程的逐漸複雜的程度，應當同兒童和少年工人按各類不同年齡的劃分相適應。技術學校的一部分開支應當由出賣這些學校的產品來補償。

把有報酬的生產勞動、智育、體育和綜合技術教育結合起來，就能夠把工人階級提高到比中、上層階級高得多的水平。

不言而喻，法律應當嚴格禁止所有9—17歲（包括17歲在內）的人在夜間和一切有害健康的生產中勞動。

（馬克思：“給臨時中央委員會代表的關於幾個問題的指示”，1866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俄文第1版，第13卷上冊，第198—199頁，轉摘自“教育譯報”1957年第1期）

……他(指杜林——本書編者)不但对于整个的“眼睛所看得見的将来”,而且还对于过渡时期,都有一种最后制定的学校与大学的計劃。現在我們只限于考察在最終的完美的共同社会組織中,預定向青年男女教导的是些什么东西。

普通国民学校,教給学生“以一切在本身上在原則上可以引人兴趣的东西”。因之,特别是“一切关于宇宙观以及人生观的科学的基础与主要結論”。在这学校中,首先要教授数学,而且要教得这样,使能“全部教完”一切原則概念和方法,从简单的加減乘除起,直到微积分止。这不是說,在这学校中真的学习微分积分,不是的。在这学校中,将教授完全新的、綜合数学的原素——这些原素,包含寻常初等数学的萌芽以及高等数学的萌芽。虽然杜林先生告訴我們,将来这种学校的“教科書的內容”已經“概括地在他的眼前具有主要輪廓”。但可惜直到現在,他还不能发现这种“綜合数学的原素”;可是他所不能做的事情,“應該在实际上待之于新社会制度的自由的与往上增长的力量。”如果将来数学的葡萄,还是青酸不堪,那么将来的天文学、力学和物理学,将不会是什么困难,而将成为“全部学校教育的核心”,至于“植物学和动物学,那么不管它們的理論如何,主要还終究是带着描写的性質”,它們大多作为“一种輕松的談話資料”。在“哲学講义”的第417頁上,是这样說的。杜林先生直到現在,还只知道主要是描写式的那种植物学和动物学。包含比較解剖学、胚胎学、古生物学等的全部有机界形态学,杜林先生甚至連名称都不知道。当生物学的領域上差不多十数种完全新的科学在杜林先生背后产生出来的时候,杜林先生的儿童似的感觉,还是繼續地从拉夫的“儿童自然史”中去擷取“自然科学思維方法的最近代的教育原素”,并为整个的“眼睛所看得見的将来”,頒布这种有机界的宪法。至于化学的存在,那么他按照

老习惯，在这里也是完全忘記了。

至于美学方面的教育，那么杜林先生不得不将一切重新做起。以前一切的詩，都是不中用的。在一切宗教都被禁止的地方，自然在学校中不能忍受以前詩人所常有的“神話式的及其他宗教式的点綴”。同样的，“例如哥德那样的人所强烈倾向着的詩的神秘主义，”也是同样不中用的。这样，杜林先生自己不得不下定决心为我们写出“和幻想（它是与理性相适应的）的更高的要求相称的”詩的杰作，而描写出“指明世界完美性”的真正理想。只是，請不要迟緩吧！經濟公社只有用那种与理性相协调的亚历山大詩的快步，来庄严地前进，才能征服世界呵。

至于語言学，那么将来的青年公民，可以不必挂虑。“死的言語，全被擯弃……至于活的外國語的研究則是……次要的事情，”只有在各人民間的关系扩大成为人民大众本身的移动时，外國語才能按需要程度，以簡便的形式，为每人所学习。“对于語言的真正有教育的研究”，应当从一种总的文法中去求得，特别是从“本国文的材料和形式”中去求得。在杜林先生看来，現代人的民族狹隘性还是过于世界化了。他想消灭現在世界上稍能使人超越狹隘民族观点的两种楨杆——他要废除关于古代語言的知識，这种知識至少給各民族中受过古典教育的那些人，展开他們所共通的更广大的視野；同时他又不要废除关于新語言的知識，这些新語言可以被用来使各民族的人能够互相通話，并了解本国以外所发生的事情。可是本国文的文法，則應該讀得烂熟，但是要能了解“本国文的材料和形式”，就只得追溯它的发生及其逐步的发展，如果一不顧本国語言自身的已死形态，二又不顧同类的話的語言及死的語言，那么上述这种了解，也是不可能的。这样，我們又陷于被禁的領域中了。杜林先生既把全部近代的历史的文法，从他的教育計劃上勾

去，那么在他的語言研究上就只剩得一种旧式的技术文法，这种文法采取旧时古典語言学的模型，并且，因缺乏历史的基础而带着自己的全部的詭辯性和任意性。杜林先生对于旧語言学的憎恶，使他竟至把它的最坏的产品，当作“真正有教育的語言研究的核心”。显然的，我們所遇到的这位語言学者，从来沒有听见过六十年来这样巨大地这样成功地发展着的历史語言学，所以他不是从波柏 (Bopp, 1791—1867)、格立姆 (Grimm, 兄 Jakob 1785—1863; 弟 Wilhelm, 1786—1859) 及田芝 (Diez, 1794—1876) 而是从久已去世的海夷士 (Heyse, 1764—1829) 及培克尔 (Becker, 1775—1849) 去寻求“最近代的教育要素”。

可是就在受了所有这些教育以后，将来的青年公民，也还不能“站稳脚跟”。为要达到这点，还需要經過“最后哲学基础之領会”来奠定更深刻的基础。可是自从杜林先生在这領域上鋪下自由的道路以后，“这种深刻化……就不是什么巨大的任务了”。真的，“如果从存在的一般图式所引以为荣的不多的严密的知識上，清除掉錯誤的煩瑣的粉飾，如果决定到处承認”杜林先生“所証明的现实为妥当”，那么初等哲学，也将为将来的青年所完全領会。“只要記起，我們在使无限这一概念及其批判带上从来未有的意义之时，用的是怎样絕頂簡單的方法，”只要記起这点，就“完全沒有絲毫理由說現在已經加深了的、更形确切了的、因而采取如此單純形式的、普遍空間時間概念的因素，不能最后地轉入于预备知識的行列之內……。”杜林先生的“最根本的思想，在新社会的普遍的教育体系中，不应操着次要的作用。”相反的，物質的不变状态以及已被算尽了的无限数，正是負着这样的使命，“不但使人站稳了脚跟，而且还使他自己理解到所謂絕對物是已被踩在他的脚底下了。”

这样，讀者可以看到，将来的国民学校，在本質上說来，不是別

的,只是稍为“高貴”些的普魯士的中等学校,在那里面,希腊文和拉丁文,为数量較多的純粹数学和实用数学,特别是为现实哲学的原素所代替,而德文的教授則更退步到久已去世的培克尔时代的情形,就是說差不多退到四年級的程度。真的,“完全沒有絲毫的理由”,为什么杜林先生的“認識”(經過我們考察之后,这种認識在一切他所說到的領域上,都是絕頂的、小学生似的幼稚),更正确点說,为什么經過預先根本“清除”之后所余留下来的东西,不能最后地完全轉入于“預备知識的行列”之內,其实它也就从来沒有脱离过这一行列。自然杜林先生耳边听到一点說,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和教育将被結合起来,因之,新起的世代将保證有多方面的技术訓練和科学教育的实际基础;他于是就照着他的老調把这点利用于共同社会的公社中。可是,象我們所看到的,由于在杜林式的将来生产中,过去分工的基本特征都是平安地保存下来的,所以这种学校的技術教育,就被剝夺了以后一切实际的效用,就被剝夺了任何对于生产本身的意义;它在杜林先生那里,只抱着学校教育的目的,即是去代替体育;关于体育,我們的这位激进的革命家,是連听也不愿意听的。这就是为什么杜林先生在这部分上除了“青年人和老年人應該在作工这个詞的严格意义下去作工”那样的几句空話以外,再沒有說出什么东西来。这种輕率的无内容的廢話,和馬克思在“資本論”上所說的比較起来,真是可怜到了极点,馬克思在“資本論”上(参考中文版第1卷第593—598頁附近——譯者注)發揮了这样的見解:“象在欧文的書上所能詳細看到的,从工厂制度里,产生将来教育的萌芽,在将来,一定年齡以上的儿童,将把教育、体育和生产劳动結合起来,这不但是增加社会生产的方法,而且是产生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我們不再說及将来大学的問題,——在这种大学中,现实哲学

將是一切知識的核心，並且在醫科之外，還繁榮着法科；我們也不管“專門技術學校”，——關於這種學校，我們知道，它們預定只有“兩三種課程”。我們假定，將來的青年公民，讀完了一切學校課程，這樣地“站穩了腳跟”，使他能夠尋找妻子了。杜林先生給他以什麼道路呢？……。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8年，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第336頁—340頁）

“禁止童工”。此地絕對必須指明年齡限度。

完全禁止童工是和大工業的存在不相容的，所以這是空洞的
虔誠願望。

實行這一措施，——如果是可能的話——就是反動的，因為在按照各種年齡嚴格調節工作時間的條件下，在其他保護兒童的預防措施之下，生產勞動和教育的早期結合是改造現代社會的最強有力的手段之一。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1891年6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選”
兩卷集第2卷，莫斯科1955年中文版，第34頁）

……應該培養出一支腦力勞動的無產階級大軍，這支大軍應當同自己的體力勞動的弟兄們一起，在即將來臨的革命中發揮巨大的作用。

以往的資產階級革命只要求大學培養律師，他們把這批人做為良好的原始材料，從其中製造出他們的政治活動家。為了工人階級的解放，除這些而外，還需要醫生，工程師，化學家，農學家和其他專家，因為將來我們要掌握的不僅是政治機器，而且是整個社會生產，這裡需要豐富而踏實的知識，不是響亮的詞句。

（恩格斯：“致社會主義者大學生國際會議”，1893年12月19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俄文第1版第16卷，第2冊，第374頁）

……这个正确的思想就是，沒有年輕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結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在想象的：無論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沒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現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識现状所要求的高度。这个思想还是偉大的老空想家們提出来的；“学生們”（摘者注：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繼承者們）也完全贊同这个思想，并且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們原則上并不反对妇女和少年的工业劳动，認為完全禁止这种劳动的企图是反动的，而只是主张在完全合乎卫生要求的条件下来安排这种劳动。……

为了使普遍生产劳动同普通教育相結合，显然必須使所有的人都把参加生产劳动的义务担負起来。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吧？可是事实并不如此。我們的“民粹主义者”对这个問題的解决却是这样的：体力劳动的义务的确應該作为一个共同原則确定下来，但这决不是为所有的人規定，而只是为穷人規定的。

……因此义务生产劳动在我們的民粹主义者看来就不是人类普遍和全面发展的条件，而只是为了付中学学費。……

（列宁：“集民粹主义空想計劃之大成”，1897年，“列宁全集”俄文版，第4版第2卷，第440—441頁）

俄国民主共和国宪法应当保証：……对未滿十六岁的男女儿童一律实行免費的普通义务綜合技术教育（从理論上和實踐上熟悉一切主要生产部門）；把教学工作和儿童的社会生产劳动密切結合起来。

（列宁：“修改党綱的材料”，1917年，“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8—439頁）

以往全部人类智慧、全部人类天才的創造，只是把技术和文化的一切財富給予一部分人；而剝夺另一部分人最必需的东西——

自豪和发展。現在一切技术奇迹、一切文化成果都成为全民的财产，而且从今以后，人类的智慧和天才永远不会变成暴力手段，变成剝削手段。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閉幕詞”，1918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6卷，第436頁，轉摘自“政治經济学教科書”，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43頁)

資产階級的虛伪表现之一就是相信学校可以脱离政治。你們都清楚地知道这种想法多么虛伪。提出这个原理的資产階級自己就把資产階級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竭力把学校用来專門替資产階級訓練恭順的和能干的奴才，甚至竭力利用普遍教育来專門替資产階級訓練資本的走卒和奴隶，他們从来不想使学校成为培养人格的工具。現在大家都知道，只有同一切被剝削的劳动者有密切联系的、誠心誠意拥护苏維埃綱領的社会主义学校，才能成为这样的工具。

……教师中間的資产階級分子总是認為只有富人才能受到真正的教育，認為大多数劳动者不能成为生活的真正主人，只須訓練成好仆役好工人就够了。……

……你們的联合会就是这样的联合会。如果你們站在这个立場上，你們就能爭取到广大的教师，使知識和科学成为解放被剝削的劳动群众的工具，不再是特权者的东西，不再是巩固富人和剝削者的陣地的材料。……

(列宁：“在全俄国际主义教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1919年1月18日，“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6—389頁)

在国民教育方面，俄人給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1917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把学校由資产階級的階級統治工具变

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是说，不仅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在思想、组织和教育方面传播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的和非无产的阶层的影响，以利于彻底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现时这方面的最迫切的任务是：

(1) 在苏维埃政权的全面帮助下，进一步发挥工人和劳动农民在教育方面的自动性；

(2) 不仅象现在这样把教师的一部或大部彻底争取过来，而是要把全体教师彻底争取过来，驱逐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保证老老实实地执行共产主义的原则；(政策)

(3) 对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儿童实行免费的普遍义务综合技术教育(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熟悉一切主要生产部门)；

(4) 把教学工作和儿童的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

(5) 国家供给全体学生膳食、服装、教材和文具；

(6) 吸引劳动居民积极参加国民教育事业(发展国民教育委员会，动员识字的人等等)；

(列宁：“俄共(布)党纲草案”，1919年，“列宁全集”
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7页)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即在准备共产主义完全实现的条件时期，学校不仅应当成为一般共产主义原则的传播者，而且应当从思想上、组织上、教育上实现无产阶级对半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的影响，其目的在培养能够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

(列宁：“俄共(布)党纲草案”，1919年，“列宁全集”
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8页)

……要建设共产主义，就必须掌握技术，掌握科学，并为更广

大的群众运用它們……我们要运用全部国家机关，使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实际訓練等等，都在共产党員领导之下，为无产者、为工人、为劳动农民进行工作。

（列宁：“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1920年，“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9頁）

……全部关键就在于从改造旧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起，那些将担負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新人底学习、訓練和教育，也就决不能是旧时那样的了……

……只有把訓練青年、組織青年和教育青年的事业根本改造，我們才能使这代青年努力的成果得以建立起一个与旧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

旧时学校总說它是要培养出通曉各种知識的人，它所教授的是一般的科学。我們知道，这完全是撒謊，因为当时整个社会都是建筑和支持在把人們分成各階級，分成剝削者与被压迫者的基础之上。自然，旧时所有浸透了階級精神的学校，只能使資产階級的儿女获得知識。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話，都无非是根据資产階級利益捏造出来的。

在这样的学校里，工农青年所受到的与其說是教育，不如說是为迎合資产階級利益的奴化訓練。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要为資产階級造成适用的奴仆，即能替主人創造利潤，同时又不会惊扰主人的安宁与閑逸……

旧时学校是崇尚書本的学校，它强迫学生去通曉一大堆无用的、累贅的、死板的知識，这种知識閉塞着青年的头脑，并把他們变成一些依法泡制的官吏。但是，如果你們从此便想做出結論，說无須通曉人类所积累起来的知識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們便犯了极大的錯誤。如果以为无須領会共产主义学說本身所由产生的

全部知識，而只要通曉共產主義口號，只要通曉共產主義科學的結論就已經足夠了，這種想法也是錯誤的。……

凡人類社會所創造出的一切，他（馬克思——摘者注）都用批判態度來審查過，任何事物也沒有忽視過去。凡人類思想所建樹出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討過，批判過，並根據工人運動的實踐來一一檢驗過，于是就作出了那些與資產階級狹隘性限制或被資產階級偏見束縛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結論。……

你們知道得很清楚，電氣化事業中，不識字的人是沒有用處的，而且僅僅是識字還不夠。這里只懂得什麼是電氣還不夠；應該懂得怎樣在技術上把電氣應用到工業，農業以及工農業的各個部門中去。每個人必須學會這點，必須教導整個勞動青年後輩都學會這點。

……他（青年團員——摘者注）必須認清，只有在現代知識基礎上，他才能建立共產主義社會，如果他不通曉這種知識，那共產主義就始終不過是一種願望而已。……

我們摒棄一切從超人類和超階級的概念中援引出來的德性。我們說，這是欺騙，這是為了地主資本家利益來愚弄和禁錮工農頭腦的伎倆。

我們說，我們的德性完全服從於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利益。我們的德性是從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利益中引伸出來的。

……我們說：道德就是用來破壞舊時剝削者社會，並把全體勞動大眾團結到創立共產主義者新社會的無產階級周圍的工具。

（列寧：“青年團底任務”，1920年10月2日，“列寧文選”
兩卷本第2卷，莫斯科1949年中文版，第793—809頁）

所以，現在還是十四五歲，但經過一二十年就會在共產主義社會內生活的這一代人，應當這樣定下自己學習的全部任務，使青年

每天在任何乡村,任何城市里,都能实际解决公共劳动中的某种任务,那怕是最微小,平常的任务。

要保證共产主义建設成功,就要看上述工作在每个乡村里进行得怎样,就要看共产主义竞赛发展得怎样,就要看青年能够結合自己劳动的实际本領怎样。

(列宁:“青年团底任务”,1920年,“列宁文选”两卷集
第2卷,莫斯科1949年中文版,第816頁)

(一)在苏維埃工农共和国里面,整个教育事业的組織,不論是在一般的政治教育領域方面,或是特殊地在艺术領域方面,都必須貫徹着无产階級为順利地实现共專政的目的,換言之,为推翻資产階級,为消灭階級,以及为鏟除人对人的任何剝削所进行的階級斗争的精神。

(二)因此,无产階級,不論以其先鋒队——即共产党——的面目出現,或以各式各样的一般无产階級組織的面目出現,都必須积极带头参加一切国民教育工作。

(列宁:“論无产階級的文化”,1920年10月8日,“列宁文集”
第6册,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99—300頁)

不能这样来談綜合技术教育:从抽象的觀念出发,針对着遙远的未来,而不考虑当前的、迫切的、困难的现实情况。

应当

(1)补充一两个論点,說明綜合技术教育的原則性的意义

{ 根据馬克思
根据我們俄国共产党的党綱 }

(2)說明白,我們决不能放弃原則,我們一定要立刻尽可能地实施綜合技术教育。

第17点刪去。

关于第二級学校(12—17)說:

共和国极其困难的經濟情况要求在現时立即无条件地

把第二級学校跟专业技术学校合并, (修正: 根据教育家的指示和决定, 并不是第二級学校全部合并, 而是从十三岁、十四岁合并。——作者注)

把第二級学校改为专业技术学校*, 但是同时为了不致变成培养手艺匠的学校, 应当明确规定:

(1) 避免过早地专业化; 制定关于这一点的指示。

(2) 在所有的专业技术学校里扩大普通科目的范围。

按年編制教学大綱:

(如果这样的大綱还没有的话, 卢那查尔斯基应当受处分)

共产主义	地理
通史	文学
革命史	其他
1917年革命史	

(3) 把立即过渡到綜合技术教育, 或者确切些說立即实现許多馬上就能做到的进行綜合技术教育的步驟, 規定为必須绝对执行的任务; 如:

.....
跟俄国电力化委员会合作
.....

甲、参观附近的电力站, 并在电力站举行一些有实验的講演; 进行只有用电力才能做的一些实习作业; 立刻制定詳細的大綱(供一次参观用的; 供五次、十次講演用的; 供一两个月内进行实习作业用的等等);

乙、用上述的办法参观每个办得不錯的国营农場;

丙、用上述的办法参观每个办得不錯的工

跟俄国电力化
委员会合作

厂；

丁、动员全体工程师、农学家、全体大学数理系的毕业生，来做关于电力和综合技术教育的演讲、指导实习作业的演讲、巡回演讲及其他工作；

戊、设立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小型博物馆、展览车、展览船等。

这是最重要的。我们是穷人。我们立刻需要细木工、钳工绝对需要。大家都必须成为细木工、钳工等，但是同时必须具有最基本的普通知识和综合技术知识。

第二级学校(确切些说：第二级学校高年级)(12—17)的任务：培养完全精通本行业务的专家，培养本领十足的行家和受过实际训练的细木工，木工，钳工等等，但是同时要使这些“手艺人”具有广博的普通知识(懂得某些科学的最基本的原理；明确指出那些科学)；成为共产主义者(明确指出应当知道些什么)；

具有综合技术眼界和综合技术教育的基本(初步)知识。

这就是：

- (1)关于电力的基本概念(明确规定那些概念)；
- (2)关于机械工业中应用电力的基本概念；
- (3)关于化学工业中应用电力的基本概念；
- (4)关于俄罗斯联邦电力化计划的基本概念；
- (5)参观电力站、工厂、国营农场不得少于一次至三次；
- (6)知道农学的某些原理等。详细规定最基本的知识是哪些。

(列宁：“论综合技术教育”，192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6卷，第490—492页，参见“列宁论青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37年版，第248—250页)

“……我們的工人和農民理應享受比馬戲更好的東西。他們有權利享受真正偉大的藝術。所以我們首先提出要實施最廣泛的民眾教育和民眾訓練。這種工作為文化造成基礎，——當然，這要在麵包問題解決了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在這種基礎上，一定會成長出真正新的偉大的共產主義的藝術，這種藝術將創造出一種適合其內容的形式。……”（此文是蔡特金所引列寧的原話——本書編者。）

（蔡特金：《比列寧》，1924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頁）

一九 国家消亡問題

工人階級在發展進程中將創造一個消除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聯合體來代替舊的資產階級社會；從此再不會有任何原來意義的政
權了……

（馬克思：“哲學底貧困”，1847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7頁）

不能說社會運動排斥政治運動。從來沒有哪一種政治運動不
同時又是社會運動的。

只有在沒有階級和階級對抗的情況下，社會進化將不再是政
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會全盤改造的前夜，社會科學的
結論總是：

“不是戰鬥，就是死亡；不是血戰，就是毀滅。問題的提法必然
如此。”（喬治·桑）

（馬克思：“哲學底貧困”，1847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8頁）

共產黨人認為，廢除國家只可能有一個意思，即廢除國家是廢
除階級的必然結果，隨着階級的廢除，自然就沒有必要由一個階級
的有組織的力量來統治其他階級。

（馬克思、恩格斯：“愛米爾·德·白拉登著‘社會主義和稅收’”，
1850年4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7卷，第303頁）

“無產階級上升到統治階層的地位是什麼意思呢？〔以下括號

中的話是馬克思駁斥巴枯寧的話——原編者)(這就是說，無產階級不再在每個場合下都同享有經濟特權的階級作鬥爭，它已經獲得足夠的力量和組織性，在同特權階級作鬥爭時能夠採取一般的強制手段；但是，它只能採取這樣一些經濟手段，這些手段是能夠消除它作為僱傭工人的特性，因而也消除它作為階級的特性的；它取得了徹底的勝利，它的統治也就結束了，因為它的階級特性已經消失了。)難道整個無產階級都將成為統治者？(舉例來說，難道在工會(工聯)中，整個工會都是執行委員會？難道在工廠中不再有任何的分工和由此而來的各種不同的職權？而在巴枯寧的自下而上的原則中，難道所有一切都是在上面的？如果這樣，那末就沒有任何東西在下面了。難道一個村社的全體成員能同樣地支配一個省的共同利益？如果這樣，那末村社和省也就沒有任何區別了。)德國人將近四千萬。難道這四千萬人都將成為政府人員？(Certainly〔當然啦〕，因為事情是從村社自治做起的。)全體人民都將成為管理者，而被管理者也就沒有了(如果人自己管理自己，那末按照這個原則，他就不可能管理自己；因為他只是他自身，而不是其他任何人)。那時候將沒有政府，沒有國家，如果有國家，就必定有被管理者，就必定有奴隸。”(這只是說：當階級的統治消失了，從國家這個詞目前所具有的政治意義來說，國家也就不存在了……)(第279頁)

“這個二者擇一的問題在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中是很容易解決的。他們(指巴枯寧自己)所理解的人民的管理，就是人民通過他們選舉出來的少數代表來實行管理(笨蛋！這是民主派的胡言亂語，是政治上的空談！即使在俄國最小的公社和勞動組合中，選舉也只是一種政治形式。選舉的性質不是取決於它的名稱本身，而是取決於經濟基礎，取決於選舉人之間的經濟關係，當選舉的職

能不再具有政治性的時候，(1)政府的職能就不再存在；(2)一般職能的分配變成了一個不容許有絲毫統治權的業務問題；(3)選舉完全失去了目前的這種政治性。)全民選舉人民代表和國家統治者的普遍權利(象全民這樣的東西，從這個詞目前所具有的意義上說來，是一種幻想)是馬克思主義者和民主派的新發明，這是一種欺騙，它掩蓋了少數管理者的專制，尤其危險的是，它代表了所謂人民的意志。(在集體所有制下，所謂人民的意志要讓位給真正的合作社的意志)。所以結果是：有特權的少數人管理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但是這些少數人，馬克思主義者說過(在哪裡說過?)將由工人組成。大概是由過去的工人組成，但是他們一旦當了人民的代表或人民的統治者，他們就不再是工人(就象目前的廠主因為當了省委員會的委員而不再是資本家一樣)，他們開始從國家的高度來看待一切普通的工人；他們所代表的已經不是人民而是他們自己和他們想管理人民的奢望。誰會懷疑這一點，誰就完全不了解人的本性。”(第279頁)(如果巴枯寧先生熟悉工人合作社的管理者的情況，那末他的關於統治權的全部認論就會破產。他勢必問問自己：在這種工人國家(要是他願意這樣稱呼)的基礎上，管理的職能能夠採取什麼形式。)(第279頁)

“但是這些被選舉出來的人都是具有堅定的信念而又博學多才的社會主義者。博學的社會主義’(這個名詞從來不用)、科學的社會主義’(這個名詞僅僅在反對空想社會主義時才使用，因為空想的社會主義企圖強迫人民不要把自己的認識範圍局限於研究人民本身的社会运动，而要接受新的夢幻和空想；請參看我反對蒲魯東的那本書)這些在拉薩爾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的文章和演講中屢見不鮮的名詞的本身就證明了，所謂人民的國家，只不過是由真假學者所組成的一小撮新興貴族對人民群眾進行極其專橫的

統治。人民是沒有學問的，這就是說，他們將完全得不到管理者的關懷，他們將完全被推進被管理者的行列。解放是多麼好啊！”
(第279—280頁)

.....

“馬克思主義者已經感覺到這種(!)矛盾，並且意識到：有學問的人管理國家(這是什麼幻想!)是世界上最困難、最容易得罪人，最受人輕視的事情，儘管這種管理具有一切民主的形式，但它却是名符其實的專政；所以他們安慰自己說，這種專政是暫時的、短期的(不會是暫時的，我最親愛的！工人對反抗他們的舊世界各個階級的階級統治必須延續下去，直到階級存在的經濟基礎消滅為止)。他們說，他們唯一的關懷和目的是教育人民，從經濟上政治上提高人民的水平(咖啡館里的政客!)，以至很快就不需要任何管理，國家也不再具有政治性，即統治性，而變成一個經濟利益和公社的自由組織。這裡的矛盾是很明顯的。如果他們的國家真正是人民的國家，那末為什麼要把它消滅？如果為了真正解放人民而必須消滅國家，那末他們又怎敢把它叫做人民的國家？”(第280頁)。(我不想在李卜克內西的人民國家這個問題上兜圈子，因為他所說的人民國家是同“共產黨宣言”背道而馳的謬論；這只是說：在為破壞舊社會而鬥爭的時期，無產階級仍然在舊社會的基礎上進行活動，所以它還要使自己的運動具有多少和它自己相適應的政治形式，——在這一鬥爭時期，無產階級還沒有達到最終的組織形式，它要採取一些手段來解放自己，在它解放以後這些手段就要消滅；巴枯寧先生却由此得出結論說，無產階級最好不採取什麼手段，而只是等待……同歸於盡的日子——等待世界末日的審判。……

(馬克思：“巴枯寧的‘國家和無政府主義’一書概要”，1874年，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俄文第1版，第186—193頁)

公社意味着社会重行掌握国家政权，国家政权从此成为社会的生命力，而不再成为统治社会、驾驭社会的力量。这意味着人民群众自己起来夺回了国家政权，人民群众以自己的力量替代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公社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一政治形式替代了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敌人、用以压迫人民群众的人为力量（已为人民群众的压迫者所窃夺，原为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竟被用来反对和打击他们）。这种政治形式显而易见，正如一切大事物一样。在过去一切革命中，历史发展所需的时间总是虚掷，甚至在人民胜利之日，每次当人民放下了胜利的武器，这些武器就回过头来反对人民了。公社则一反过去革命的习惯，以武装的人民来替代军队。“自九月四日以来，共和国空前第一次从敌人的政府中解放出来……共和国替本城建立保卫公民、反对权力（政府）的武装的人民，而不再是保卫政府、反对公民的常备军。”（二月二十二日中央委员会宣言）（只要在全国规模内着手组织这种武装的人民，就能根绝常备军，这是一切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第一个经济条件；人民的武装组织立刻杜绝了捐税和公债的根源，也杜绝了阶级统治篡夺政府的经常危险——不管是一般形式的阶级统治，或是自称拯救各阶级的冒险家的统治。）人民的武装组织同时也是抵御外国侵略者的最可靠的保证，而这在其他各国是办不到的，因为他们须有一个糜费的军事机器，取消常备军可使农民免纳苛税，而且农民从此不再成为一切国家捐税和一切公债最丰富的泉源了。仅就这一点来说，公社对农民已是一个大希望，“公社”就是农民解放的第一个口号。何况，它还取消了“独立警察”，并以公社勤务员来代替这班坏蛋。普选截至现在一直被任意滥用着，它不是被当作神圣的国家政权的认可议会的工具，就是落在统治阶级的手中成为它的玩物；而普选对于人民只是每隔一个或长

或短的时期、用来認可議會制的階級統治（選擇此種統治的工具）一次而已。而現在這一普選已導向其真正的目標，由各公社選出它們自己的行政和立法的公務員。這實在造成了一個錯覺，就是：行政和政府故弄玄虛地把高級職務說成只能交給一批國家的老手此道的寄生蟲、享受高俸厚祿的庸才、教士來掌握，使這班人得以竊據高位，僭占群眾的智慧轉以對付下層的群眾。然而，公社完全擺脫了政治上的等級制，而把隨時可以罷免的勤務員來替代騎在人民頭上的達官貴人，以真正的負責制來替代虛幻的負責制，因為這些受委託的人是經常處在人民監察下進行工作的。他們所獲的報酬只相當於一個熟練工人的收入，每月十二鎊。最高薪資每年也不超過二百四十鎊，據一位科學界權威赫胥黎教授的估計，亦只略高於倫敦教育委員會一位雇員的工資的五分之一。所有國家的神秘、自說自話等一套花樣都被公社揭穿了。公社主要是由普通的工人所組成，它組織了巴黎的保衛工作，對波拿巴特的禁衛軍作戰，保證了這巨大城市的糧食供應，擔負起原先由政府、警察廳與縣府所分別擔任的一切職務；在最艱苦、最複雜的環境下，公開地、明快地進行了它的工作；它好像米爾頓寫他的“失樂園”一樣，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工作；並不自以為是，不埋頭在文牘主義的官僚制度中，不以承認自己的錯誤為耻而勇于改正錯誤，而所得報酬只是幾鎊。公社同時執行着一切職務——軍事、行政管理、政治，把職務作為真正的工人職務，使這些職務不再成為一個專業階層的秘密專利品。（在內戰和革命的紊亂情況下維持秩序），（採取全面恢復的措施）。公社的每一項措施固然都值得贊許，但公社最重要的一個措施，就是公社本身的組織形式，它一面要對付外國敵人，一面又要對付階級敵人。公社以它的存在表現了它的活力，以它的行動証實了它的理論。它的出現，就是對征服法國勝利者的一

个胜利。濒于淪陷的巴黎以大无畏的气魄重新起来领导欧洲，但这并不是依靠暴力，而是靠了它一行当先地充当社会运动的先鋒，并使各国工人阶级的愿望成为现实。

如果所有大城市都以巴黎为榜样組織起公社来，則任何政府均将不能出其不意，以突然的反动行动来镇压这个运动。而这些准备的措施，可以贏得培养实力的时间，而这是运动发展的保证。全法国均将組成公社，自决自治，人民的武装将替代了常备軍，国家寄生虫队伍将被排除，教师将替代了僧侶制度，国家司法要改为公社机构；全国代表的选举也不再成为强有力的政府耍花样的借口，而成为各个組織起来的公社有計劃的表现；国家的职责将精簡为几个符合于普遍性、全国性目的的职务。

公社就是如此。它就是社会解放，就是把劳动从垄断生产工具的那批人的篡夺(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政治形式，而劳动工具是劳动人民自己創造的或自然所賜予的。正如国家机器与議會制并不构成統治阶级的真正生命，而只是他們統治的一般机构、旧秩序的政治保证、形式和表现一样，公社也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运动，从而也不是全人类复兴的运动，而仅是工人阶级行动的有机的工具。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努力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任何“阶级”的統治，(因为公社并不是代表某个特殊利益；公社意味着“劳动”的解放，而“劳动”解放是一切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的和自然的条件；惟有巧取豪夺以及欺騙詭詐等行为，才允許少数人侵犯多数人的此項劳动解放，)但公社創造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可以最合理、最入道的方式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来进行。公社可能是激烈反动的一个起点，也可能是激烈革命的起点。公社以肃清国家寄生虫不生产的和作恶的事业开始它的劳动解放(这是它的偉大目标)；一方面它拔除了把国家收

入很大一部分供养国家恶魔的禍根，另一方面它以工人工資的待遇进行着地方性和全国性行政的实际事业。由此可见，公社一开始即在改革经济和改革政治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节约。

等到公社組織在全国范围内牢固地建立起来之后，它可能遭遇的灾难只是旧奴隶主們分散的暴动。这些暴动尽管暂时能阻撓和平进步的事业，但結果只是給社会革命增强武装，从而加速运动的发展。

（馬克思：“‘法蘭西內战’第一次草稿”，1871年，
轉摘自1953年7月号“新建設”）

为了不让国家及其各个机关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这种现象在迄今所有一切国家中都是不可免的，——公社采用了两种万无一失的办法。第一，它把所有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都委任那些按普选制选举出来的人們充任，同时施行了可以按选民決議随时撤消被选举者的法制。第二，它給予所有一切公务人員的薪水，不分职位高低，都与其他工人所領取的工資相等。公社一般付过的最高薪金是六千法郎。这样就造成了防止那种鑽营祿位和升官发财主义的可靠隄防，何况公社此外还施行了各代表机关代表絕對委任制度。

（馬克思：“法蘭西內战”，1871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选”
兩卷集第1卷，莫斯科1955年中文版，第463頁）

公社是和帝国絕對相反的东西。巴黎无产階級用以欢迎二月革命的“社会共和国”口号，不过是表示了希望建立一种不仅应消灭君主制階級統治形式，而且应消灭階級統治本身的共和国的模糊意向。公社正就是这种共和国的一定形式。

……公社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废除常备軍而代之以武装人民。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按普选制选出的城市代表所組成。这些代

表應該負責并且隨時可以更換。其中大多數自然是工人或已被公認的工人階級代表。公社應當不是國會式的，而是同時兼任立法和行政的工作團體。向來都是中央政府工具的警察，立刻就被革除了一切政治職能，而變為隨時可以撤換的公社負責機關了。其他一切行政部門的官吏，也莫不如此。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至下所有一切公務人員，都只應領得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水。高級國家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權和辦公費，都隨着這些官職的消滅而消滅了。社會公職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們的私有物。不僅是城市管理權，而且先前屬於國家的全部主動權，都已轉歸公社。

把舊政府物質權力的兩種武器即常備軍和警察廢除以後，公社立刻就實行打破了精神壓迫工具即“僧侶勢力”，方法是宣布教會與國家分離，並剝奪一切教會所占有的財產。教士們必須回復到私人的簡樸生活，象他們的前輩即使徒們那樣靠信徒施捨過活。一切學校都對大家免費開放，不受教會和國家影響。這樣，不但學校教育成為人人都能享受的東西，而且使科學免除了階級成見和政府權力所加予的桎梏。

法官已經失去了表面上的獨立性，……也如社會其他一切公務人員一樣，他們今後應該公開選出，應該負責并且可以隨時更換。

巴黎公社自然應當做法國一切大工業中心的榜樣。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個次要的中心確立起來，舊的中央集權政府就要把各個省區里的位置也讓給生產者們的自治機關。在公社沒有來得及詳細加以發揮的全國組織綱要上說得十分肯定：公社應當成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備軍應該在全國範圍內由服役期限極短的民警來代替（馬克思在同書另一處還說：“公社將廢除征兵制”——編者）。設在州區首府里的代表會議，應當主管本州區

所有一切乡村公社的公共事务，而这些州区的代表会议则应派代表去参加设在巴黎的国民议会；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训令（绝对委任状），并且随时都可以更换。那时还会留归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而意义重大的一些职能，则不应该废除，——若硬说应该废除，就会是故意捏造，——而应该转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严格负责的官吏。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消灭，而是相反——应该通过公社机构组织起来。民族的统一应该实现，其手段就是把那以体现这种统一自任而却想离民族而独立且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消灭。其实，这个国家政权只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而已。任务是要把旧有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剷除掉，而把它的合理的职能从这种希图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权方面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公仆担任。普选权不是要每三年或六年一次解决统治阶级中哪一个人应该在国会里代表人民和镇压人民，而是要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为的是使人民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员，正好似个人选举权要为这种目的服务于任何一个雇主一样。大家知道，企业正象个人一样，通常总是能够为了自己的目的把适当的人安置到适当的位置上去，即便有时会犯错误，也总能很快就把错误改正。另一方面，公社根本就是绝对反对用等级任命制去替代普遍投票选举制的。

新的历史创举通常遭到的命运，就是人们把它认作是对旧有的甚至早已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抄袭，只要新机关稍微与这些形式有点相仿。所以这个破毁着现代国家政权的新公社，也被人们认作是在这国家政权发生以前存在过并且构成这国家政权基础的中世纪公社的复活。公社制度被人们误认为是企图用许多小国家的联盟（即孟德斯鸠与吉伦特派所梦想的联盟），去代替目前在各个巨大民族那里已成了——虽然最初是用暴力造成的——社会

生产强大因素的統一。公社与国家政权間的对抗状态，竟被誤認
为是那种反对过分集议制的斗争的扩大形式。……寄生贅瘤即
“国家”所吞噬的一切力量，归还給社会机体。……其实，公社制度
是要使乡村生产者們受到每一省区内各主要城市方面的精神領
导，并保証他們能以城市工人为其自身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
本身的存在就自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自治却不再是用以对
抗現時已成为贅物的国家政权的東西了。……

公社实现了一切資产階級革命关于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
消除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常备軍和官吏。公社存在的本身就是对于
那至少在欧洲是階級統治的通常累贅和必要伪装的君主制度的
否定。公社給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机构的基础。但是，无论是
廉价政府或“真正共和国”，都不是它的終极目的，而不过是伴随着
它的一些現象罢了。

公社所引起的解释之紛繁，以及它所表现的利益之紛繁，都証
明公社是一个极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質
上都是压迫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
的政府，是生产者階級对占有者階級进行斗争的結果，是終究发现
了的可以使劳动在經濟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若沒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会沒有实现的可能，而且是
一个騙局了。生产者們的政治統治决不能与他們的社会奴隶地位
的永固状态同时并存。因此，公社不免要成为推翻階級存在本身
所賴以維持，从而階級統治所賴以維持的那些經濟基础的工具。
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个
階級的屬性了。

……公社曾想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財富
的階級所有权。它曾想要把剝夺者加以剝夺。它曾想要把个人所

有权变为现实，方法是把现在主要用作为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与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但这是共产主义，“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啊！然而，统治阶级中那些颇为聪明而能领悟到现存制度不能长存下去的人们，——这种人并不少——已在令人讨厌和大声叫喊地鼓吹起合作制的生产来了。如果合作制的生产不应当是一句空话或一种骗局，如果它应当排除资本主义制度，如果由合作集体按照总的计划来组织全国生产，由合作集体来控制全国生产，从而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无政府状态和周期危机现象，——那么，请问诸位先生，这不会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作出奇迹。它并没有想靠民众的决定来实现现成的和完满的乌托邦。它知道，为要谋得自己的解放，为要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止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它必须经过顽强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去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去解放那些已在旧的崩溃着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发展了的新社会因素。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它能用鄙视的微笑去回答奴才记者们的庸俗的谩骂，去回答好心空论主义资产者们的博学的诤言，这班资产者居然用传告神谕者前无失的口吻宣讲着他们虚假的滥调，贡献着他们不辞劳苦编成的单方。

当巴黎公社担起了革命领导责任的时候，当普通工人第一次敢于侵犯到自己“天然尊长”——有产阶级——的特权，即管理特权的时候，他们是在空前艰难的条件下着手工作，并且虚心、诚恳而卓有成效地执行了这个工作；他们所得报酬的最高额，据科学界一位权威（即赫肯黎教授。这是1871年德文版上加的附注）说，没

有超过倫敦国民教育局秘書所得薪額的五分之一。旧世界看見象征劳动共和国的紅旗在市政厅上空飄揚，簡直气得发瘋了。

(馬克思：“法兰西內战”1871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选”

兩卷集第1卷，莫斯科1955年中文版，第498—503頁)

有些社会主义者近来开始了系統性的十字軍征討，来反对他們所称为权威原則的东西。只要他們声明說某种行为是有权威的，就足以把它定罪了。这个簡化的方法竟被濫用到这种地步，以致必須要較詳細地来闡明問題。这里所談的权威，是說別人的意志强迫我們接受了；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但是，既然这两个用語都不好听，而它們所表現的关系又是使服从的一方感到难堪的，那末試問：是否可以不要这种关系，我們是否能够——在現代社会中現有的条件下——創出另一种社会制度来，使这个权威成为无謂的东西而归于消失呢。我們只要考察一下作为現代资产階級社会基础的那些經濟关系、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就会看到，它們具有使各个分散行动愈益为人民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起而代替各个分散生产者小作坊的，出現了拥有庞大工厂的現代工业，在这种工厂中有数百个工人操縱着蒸汽发动的复杂机器；大路上的乘客馬車和載重馬車已被铁路上的火車代替，而小型帆船和內海帆船已被輪船代替了。甚至在农业中，也是愈益由机器和蒸汽占統治地位，虽然緩慢地但却一貫地使小自耕农被那些靠雇傭工人耕作大片土地的大資本家所代替。这样，联合的活动，互相依賴的工作过程的复杂化，正在取各个人的独立活动而代之。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組織起来，而組織起来是否可能不要权威呢？

假定說，社会革命已把目前財富的生产和流通受其权威支配的資本家們推翻了。假定完全站在反权威主义者的立場上来說，

土地和劳动工具都成了那些使用它們的工人的集体财产了。那末，权威是否就会消灭下去，还是只会改变自己的形态呢？我們来考察一下。

拿一个棉紗厂来作例。棉花至少要經過六道連續加工手續后才会成为綫，并且这些加工手續大部分是在不同場所內进行的。其次，为了使机器不断轉动而需要有照管蒸汽机的工程师，需要有进行日常檢修的技师以及許多把生产品由一个場所运到別一个場所的工人等等。所有这些工人——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迫依照那不管什么个人自治权的蒸汽权威所决定的時間来开始和停止工作。这样，工人們首先必須商定劳动時間；而劳动時間一經确定，大家就要毫无例外地一律遵行。其次，在每个厂房里，时刻都会发生关于生产方法、材料分配等局部問題，它們要求馬上解决，免使全部生产工作立刻停頓下来。不論怎样解决这些問題，即無論是由选出来領導各該劳动部門的人去决定，或是在可能情况下由多数表决，个別人的意志总是要表示服从，而这也就是說，問題是由权威来解决的。大工厂里自动的机器，比利用工人作工的小資本家要專制得多。至少是关于劳动時間，可以在这些工厂的大門上写出如下字样：«Lasciate ogni autonomia voi che entrate»。（意即“进門者得放弃任何自治权”。——編者注）如果說人靠科学和創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就对他施行报复，在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內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專制，而不管社会組織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紡紗机而恢复手紡車。

再拿铁路来作例。这里，无数人的合作也是絕對必要的；为了避免不幸事故，这种合作必須依照准确規定的時間来实行。这里工作上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有一个支配的意志来解决所屬一切問

題，——不管这个意志是由一个选出的人来代表，还是由一个負責执行大多数有关人們的決議的委员会来代表，都是一样。無論在前一場合或后一場合，都存在一个表显得很鮮明的权威。况且，假如铁路服务人員在乘客先生們的心目中的权威被消灭了，那末，第一趟开出的列車就会弄成什么样子呢？

但是，最显然說明需要有权威，并且是需要有最專断权威的場合，要算是在航行于汪洋大海的船上了。那里，在遇到危險的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就得全体立即絕對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如果我提出这种論据来反对那些最頑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們就只能給我如下的回答：“是啊！这是对的，但这里所說的并不是我們赋予我們代表的那种权威，而是某种委託哩。”这些人以为只須改变某一事务的名称，就可改变这一事物本身哩。这些深奥的思想家們，簡直是开我們的玩笑。

这样，我們看到，一方面要有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要有一定的服从——無論在什么样的社会組織下，都是如此，——由于賴以进行产品生产和流通的物質条件，这两者都是我們所必需的。

另一方面，我們也已看到，生产和流通的物質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所以，把权威原則描写成絕對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則描写成絕對好的东西，这是荒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們的应用范围是因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有所改变的。如果自治派仅仅是想說将来的社会組織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內允許权威存在，那也許还可以和他們說通。但他們对于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都閉眼不看，却一味拚命反对名詞。

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只以叫喊反对政治权威，叫喊反对国

家为限呢？所有一切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未来社会革命的结果而消逝，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关注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一举而把政治国家废除，即要求在那些产生出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尚未废除以前就把它废除。他们要求社会革命的第一步动作就是废除权威。

这些先生曾经见过一次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革命是一部分居民用刀枪大炮，即用非常有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居民接受其意志的动作。而获得胜利的政党往往迫于必要，不得不借自己武器所给予反动派的威吓，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曾凭借武装人民的权威来反对资产阶级，那它能支持到一天以上么？反过来说，我们不是有理由因为公社把这个权威运用得太少而加以责备么？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道自己所说的是些什么，那末他们就仅仅是散布糊涂观念；或者是他们知道这一点，那末他们就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在前后两种场合，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

（恩格斯“论权威”，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611—614页）

……在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系指“哲学的贫困”。——编者注）中以及后来在共产党宣言上，都已经直截了当说过：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施行后，国家就会自行消散（sich auflöst）和消逝。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不得不用来以强力镇压自己敌人的一种暂时机关，那末说什么自由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时，那就不是为着自由，而是为着镇压自己敌人；而一到有可能来谈自由时，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了。因此，我们提议到处都把“国家”一词，改成“公团”（Gemein-

wesen) 一詞,这是个很好的德文古字,是与法文中的“公社”相当的。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的信”,1875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
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1955年中文版,第40页)

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首先就把生产资料转化为国有财产。但是从而它就消灭了自己之为无产阶级,从而它就消灭了一切阶级区别和阶级对立,同时也就消灭了国家之为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必须要有国家,即必须要有剥削阶级的这个机关,以便维持其生产的外部条件,因而特别是以使用强力把被剥削阶级箝制在由当时生产方式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封建隶属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集中为有形的集团,但是国家之所以成为这样,只是因为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它是具有国家公民资格的奴隶主的国家;在中世纪,它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它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自己使自己成为赘物了。当任何一个必须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已不复存在时,当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以及根源于现代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竞争已不复存在,而由此产生的冲突和暴行都也一併消失时,那就会没有什么人必须加以镇压和加以控制了,那时对于现今执行着这个职能的国家政权也就会再不需要了。国家以全社会真正代表资格所作的第一个行动——将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所有,——同时也将是它以国家资格所作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于社会关系的干涉,将逐渐成为多余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于人的管理便会由对于物的管理和对于生产过程的指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而是消亡下去的。应该以此为根据来估量关于“自

由人民国家”的語句，这一語句在鼓劲的意义上可以暂时存在，但归根到底說是沒有科学根据的。同时也應該以此为根据来估量所謂无政府主义者关于要在二十四小时内废除国家的要求。

(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1877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1955年中文版，第149—150頁)

在我們現今正迅速走近的生产发展阶段上，这些階級的存在不仅不复必要，而且还会成为对于生产的直接障碍。階級将不可避免地归于消逝，正如它們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出来一样。階級一經消逝，国家也就会不可避免地归于消逝。以生产者自由平等联合为基础按新方式来組織生产的社会，将会把全部国家机器送到那时是它所应份到的地方去：送到古物陈列館里去，跟紡紗車和青銅斧一併陈列起来。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1955年中文版，第320頁)

……民主制也是一种国家形式，它必然会随着国家的消逝而消逝，但是，这只有在彻底胜利和巩固了的社会主义过渡到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才能实现。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年1—2月，“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7—138頁)

……直到現在，这个真理对社会主义者說来，还是无可爭辯的，这个真理承認，国家将一直生存到胜利的社会主义轉变为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的名言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們在前一提綱中特意着重指出，民主制是一种国家形式，它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

……………
无产階級把資本主义改造或社会主义之后，就会造成完全續

除民族压迫的可能。“只有”——“只有！”——在各方面都完全实行民主，直到按照居民的“感情”确定国界，直到有分离的完全自由，才能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同样地，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在实际上彻底铲除民族间的任何细微的摩擦和不信任，加速民族的亲近和融合，结果使国家消亡。

(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1916年7月，“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7,319页)

共产党人还是社会民主党人？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消费品或者至少是必需的消费品完全公有)

民主制也就是国家。Absterben (消亡。——编者注)……国家的“消亡”。

为什么不是Abschaffung(消灭。——编者注)，也不是Spren-gung(炸毁。——编者注)？

一个个职能 «Allmähliches Einschlafen» (逐渐的消亡。——编者注)。

没有民主制 = 没有管理人们的机关。

“工人心中的国家制度的根基”？(这句话摘自布哈林于1916年12月在«Jugend-Internationale»上用笔名Nota Bene发表的«Der Imperialistische Raubstaat» (“帝国主义强盗国家”一文)。

机会主义和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

无产阶级专政。

利用国家反对资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的复辟企图。革命战争。

实行民主制和捍卫民主制。

民主制的作用：

教育群众。

引导他们建立新制度社会革命的形式：1905年的联合会。

(列宁：“论国家的作用问题”，1917年，

“列宁文集”第21卷，俄文版，第13页)

……“一向作为国家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并变为公社中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管理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等旧政府物质权力的武器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僧侣……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他们今后应该公开选出，对选民负责，并且随时可以撤换”……

由此可见，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似乎“仅仅”是更完备的民主制：取消常备军，对公职人员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和撤换制。但是这个“仅仅”，事实上意味着完全用一些原则上不同的机关来代替另一些机关。在这里恰巧看到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实际例子：民主制达到了一般想象的最充分最彻底的程度以后，就会由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会由国家（=镇压一定阶级的特别力量）变为一种已经不是原来的国家的东西。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11月，“列宁全集”

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06页)

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决不“梦想”立刻取消任何管理制度和任何从属关系；这种由于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产生的无政府主义梦想，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的。实际上这种

夢想只会把社会主义革命拖延下去，直到人們变成另一种人的时候。我們不是这样，我們希望由現在的人們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現在的人們沒有从屬关系、沒有監督、沒有“監工和會計”是不行的。

但是应当服从的是一切被剝削劳动者的武装先鋒队——无产阶级。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制”可以并且應該在一天之內用“監工和會計”的簡單职能来代替，这些职能現在只要有一般市民水平的人就能胜任，只要发給“工人的工資”就完全能够执行了。

我們工人将以资本主义創造的成果为基础，依靠自己的經驗来亲自組織大生产，建立依靠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来維護的最严格的铁的紀律，使国家官吏成为不过是执行我們的委托的工作人員，使他們成为对选民負責的、随时可以撤換的而且是領取普通薪金的“監工和會計”（当然还要用各式各样的和具有各种水平的技術人員），这就是我們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以后，就可以而且應該从这里开始做起。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始自然会_使一切官吏机构逐渐“消亡”，使这个不带引号的、与雇佣奴隶制不同的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个秩序下，日益簡化的監督和报告的职能将由大家輪流行使，等到大家逐渐习惯了遵守秩序，这些职能也就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11月，“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12—413頁）

人們通常在談論国家問題的时候，老是犯恩格斯在这里所警告的而我們在上面也順便提到的那个錯誤。这就是：老是忘記国家的消灭也就是民主制的消灭，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制的消亡。

乍看起来，这样的論断似乎是极端古怪而难于理解的；甚至也

許有人會就心，是不是我們在期待一個不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的社會制度，因為民主制也就是承認這個原則。

不是的。民主制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不是一個東西。民主制就是承認少數服從多數的國家，即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一部分居民對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統地使用強力的組織。

我們的最終目的是消滅國家，也就是消滅任何有組織有系統的強力，消滅任何加在人們头上的強力。我們並不期待一個不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的社會制度。但是，我們嚮往社會主義，我們也深信社會主義將發展為共產主義，到那時候就沒有任何必要對人們使用強力，沒有任何必要使一個人服從另一個人，使一部分居民服從另一部分居民，因為人們將習慣於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碼條件，而不需要強力和服從。

為了強調這個習慣的因素，恩格斯也說到了“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能夠把國家制度這一堆垃圾完全拋掉”的新的一代，這裡所謂國家制度是指任何一種國家制度，其中也包括民主共和的國家制度。

（列寧：“國家與革命”，1917年11月，“列寧全集”
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42—443頁）

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只有當資本家的反抗已經徹底粉碎，資本家已經消滅，階級已經不存在的時候，即社會各個成員在對社會生產資料的關係上已經沒有什麼差別的時候，——只有在那個時候，“國家才會消失，才談得上自由”。只有在那個時候，真正完備的、真正沒有任何例外的民主制才有可能實現。也只有在那個時候，民主制才開始消亡；道理很簡單，因為人們既然擺脫了資本主義奴役制，擺脫了資本主義剝削制所造成的無數殘暴、野蠻、荒謬和卑鄙的現象，也就會逐漸習慣於遵守數百年來人們就知道的、數

千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自动地遵守这些规则，而不需要强力，不需要强制和服从，不需要所谓国家的这种特别的强制机关。

“国家消亡”这句话说得非常恰当，它既表明了过程的渐进性，又表明了过程的自发性。只有习惯才能够而且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剥削，如果没有某种会引起抗议、起义并使镇压或有必要的令人气愤的现象，那末人们是多么容易习惯于遵守他们所必需的公共生活规则。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11月，“列宁全集”
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48—449页）

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为完全不需要国家创造条件，因为那时已经没有人须要加以镇压，——这里所谓“没有人”是指阶级而言，是指对某一部分居民进行有系统的斗争而言。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丝毫也不否认个别人捣乱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样也不否认有镇压这种捣乱的必要性。但是，第一、做这件事情用不着什么特别的镇压机器，特别的镇压机关，武装的人民自己会来做这项工作，而且做起来非常简单容易，正象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群文明人都很容易去劝解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妇女一样。第二、我们知道，产生违反公共生活规则的捣乱行为的社会根源是群众受剥削和群众贫困。这个主要原因一消除，捣乱行为就必然开始“消亡”。虽然我们不知道消亡的速度和进度怎样，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行为一定会消亡。国家也会随着这种行为的消亡而消亡。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11月，“列宁全集”
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0页）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发生的经

济变革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的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只有在这个范围内,也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的法权”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不同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的法权”。

马克思说,这是一个“缺点”,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会不需要任何法规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

可是,除了“资产阶级的法权”以外,没有其他法规。所以在这个范围内,还需要有国家来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分配的平等。

那时国家就会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

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容许在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就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11月,“列宁全集”
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3—454页)

……在一切国家机关中,将来只有国民经济委员会能够保持自己坚固的地位,我们愈是接近于建立社会主义的制度,对于纯粹

行政机关,对于实际上只是做管理工作的机关的需要愈是减少,国民經济委员会的这种地位就愈巩固。将来彻底打垮剝削者的反抗以后,劳动者学会組織社会主义生产以后,——这种原来意义的、狭义的管理机关,旧国家的机关,必定死亡,而最高国民經济委员会这种机关,必定增长、发展和巩固,它将包括有組織的社会的一切最主要的活动。

(列宁:“在国民經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
1918年5月,“列宁全集”第27卷,俄文第四版,第372頁)

“純粹民主”不仅是既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了解国家实质的蠢話,而且是十足的空談,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純粹的”民主。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列宁全集”
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24頁)

只有在国家完全消亡的时候,对人的管理才会消逝而讓位給对物的支配。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列宁全集”
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06頁)

。这方面的工作同实现苏維埃政权的主要历史任务,即过渡到完全消灭国家的任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个工作应当是:第一、使每一个苏維埃委員必須执行一定的国家管理工作;第二、使这些工作不断变换,包括与国家管理有联系的整个事务和一切部門;第三、采取一系列逐步的、經過慎重选择而又坚决实行的措施,以吸引全体劳动人民自动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

(列宁:“俄共(布)党綱草案”,1919年2月,“列宁全集”
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7頁)

(156—157)……但是,当无产阶级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世界

性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国家制度的增长曲线,就开始急剧下降。因为国家政权的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如镇压资产阶级的任务,将会结束。外界的强制规定开始消亡:首先消亡的是对外强制手段最尖锐的工具——军队和海军;其次是惩罚机关和镇压机关系统;再其次是强迫性的劳动等等……。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
1920年5月,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4页)

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即从巨大的历史范围的角度来看,无产阶级采取的各种强制手段,从枪毙直到劳动制,不论其名称如何新奇,都不过是把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改造成共产主义的人的办法……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
1920年5月,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9页)

……只有苏维埃的国家形式……才能准备国家的消亡,这种消亡是将来的无国家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因素之一。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斯大林全集”
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8页)

托洛茨基在发言时说:

“斯大林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力求消灭阶级和国家,就是战胜我国的资产阶级。是的,同志们,但是要知道国家是需要军队去反对国外的敌人的。”(引自速记记录。——斯大林注)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从这段话里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因为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消灭阶级和国家,因为我们仍然需要军队来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可是没有国家就不可能有军队(托洛茨基这样想),所以在武装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必要性还没有消失以前,我们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

同志們，这是把一切概念混淆起来了。或者在这里把国家了解为不过是武装保卫社会主义社会的机构，这是荒謬的，因为国家首先是一个阶级反对其他阶级的工具，不言而喻，既然沒有阶级，也就不会有国家。或者在这里認為沒有国家就不可能有保卫社会主义社会的军队。这也是荒謬的，因为从理論上說来，完全可以有这样的社会状态：沒有阶级，沒有国家，但是有保卫无阶级的社会免于外敌侵犯的武装人民。社会学提供不少的例子，說明人类历史上有过沒有阶级沒有国家但用某种方法防御外敌侵犯的社会。未来的无阶级的社会也将是这样，它虽然沒有阶级和国家，但仍可以有防御外敌侵犯所必需的社会主义的民兵。我認為我国发展到这种地步是很少可能的，因为无疑地，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設成就，尤其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和阶级的消灭，——这一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不能不引起资本主义国家无产者追求社会主义的强烈的願望；不能不引起其他国家革命的爆发。但是从理論上說来，完全可以有这样的社会状态：沒有阶级和国家，却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民兵。

而这个问题在我們的党綱中也有一定的說明。党綱中是这样說的：“紅軍是无产阶级專政的工具，它不能不有公开的阶级性質，即完全要由无产阶级和接近无阶级的半无产的农民阶层組成。只有在阶级消灭以后，这类阶级军队才能变为全民的社会主义的民兵。”（見“联共（布）党綱”）

（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15—117頁）

……决不能把“炸毀”和“取消”国家的无政府主义理論和无产阶级国家“消亡”或“打破”、“粉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馬克思主义理論混为一談。有人喜欢把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談，以为

它們是同一思想的表現。但这是不对的。列宁在批評“炸毀”和“取消”一般国家的无政府主义理論的时候，正是以“打破”資产階級国家机器和无产階級国家“消亡”的馬克思主义理論为根据的。

为了使問題更加清楚，我在这里不妨引証列宁同志关于国家問題的一篇手稿，这篇手稿大概是在1916年底或1917年初（1917年二月革命前）写的。从这篇手稿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出：

（甲）列宁批評布哈林在国家問題上的半无政府主义錯誤的时候，是以无产階級国家“消亡”和“打破”資产階級国家机器的馬克思主义理論为根据的；

（乙）照列宁的說法，虽然布哈林“比考茨基接近真理”，但他还是“不但沒有揭露考茨基分子，反而以自己的錯誤帮助了他們”。

請看这篇手稿的原文：

“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日至28日写給倍倍尔的一封信，对于国家問題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下面是信中最重要的一段話的全文：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按这几个字的文法意义來說，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專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廢話，特別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公社已經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詞把我們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馬克思的駁斥蒲魯东的著作以及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經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施行，国家就会自行消散（sich auflöst）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不得不用来以暴力镇压敌人的一种暂时机关，那么說什么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純粹是无稽之談了，因为当无产階級还需要（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国家的时候，那它就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而一到有可能来

談自由的時候，這樣的國家就不復存在了。因此我們建議到處都把國家(着重號是恩格斯加的)一字改成“公團”(Gemeinwesen)，這是一個极好的德文古字，相當於法文中的“公社”。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這大概是最精彩和最激烈的所謂‘反對國家’的一段話了。

(一)‘應該拋棄一切關於國家的廢話’。

(二)‘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那究竟是什麼呢？顯然是從國家到無國家的過渡形式！)

(三)無政府主義者用‘人民國家’這一個名詞把我們‘挖苦’(in die Zähne geworfen 直譯為指着鼻子說)得很夠了。(就是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替他們那些德國朋友的這種明顯的錯誤慚愧；但他們認為而且根據當時的情況當然是正確地認為，這種錯誤遠沒有無政府主義者的錯誤嚴重，請注意這點！！)

(四)‘隨着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施行’，國家就會‘自行瓦解(“消散”)(請注意)和消失’……(請和後來的“消亡”對照一下)……

(五)國家是‘在鬥爭中，在革命中’所需要的一種‘暫時機關’……(當然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

(六)需要國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Niederhaltung 一字原意不是鎮壓，而是制止復辟，制服)無產階級的敵人。

(七)到有自由的時候，國家就不存在了。

(八)‘我們’(即恩格斯和馬克思)建議‘到處’(在綱領中)都把‘國家’一字改成‘公團’(Gemeinwesen)，‘公社’!!!

.....

我們和無政府主義者不同的地方在於我們主張：(甲)現在利用國家；(乙)在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利用國家，

——这是对实际工作立刻就有最重要意义的两项。(布哈林正是忘记了这两项！)

我們和机会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在于我們持有下面这些更深刻、‘更恒久的’真理：(子)国家是‘暂时’性的；(丑)現在关于国家的‘废话’是有害的；(寅)无产阶级專政不完全带有国家性質；(卯)国家和自由是相矛盾的；(辰)把国家一字改成‘公团’，‘公团’是更正确的观念(概念，綱領用語)；(巳)‘粉碎’(Zerbrechen)官僚軍事机器。

.....”

关于国家問題的理論爭論的簡單經過就是这样。

(斯大林：“論联共(布)党內的右傾”，1929年，“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5—69頁)

我国的国家是不是在共产主义时期也会保存呢？

是的，会保存的，假如那时资本主义包围尚未消灭，而外来的武装侵犯危險尚未剷除的話。同时很明显的，我們国家的形式，又会随着国内和国外环境变化而变更。

不，不会保存而会消亡下去，假如那时资本主义包围已經消灭，而被社会主义包围所替代了的話。

(斯大林：“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年，“列宁主义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70頁)

随着社会主义的活动范围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中的扩大，国家将日渐消亡，因而把个别人的财产和个别集团的财产轉归国家所有的问题当然也就会消失。国家一定消亡，而社会是一定留存下来的。因此，作为全民财产的承继人的，已經不是将要消亡的国家，而是以中央經濟领导机构为代表的社会本身。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0頁)

二〇 民族和民族語言的 融合, 国际主义

最后, 各民族的兄弟友爱現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有純粹的社会意义。幻想成立欧洲共和国和利用适当的政治組織来保障永久和平, 就象空談靠普遍的貿易自由来保护各族人民的团结一样荒唐可笑; 当所有这类多情善感的幻想完全不中用的时候, 各国的无产者就开始不声不响地在共产主义民主的旗帜下真正地結成兄弟。也只有无产者才能够真正做到这点, 因为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有他們自己的特殊利益, 而且由于他們認為这些利益高于一切, 他們无法越出民族的范围。他們的少数几个理論家即使把他們所有那些美妙的“原則”都搬出来也頂不了什么事, 因为他們根本不触犯这些互相矛盾的利益和整个現存制度, 他們只会說空話。可是全世界的无产者却有共同的利益, 有共同的敌人, 面临着同样的斗争; 所有的无产者生来就沒有民族的偏見, 所有他們的修养和举动實質上都是人道主义的和反民族主义的。只有无产者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 只有覺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

(恩格斯: “在倫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 1845年,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第665—666頁)

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 他們就必須有共同的利益。要使

他們的利益能一致,就必須消滅現存的所有制關係,因為現存的所有制關係是造成一些民族剝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對消滅現存的所有制關係最關心的只有工人階級。只有工人階級能做到這一點。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也就是克服了一切民族間和工業中的衝突,這些衝突在目前正是引起民族互相敵視的原因。因此,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同時就是一切被壓迫民族獲得解放的信號。

(馬克思、恩格斯:“論波蘭”,1847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10頁)

……有人責備共產黨人,說什麼他們要廢除祖國,廢除民族。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原來沒有的東西。既然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階級,確立為民族,所以它本身暫時還是民族的,不過這完全不是資產階級所理解的那個意思。

隨著資產階級的發展,隨著貿易自由和世界市場的確立,隨著工業生產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活條件的一致化,各國人民之間的民族孤立性和對立性日益消逝下去。

無產階級的統治將更加快它們的消逝。聯同的努力,至少是各文明國家的聯合的努力,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首要條件之一。

人對人的剝削一消滅,民族對民族的剝削也就會隨之而消滅。

民族內部的階級對抗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係也就會隨之消失。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7—488頁)

英国工人阶级向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伸出了友谊的手。他们深信，不管当前的可恶的战争怎样结束，全世界工人的联合终究会根绝一切战争。官场的法国与官场的德国彼此进行同室操戈的斗争，而法国的工人和德国的工人却互通和平与友爱的音讯。单是这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实，就展示出可望有比较光明未来的前途。这个事实表明，与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是同样由劳动统治的！

这个新社会的先声就是国际工人协会。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0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莫斯科1954年中文版，第469页）

“……胜利的无产阶级绝不能强迫其他异族人民接受任何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使自己的胜利遭到破坏。这当然不是说因此就绝对不能进行各种自卫的战争了……。”

（恩格斯：“致考茨基”，1882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8页）

世界联邦（而不是欧洲联邦）就是我们认为是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联合和自由发展的国家形式，直到共产主义底完全胜利使一切国家，以至民主制的国家都完全消灭的时候为止。

……没有无产阶级这一被压迫阶级底专政，便不能消灭阶级。若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所进行的较为长期的坚持斗争，便无法保证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自由联合起来。

（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1915年8月，“列宁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03—904页）

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家的现象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为了使各民族互相亲近，而且要使

各民族融为一体。……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
1916年1—2月，“列宁全集”第22卷，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0页)

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和现在都始终坚持国际主义的观点。我们保护一切民族的平等，使它们不受农奴主和警察国家的侵犯，但是我们主张的不是“民族的文化”，而是国际主义的文化，各民族文化中只有一部分，即具有彻底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内容的各民族的文化，才能成为这种国际主义文化的一部分。

(列宁：“拉脱维亚边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纲领草案”，
1913年5月，“列宁全集”第19卷，俄文第4版，第92页)

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来看，无论直接或间接地提出民族文化的口号都是不允许的。这个口号是不正确的，因为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的一切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就越来越趋于国际化了。社会主义会把它完全国际化。国际性的文化现在已由各国家的无产阶级有系统地建立起来，它不是把整个“民族文化”(不论什么民族)接受过来，而是从每一种民族文化中只吸取了其彻底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因素。

(列宁：“民族问题提纲”，1913年7月，“列宁论民族问题”，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1955年版，第55页)

自觉的工人反对一切民族压迫和一切民族特权，但是他们并不以此为限。他们同一切民族主义、甚至是最精巧的民族主义作斗争，同时，他们不仅坚持在同反动势力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斗争中使一切民族的工人团结起来，而且还坚持使他们打成一片。我们的任务不是使各个民族分开，而是使一切民族的工人团结起来。我们的旗帜上不是写着“民族文化”，而是写着国

际的文化——它使一切民族在最高的社会主义团结中打成一片，它现在已经由于资本家的世界团结而形成起来了。

(列宁：“再论按民族划分教育事业”，1913年12月，“列宁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68页)

……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们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年1—2月，“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1页)

口头上承认国际主义，而事实上在全部宣传、鼓动和实际工作中，却以市侩民族主义与和平主义来代替了国际主义，这不仅是在属于第二国际的各政党中，而且是在退出了这个国际的各政党中，甚至往往是在现时自命为共产主义的政党中最通常的现象。把无产阶级专政由民族性的(即存在于一个国家之内，还不能左右全世界政治的)专政转变为国际性的专政(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的，能够对全世界政治起决定作用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任务愈迫切，则同顽固成性的小资产阶级民族成见这种祸害作斗争，就愈加重要。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宣称只要承认民族平权就算是国际主义，同时却保留着(更不待说这种承认是纯粹口头上的)民族利己主义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要求：第一，一个国家内无产阶级斗争底利益应当服从于全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正在实现战胜资产阶级的这个民族，要能够并有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担负最巨大的民族牺牲。

(列宁：“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年，“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793页)

远东共和国可以取消，这絲毫不会触犯該共和国多数居民的民族利益(因为他們同俄罗斯大多数居民一样都是俄罗斯人)，但是取消各民族共和国就是要求取消非俄罗斯民族和使它們俄罗斯化的一种反动的荒謬举动，……。

……只要产生它們的各民族还存在，只要民族語言、民族文化、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还存在，它們就不能取消，就不能沒有自己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就不能沒有自己的民族基础。

(斯大林：“关于各独立民族共和国的联合問題”，1922年，“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6—117頁)

人們(例如，考茨基)談論在社会主义时期将造成統一的人类共同的語言，而所有其他的語言都将自行消灭。我很少相信这个关于普遍的統一語言的理論。經驗無論如何是反对而非贊成这个理論的。直到現在，情形是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語言种类的数目，因为它震动了人类的最下层，并把他們推上政治舞台，使早先为大家所不知道或很少知道的許多新的民族觉醒过来趋求新的生活。誰能想到旧的沙皇俄国是不下于五十个民族及民族集团的国家。可是十月革命打破了旧的枷鎖，把許多被遺忘了的民族和部族推上舞台，給予了他們以新的生活和新的发展。現在人們都說印度是一个統一的整体。然而在印度革命发动起来的时候，将有数十个以前不为人所知的、有自己的特殊語言和自己的特殊文化的民族出現于舞台，这是无須怀疑的。如果說到各种民族参加无产階級文化，那末，这个参加将采取与这些民族的語言和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形式，这也是无須怀疑的。

不久以前，我接到布略特几个同志的来信，請求我說明全人类文化与民族文化相互关系的一些重大而困难的問題。該信說道：

“恳切地請求对下面几个我們感到非常重大而困难的問題加

以說明。共产党的終极目的是統一的、全人类的文化。怎样設想經過我們的各个自治共和国境內所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化而轉到統一的全人类的文化去呢？各个民族文化(語言等等)的特点怎样能同化起来呢？”

我以为,上面說的,就可以作为对布路特同志們所忧虑的問題的答复。

布路特的同志們提出了在建設全人类无产階級文化进程中各个民族同化的問題。無疑的,有些民族会經歷,也許一定要經歷同化的过程的。这种过程从前也是有过的。但是問題是在于一些民族的同化过程并不排斥好多有生气的和日益发展的民族的强盛和发展的相反过程,而是以这一过程为前提的,因为各个民族的局部的同化过程乃是各民族一般发展过程的結果。唯其如此,有些个别民族的可能的同化,不是削弱,而是証实这样一个完全正确的論点:即全人类的无产階級的文化,并不排斥各民族的民族文化,而是以之为前提,并且培养着各民族的民族文化,正如各民族的民族文化不是排斥,而是补充和丰富全人类的无产階級的文化一样。

(斯大林:“东方大学的政治任务”,1925年,“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89—290頁)

列宁不是把民族差别消亡和民族融合的过程归入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內胜利的时期,而是仅仅归入无产階級專政在全世界范圍內实现以后的时期,就是說,归入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內胜利的时期即世界社会主义經濟基础已經奠定的时期。

(斯大林:“民族問題和列宁主义”,1929年,“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98頁)

如果認為全世界无产階級專政时期的第一个阶段将是民族和民族語言消亡的开始,将是統一共同語言形成的开始,那是錯誤

的。相反地，在第一个阶段民族压迫将被彻底消灭，这个阶段将是以前被压迫的民族和民族语言发展和繁荣的阶段，将是确立各民族平等权利的阶段，将是消灭民族互相猜疑的阶段，将是建立和巩固各民族间国际联系的阶段。

只有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第二个阶段，随着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逐渐形成而代替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类似共同语言的东西才会开始形成，因为只有在这个阶段，各民族才会感觉到除了自己的民族语言以外，还必须要有民族间的一种共同语言，——这是为了交际的便利，为了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合作的便利。总之，在这个阶段民族语言和民族间共同的语言将平行地存在。可能是这样：最先形成的将不是一个一切民族共同的、具有一种共同语言的世界经济中心，而是几个各自包括一批民族的、具有这一批民族的共同语言的区域经济中心，只有在这以后，这些中心才会联合为一个共同的、具有一切民族的一种共同语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中心。

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后一个阶段，当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充分巩固，社会主义已经深入到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各民族已经在实践中深信共同语言优越于民族语言的时候，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才开始消亡而让位于一切人们共同的世界语言。

在我看来，各民族的未来的大致的图画，各民族在将来融合的道路上发展的图画就是如此。

（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1929年，“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99—300页）

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我们主张各民族的文化在将来融合成一种有共同语言的共同（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文化，而同时

又主張在目前即在无产階級專政时期要繁荣民族文化。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應該讓各民族的文化发展和繁荣起来，發揮出自己的全部潛力，以便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时期各民族的文化融合成一种有共同語言的共同文化創造条件。在一个国家内无产階級專政的条件下繁荣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內容的民族文化，是为了当无产階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和社会主义深入日常生活的时候，它們能融合成一种有共同語言的共同社会主义(無論在形式上或內容上)文化，——列宁关于民族文化問題的提法的辯証性正在于此。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0年，“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20頁)

……各民族，比如說苏联各民族，会融合为一个有共同的大俄罗斯語言的共同的大俄罗斯民族的理論是民族沙文主义的理論，是反列宁主义的理論，它和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矛盾的，这个原理認為，民族差別在最近时期内不会消失，这些差別即使在无产階級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胜利以后还一定会存在很久。

至于民族文化和民族語言的更远的前途，那末我向来都是坚持而且現在还是坚持列宁的这一观点：在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期，当社会主义已經巩固并且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时候，各民族語言必然会融合为一种共同的語言，这种語言当然不会是大俄罗斯語言，……。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結論”，1930年，“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頁)

問：就苏联而論，您是否認為苏联繼續向共产主义前进，不会减少与世界和平合作的可能性？“共产主义在一个国家内”是否可

能？

答：我不怀疑，和平合作的可能性，不仅不会减弱，甚至能够增强。

“共产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特别是在苏联这样的国家内，是完全可能的。

（斯大林：答英国“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者亚历山大·威斯问，1946年9月17日，“斯大林论战后国际形势”，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43页）

至于说到斯大林在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论及各种语言溶合为一种共同语言时的另一个公式，那末这里所指的是另外的一个时代，即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后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世界帝国主义将不复存在，剥削阶级将被推翻，对民族和殖民地的压迫将被消灭，民族的孤立和互不信任将被民族的互相信任和接近所代替，民族权利的平等将被实现，压制和同化语言的政策将被取消，各民族间的合作将被建立，而各民族的语言将有在合作方式下互相丰富起来的可能。不用说，在这些条件下根本就谈不到一些语言底被压制和失败与另一些语言底胜利。在这里我们将遇到的不是两种语言——其中一种遭受失败而另一种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而是好几百种民族语言——这些语言由于各个民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长期合作便首先分出最丰富的单一的区域性的语言，然后区域性的语言才溶合为一个共同的国际语言，这种语言当然既不会是德语，也不会是俄语，更不会是英语，而是吸取了各民族语言和各区域语言的精华的新语言。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1950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3—54页）

二一 家庭、婚姻和妇女問題

第二十一個問題：共產主義制度對家庭將產生什麼影響？

答：兩性間的關係將成為僅僅和當事人有關而社會勿需干涉的私事。這一點之所以能實現，是由於廢除私有制和社會負責教育兒童的結果，因此，由私有制所產生的現代婚姻的兩種基礎，即妻子依賴丈夫和孩子依賴父母，也會消滅。這也是對道貌岸然的市僧關於共產主義公妻制的悲鳴的回答。公妻制完全是資產階級社會特有的現象，現在的賣淫就是這種公妻制的充分表現。賣淫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它將隨著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共產主義組織並不實行公妻制，正好相反，它要消滅公妻制。

（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1847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1頁）

消滅家庭！連極端的激進黨人也對共產黨人的這種可惡的企圖表示憤慨呢。

現代的、資產階級的家庭是建築在什麼基礎上的呢？是建築在資本上面的，建築在私人發財的制度上面的。這種家庭的完全發展的形態，只有在資產階級中間才存在着，而它的補充現象却是無產者的被迫獨居生活和公娼制。

資產階級的家庭，自然會隨着它的這種補充現象的消逝而消逝，兩者都要隨着資本的消滅而消滅。

或者你們責備我們，說我們要廢止父母對子女的剝削吧？我

們甘愿承認这种罪狀。

但是，你們却硬說，我們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們最亲密的关系。

难道你們的教育不是由社会决定的嗎？不是由你們借以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嗎？不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間接的干涉决定的嗎？共产党人并没有臆造什么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們仅仅是要改变教育的性質，要使教育摆脱統治階級的影响。

无产階級中間的一切家庭联系，愈是因为大工业的发展而陷于破坏，他們的子女愈是被变成简单的买卖对象和劳动工具，那末資產階級的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之間的亲密关系的那一套大話，就愈是令人听来作嘔。

但是，你們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整个資產階級异口同声地向我們这样叫喊。

資产者原来是把自已的妻子仅仅当作一种生产工具看待的。他們听說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联想到妇女也会遭遇到同样的命运。

他們連想也想不到，問題正在于要消灭妇女被当作簡單生产工具看待的这种地位。

其实，我們的資产者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对于共产党人要实行莫須有的正式的公妻制表示惊駭，那是再可笑也沒有的了。公妻制无須共产党人来实行，因为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

我們的資产者并不满足于把他們的无产者的妻女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正式的娼妓就更不必說了，他們把互相誘奸妻子当作最大的享乐。

資產階級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所以至多也只能这样責备

共产党人，说什么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盖着的公妻制。可是，只要现代的生产关系一消灭，那么从这种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娼妓制，自然就会随之而消灭。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3—487页）

旧家族制度在资本制度内的瓦解，虽然显得可怕可厌，但因大工业曾在家族制度的范围之外，在社会的有组织的生产过程中，给予妇女和少年男女儿童以极重要的位置，故又为家族及两性关系一个较高的形态，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当然，把基督教日耳曼的家族形态，看成绝对的，是和把古罗马的家族形态，古希腊的家族形态，东方的家族形态，看成绝对的，一样不合理。但它们依次继起，就成为一个历史的发展系列。并且，这又是同样明白的，由不分男女老幼的个人形成的结合劳动体的构成，虽然在它的自然发生的粗野的资本主义形态（在那里，是劳动者为生产过程，不是生产过程为劳动者）下，是不道德状态与奴隶状态的有毒的源泉，但在适当的情形下，必然会转变为人类发展的源泉。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99页）

在这个问题上，乌托邦主义者无限地高出于杜林先生。在乌托邦主义者看来，一旦人们自由结成社会而私人家务工作转为公共事业，那么青年教育的社会化以及家庭成员间真正自由的相互关系，也直接随之而生了。往后，马克思也已指出了（“资本论”第515页以下），“由于大工业，在社会的有组织的生产过程中，给与妇女以及两性的青年与儿童以决定的作用，所以大工业就在家庭范围之外为更高的家庭形式和两性关系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马

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99頁。——譯者注）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8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6頁）

現代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支配权的特殊性質，以及确立双方真正社会平等的必要性和方法，只有当两方在法律上完全平等时，才能充分显现出来。那时就可以看出，妇女的解放，必須以一切女性重行参加社会劳动为其头一个先决条件，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复再是社会經濟的单位。……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1955年中文版，第230—231頁）

不过，我們現在正走向一种社会变革，到那时候，一夫一妻制迄今所有的經濟基础，以及它那种补充物即卖淫現象的基础，都不免要消灭下去。一夫一妻制的发生，是由于大量財富集中在一人手里，即集中在男子手里，并且是由于需要将这种財富遺傳給这个男子的子女，而不是遺傳給別一个男子的子女。为此就需要妻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而非男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因此妻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决不妨碍丈夫实行公开的或秘密的一夫多妻制。不过，行将到来的社会变革，在至少将持久的可遺傳的財富的絕大部分——生产資料——轉化为社会公有以后，就要将这种遺產傳給何人的顧慮减至最少限度。不过，既然一夫一妻制的发生是由于經濟上的原因，那么当这种原因消灭的时候，它是不是也要消灭呢？

可以不无理由地答道：它不仅不消灭，反而只有那时它才能十足地实现。因为随着生产資料轉化为社会公有，雇佣劳动、无产阶级、从而一定数量的妇女——这数量可用統計方法計算出来——为金錢而献身的必要，也都要消灭下去。卖淫定会消灭，而一夫一妻制不仅不会終止其存在，而且会最后对于男性也成为现实。

这样一来，男子的地位無論如何会起很大变化。而且妇女的

地位，一切妇女的地位，也要发生很大的转变。随着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公有，个体家庭也不会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私人的家务将变为社会的工业。孩子的照管和教养将成为公众的事情；社会将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无论是婚生的或是非婚生的。因此，对于“后果”的担心也就会消除了，这种担心在今日成了一种阻止少女毫无恐惧和顾虑地委身于所爱的男子的最重要的社会因素——道德的和经济的因素。这岂不令足以使更自由的性交，从而社会舆论对于处女贞洁及女性廉耻的更加宽容态度逐渐发展起来吗？最后，难道我们没有看见在现代世界上一夫一妻制和卖淫虽为对立物，但却是不可分离的对立物，是同一社会秩序的两极吗？卖淫现象可能消灭而不会使一夫一妻制同归于尽吗？

在这里，一个在一夫一妻制开始发展时还只有过萌芽的新因素开始发生作用了，——这新因素就是个人的性爱。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1955年中文版，第231—232页）

可见，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及其所造成的财产关系的消灭已把今日对选择配偶尚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顾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达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存在了。

性爱就其本性来讲既是排他的，——虽然这种排他性在今日只有对于妇女才是有效的，——那末，基于性爱的婚姻，就其本性来讲便是专一婚姻。我们已经看到，巴奇芬把由群婚转到专一婚的发展看作主要应归功于妇女方面的一种进步，是作得很正确的；只有由对偶婚进到一夫一妻制的过渡，才应归功于男子；在历史上，这实质上是使妇女地位恶化，而便利了男子破坏贞操的。所

以，只要那迫使妇女不得不容忍男子这样通常破坏貞操的經濟顧慮一經消失，如关于自己生活，尤其关于自己孩子前途的顧慮一經消失时，那末由此而达到的妇女平权，依据从前的一切經驗来判断，与其說会促进妇女去过一妻多夫的生活，却不如說会大大促进男子去过真正一夫一妻的生活了。

但是，这样一来，一夫一妻制就会完全脱除掉它因其起源于财产关系而被烙上的两个特征，即男子的支配权和婚姻的不可离异性。男子在婚姻上的支配权只是男子在經濟上的支配权的后果，它本身是要随着后者的消灭而消失的。婚姻的不可离异性，部分地是一夫一妻制所由以发生的經濟状况的后果，部分地是这种經濟状况跟一夫一妻制間的联系尚未被正确理解并且为宗教所夸大时的傳統。到了今日，这种不可离异性已經时常受到破坏了。如果只有根据爱情結成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就单只繼續有爱情存在的婚姻才仍然是合乎道德的了。可是，个人性爱的长久性在各个不同的个人中間，尤其在男性中間，是各不相同的，要是感情已經完全消失或者已被新的热烈的恋爱所排除，那末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一件幸事了。只是不要使人們陷入无謂的离婚訴訟泥污中。

这样，我們現在关于資本主义生产行将消灭以后两性关系形式所能推想的，主要是屬于否定的性質，大都限于即将要消灭的东西。但是将会出現什么新的东西呢？这要取决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即取决于在生活中再不須用金錢或其他社会权力的手段去購買妇女的男子，和除了真实的爱情以外，再不須为了其他某种动机而委身于男子，或因对經濟后果的恐惧而拒絕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的女子。当这样的人一經出現，对于今日認為他們所应当做的一切，他們将会置之不理，他們自己会知道他們应当怎样行

动，他們自己也会造成与此相适应的关于每一个人行为的輿論——如此而已。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1955年中文版，第237—238頁）

只要妇女被摒弃在社会的生产劳动以外而只限于家中私人劳动，那末妇女的解放，妇女跟男子的平等，便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規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庭工作仅占有她們很少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这只有在現代大工业下才可以办到，現代大工业不但允許大規模的妇女劳动，而且直接要求妇女劳动，并且它日益設法使家庭的私人劳动也变为社会的生产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1955年中文版，第309頁）

英国那些捍卫妇女的形式权利的人，是要妇女和男人同样受資本家的无限剝削；这些人本身大半是直接或間接地关心資本主义对两性劳动者的剝削的。至于我，老实說，与其說我关心男女两性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最后年份中在形式上的绝对平权，不如說我更关心未来一代的健康。“男女的实际平权”，在我看来，只有到消灭了資本对两者的剝削，而家务劳动从现在的个人操作变成社会生产的一个部門时，才可能实现。

（恩格斯：“給海尔奥姆—沙克的信”，1885年7月5日，“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选集”，1953年俄文版，第390頁）

尽管頒布了种种解放妇女的法律，但妇女仍然是家庭奴隶，因为瑣碎的家庭事务压迫她們，窒息她們，使她們愚鈍卑賤，把她們纏在做飯管小孩的事情上，极端非生产性的、瑣碎的、劳神的、使人愚鈍的、折磨人的工作占去了她們的时间。只有在反对这种瑣碎

家務的普遍鬥爭(為掌握國家權力的無產階級所領導的)開始了的地方,更確切地說,只有在開始把瑣碎家務普遍改造為社會主義大經濟的地方,才有真正的婦女解放,才有真正的共產主義。

我們在實踐中對所有的共產黨員在理論上都不反對的這個問題注意得很夠嗎?當然不夠。我們對這方面已有的共產主義幼芽關心得很夠嗎?再說一遍,非常不夠。公共食堂、托兒所和幼兒園是這些幼芽的標本,是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平凡的、普通的东西,這些东西實際能夠解放婦女,減少和消除她們在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上同男子的不平等。

.....

在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的支持下,共產主義的幼芽不會夭折,而一定會茁壯地成長起來,發展成為完全的共產主義。

(列寧:“偉大的創舉”,1919年6月,“列寧全集”
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90—392頁)

婦女要是忙於家務,她們的地位總不免要受到限制。要徹底解放婦女,要使她與男子真正平等,就必須有公共經濟,必須讓婦女參加共同的生产勞動。這樣,婦女才會和男子處於同等地位。

當然,這裡指的不是要使婦女的勞動生產率、勞動量、勞動時間和勞動條件等等同男子相等,而是要使婦女不再因經濟地位與男子不同而受到壓迫。你們大家都知道,甚至在完全平等的條件下,婦女事實上仍然是受束縛的,因為全部家務都壓在婦女肩上。婦女擔負的家務多半是非生產性、最原始、最繁重的勞動。這是極其瑣碎而對婦女的進步沒有絲毫幫助的勞動。

我們追求社會主義的理想,要為社會主義的徹底實現而奮鬥,在這方面,婦女有十分廣闊的工作場所。目前,我們正在認真地做準備工作,為社會主義建設掃清地基,而社會主義社會建設這件

事，只有在男女完全平等的时候，只有在妇女摆脱了这种琐碎的、使人变笨的非生产性工作而同我们一道从事新工作的时候，才能开始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得做好多年。

这种工作不可能立刻做出成绩，不会产生很显眼的效果。

我们正在创办食堂、托儿所这样一些示范性的机关，来帮助妇女摆脱家务。建立这些机关的工作，主要应该由妇女来担任。

（列宁：“论女工运动的任务”，1919年9月，“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页）

女工运动的主要任务是要使妇女获得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而不仅是形式上的平等。让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使她们不要做“家务事的俘虏”，不要永远把自己仅仅限制在作饭和照料小孩的圈子里（这会使她们脑子变笨和受人鄙视）。这就是主要的任务。

这是一个要求根本改变社会技术和社会风气的长期斗争。但斗争结果一定会是共产主义取得完全胜利。

（列宁：“迎接国际妇女节”，1920年3月，“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75页）

二二 人口問題

……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应用資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按照最稳健的經濟学家和統計学家的計算(參看艾利生“人口原理”第一卷第一、二章)，“人口过剩”的大不列顛在十年內，就能够使粮食生产达到足以供应六倍于目前人口所需的程度。資本在日益增加，劳动力在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服从于人类。这种无穷无尽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用来为大众造福，人类所肩負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

(恩格斯：“政治經濟学批判大綱”，1844年1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6頁)

……我愈研究这种垃圾，便愈相信：农业的改革，以及以农业为基础的所有权这种齷齪东西的改革，是将来革命中的起点和終点。沒有这一着，馬尔薩斯爸爸便是对的。

(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8月14日，“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76—277頁)

人类的这种人口增长的抽象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将引起限制这种增长的必要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有一天共产主义社会需要象調节物品的生产一样，来調节人本身的生产，那末只有它才能毫不困难地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在这种社会中，有计划地来达到象現在法国和下奥地利所自然地、无计划地达到的那种結

果，并不是怎样困难的事情。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需要为此而采取某种措施，什么时候采取，怎样采取，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认为自己有责任给他们什么指示或建议。这些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比我和您笨。

（恩格斯：“致考茨基的信”，1881年2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7卷，第108页）

……医学宣传自由和保护男女公民的起码民主权利是一回事。最新马尔萨斯主义的社会学说是另一回事。觉悟的工人永远要进行无情的斗争，反对把这种反动的和怯弱的学说妄加到最先进、最有力、最有决心进行大改造的现代社会的阶级身上。

（列宁：“工人阶级与新马尔萨斯主义”，1913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9卷，第205—207页，转载自“新建设”1953年第3期）

二三 人的精神道德面貌

笛卡儿的唯物主义成为真正的自然科学的财产，而法国唯物主义的另一派则直接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财产。

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既然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那就不应当惩罚个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

诸如此类的说法，甚至在最老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中也

可以几乎一字不差地找到。……

(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6—167頁)

如果社会主义的著作家們把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归之于无产阶级，那末这次不像批判的批判硬要我們相信的那样是由于他們把无产者看做神的緣故。倒是相反。由于在已經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違反人性的頂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論上意識到了这种損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飾的、絕對不可抗拒的貧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現——的逼迫，不得不憤怒地反对这种違反人性的現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須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現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違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

(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45頁)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最坚定地打破过去傳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傳下来的各种观念。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9頁)

你們声明說，从劳动不能再变为資本、貨幣和地租的时候起，簡言之，从劳动不能再变为可以壟断的社会力量的时候起；即从个人的所有制不能再变为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的时候起，个性就被消

灭了。

那末，你們自己承認，你們所認為的個性，不外是資產者，即不外是資產階級的私有者。這樣的個性確實應該被消滅。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4—485頁）

……現實世界之宗教的反映，必須到實際日常生活的關係，在人面前，表現為極明白極合理的人與人的關係，和與自然的關係那時候，才會消滅。社會生活過程（即物質生產過程）的姿態，必須到它當作自由結合的人的產物，放在他們的意識的計劃的管理下面那時候，才會把它的神秘的幕揭下。但要做到這樣，社會的物質基礎，或一系列的物質的生存條件，會是必要的。這種基礎或條件自身，又是由一部長久而痛苦的發展史自然發生出來的產物。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63—1867年，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3頁）

……在盜竊動機被消滅了的社會里，即在頂多只有精神病患者才會經常盜竊的社會里，假使道德宣揚家莊嚴地宣布“勿盜竊”是永恆的真理，那他就會叫人笑掉牙齒的。

……整個說來，對於道德，也和對於人類一切其他知識部門一樣，確是前進了一步，這是勿庸懷疑的，不過我們依然沒有越出階級道德以外。只有在不僅消滅了階級對立、而且在生活實踐中忘記了階級對立的社會階段上，超越於階級對立及其回憶之上的真正人類的道德，方才成為可能。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8年，“馬克思恩格斯論宗教”，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3—24頁）

……當這行動完成之時，當社會掌握全部生產資料，有計劃地加以運用，並因此而使自己及一切社會成員脫離奴役狀態的時候

(直到現在,人們自己所生產的、但與他們相對立的生产資料,是作為不能克服的異己力量來把他們束縛于这种奴役状态之中的),就是說,當人們不但能設法而且能指揮的時候——只在这个时候,直到現在还反映于宗教中的最后的異己力量,方才归于消灭。那时宗教反映的本身,也就随之归于消灭,原因很简单,因为在那时,已經没有什么东西可被反映了。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8年,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第334—335頁)

……所謂共产主义,严格說來就是无代价地为社会工作,不考虑每个人的差別,絲毫沒有私的观点,沒有守旧心理、旧习气、各工作部門間的差別以及劳动报酬上的不同等等。这是我們能够使工人階級和劳动人民不仅投入軍事斗争而且投入和平建設的最大保證之一。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一定会进一步发展成为一所学校。……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會議”,1919年,“列宁全集”
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0—161頁)

……人們往往硬說我們沒有自己的道德;資產階級特別常常責備我們,說我們共产党人摒棄一切道德。这无非是淆乱視听,蒙蔽工农耳目的一种手段而已。……

我們說,我們的德性完全服从于无产階級階級斗争的利益。我們的德性是从无产階級階級斗争利益中引伸出来的。

……我們說:道德就是用来破坏旧时剝削者社会,并把全体劳动大众團結到創立共产主义者新社会的无产階級周围的工具。

巩固与完成共产主义事业的斗争是共产主义道德底基础。这也就是共产主义教育、訓練与学习的基础。……

(列宁:“青年团底任务”,1920年,“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07—811頁)

这都很好。但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可以想象的嗎？可以設想人們能剷除本身的“野蛮习惯”嗎？

还有，如果大家都各取所需，可以設想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够得上这种需要嗎？

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是足够发达的生产力和人們的社会主义意識以及人們的社会主义教育。現存资本主义所有制阻碍着現代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估計到在未来社会中不会有这种所有制，那末显而易见，生产力一定会增长許多倍。同时还不应忘記，在未来社会中，現在的数十万寄生虫和失业者都会担任工作而补充劳动者的队伍，这样就会大大推进生产力的发展。至于人們的“野蛮”情感和观点，并不是象某些人所設想的那样永恒的东西：有一个时期即原始共产主义时期，人們是不承認私有制的；后来一个时期即个人主义生产的时期，私有制掌握了人們的情感和理性；現在一个新的时期即社会主义生产的时期快要到来，那时人們的情感和理性浸透着社会主义的意向，这有什么奇怪的呢，难道存在不决定人們的“情感”和观点嗎？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6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08—309頁）

二四 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

……斯达汉諾夫运动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它的意义还在于它准备好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

(斯大林：“在第一次全苏联斯达汉諾夫工作会议上的演說”，1935年，“列宁主义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42頁)

我們在生产技术和工业发展速度方面已超过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很好的。但这还不够。必須在經濟方面也超过它們。我們能够做到这一步，而且我們应当做到这一步。只有当我們在經濟上也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时，我們才可希望我国有完全充足的消費品，有丰富的食品，那时我們就有可能实行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第二阶段。

(斯大林：“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年，“列宁主义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39頁)

雅罗申柯同志以为，只要做到合理地組織生产力，就能获得丰富的产品并过渡到共产主义，就能从“按劳取酬”的公式过渡到“各取所需”的公式。这是大錯特錯的，这暴露了他对于社会主义經濟发展的法則一窍不通。雅罗申柯同志过于简单地、小孩般简单地想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雅罗申柯同志不了解，如果讓集体农庄集团所有制、商品流通等等經濟事实仍然存在，那就既

不能获得能满足社会一切需要的丰富产品,也不能过渡到“各取所需”的公式。雅罗申柯同志不了解:在过渡到“各取所需”的公式以前,社会必须经过一系列的經濟改造和文化改造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劳动将在社会成员面前从仅仅维持生活的手段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公有制则成为社会存在的不可动摇和不可侵犯的基础。

为了准备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宣言上过渡到共产主义,至少必须实现三个基本的先决条件。

第一,必须切实加以保证的,不是神话般的生产力的“合理组织”,而是全部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之所以必须占优先地位,不仅是因为这种生产应当保证自己的企业以及国民经济其他一切部门的企业所需要的装备,而且是因为没有这种生产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扩大再生产。

第二,必须用实行起来有利于集体农庄因而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逐渐过渡的办法,来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并且也用逐渐过渡的办法使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使中央政权或其他某个社会经济中心能掌握社会生产的全部产品来为社会谋福利。

雅罗申柯同志断定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之间没有任何矛盾。这是错误的。当然,我国现今的生产关系是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它完全适合于生产力的增长,一日千里地把生产力向前推进。但是,如果以此自满,以为在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那就不正确了。矛盾无疑是有,而且将来也会有的,因为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并且将来也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在领导机关的正确政策下,这些矛盾就不会变成对立,而这样也就不会弄到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

突。如果我们执行类似雅罗申柯同志所推荐的不正确的政策，那就会是另一种情形了。在这种场合下，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我国的生产关系可能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极严重的阻碍者。

因此，领导机关的任务在于及时地看出日益增长的矛盾，并及时地采取办法，使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增长，来克服这种矛盾。这首先是与集团的即集体农庄的所有制、商品流通这种经济现象有关的。当然，目前这些现象是在被我们有成效地利用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而且它们也在给我国社会带来毫无疑问的利益。无疑地，它们在最近的将来也将带来利益。但同时这些现象已在开始阻碍我国生产力的强大发展，因为它们正在阻碍这种由国家计划化来完全包括全部国民经济、特别是包括农业的事业，如果看不出这点，那就是不可原谅的盲目了。不容置疑，愈向前去，这些现象就会愈加阻碍我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增长。所以，任务就在于要逐渐把集体农庄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以及也是逐渐用产品交换制代替商品流通，这样来消灭这些矛盾。

第三，必须使社会达到这样高度的文化水平，以致能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使社会成员都能获得足以成为社会发展中的积极分子的教育，都能自由地选择职业，而不致由于现存的劳动分工而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

为了做到这点，究竟需要什么呢？

如果认为用不着大大改变现今的劳动状况，便可以达到社会成员的这种强大的文化高涨，那就不正确了。为了做到这点，首先需要把每天的劳动时间至少缩短到六小时，然后再缩短到五小时。这是使社会成员有充分的自由时间来获得全面教育所必需的。其次，为了做到这点，需要实行普及义务的綜合技术教育，这是使社会成员有可能自由选择职业而不致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所必需

的。再次，为了做到这点，需要根本改善居住条件，把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至少提高一倍。也许还要更多，办法是不仅直接提高货币工资，而且特别重要的，是继续不断地降低日用品价格。

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就是这样。

只有把这一切先决条件全部实现之后，才可以希望，劳动将在社会成员面前，从累赘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马克思），“劳动从沉重的负担变成愉快”（恩格斯），公有制将被社会全体成员看作是社会存在的不可动摇和不可侵犯的基础。

只有把这一切先决条件全部实现之后，才可以从社会主义的公式“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公式“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这将是从小康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到另一种更高的经济即共产主义经济的根本过渡。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9—62页）

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呢？

作为这样来提高集体农庄所有制的基本办法，萨宁那和温什尔两同志提议：把集中在农业机器站的基本生产工具出售给集体农庄，归其所有，这样来解除国家对农业投资的负担，并达到使集体农庄自己负责维持和发展农业机器站。他们说：

“如果以为集体农庄的投资应该主要用在集体农庄乡村的文化需要上，而对于农业生产的需要，仍旧应该由国家进行基本的大批投资，那就不正确了。因为集体农庄已有充分能力把这一负担完全承当起来，而使国家解除这一负担，岂不是更加正确些吗？为了在国内制造出丰富的消费品，国家在自己的投资方面还有不少

的事情要做。”

为了論証这一建議，建議人提出了几个論据：

第一，建議人援引斯大林所說生产資料甚至不出售給集体农庄的这句话，而对斯大林的这一論点表示怀疑，宣称国家毕竟在出售生产資料給集体农庄，如象大鐮刀、小鐮刀以及小发动机等等之类的小农具。他們認為，既然国家把这些生产資料出售給集体农庄，那末国家也可以把农业机器站的机器之类的一切其他生产資料出售給集体农庄。

这一論据是不能成立的。当然，国家是把小农具出售給集体农庄的，依照农业劳动組合章程和宪法，这是可以的。但是可不可以把小农具和象农业机器站的机器那样的农业基本生产資料相提并論，或者，把它們和也是农业基本生产資料之一的土地相提并論呢？显然，是不可以的。其所以不可以，是因为小农具絲毫也决定不了集体农庄生产的命运，可是象农业机器站的机器以及土地这样的生产資料，在我国当前的条件下，是完全可以决定农业的命运。

不难理解，当斯大林說生产資料不出售給集体农庄的时候，他所指的不是小农具，而是农业的基本生产資料，即农业机器站的机器、土地。建議人玩弄“生产資料”这字眼，把两种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談，他們不知不觉地碰了壁。

第二，薩宁那和温什尔两同志又引証說，在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开始的时期——一九二九年末和一九三〇年初，联共(布)中央自己曾主张把农业机器站轉归集体农庄所有，同时要求集体农庄在三年內偿清农业机器站的价值。他們認為，虽然这事情当时“因为”集体农庄“貧穷”而失败了，但是現在，当集体农庄已經富裕的时候，可以回头来采取把农业机器站出售給集体农庄的政策。

这一論据也是不能成立的。在一九三〇年初，联共(布)中央确实曾通过一項把农业机器站出售給集体农庄的决定。当时是按照一部分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的建議，作为試驗、作为尝试而通过这个决定的，为的要在不久之后回到这个問題上来加以审查。但头一次檢查就表明这一决定是不妥当的。过了几个月，即在一九三〇年末，就把这个决定取消了。

后来集体农庄运动进一步的增长和集体农庄建設的发展，使集体农庄庄員以及领导工作人員都最后地确信，把农业的基本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中，集中在农业机器站手中，是保証集体农庄生产高速度增长的唯一方法。

我們大家都庆幸我国农业生产的巨大增长，谷物、棉花、亚麻、糖蘿蔔等等生产的增长。这种增长的源泉是什么呢？这种增长的源泉就是現代技术，就是許許多多為这一切生产部門服务的現代化机器。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一般的技术，而是在于技术不能停止不前，它必須繼續日新月异地改进，旧的技术必須作廢，代之以新技术，新的再代之以最新的。不这样做，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突飞猛进就是不可思議的，无论丰富的收获，无论丰足的农产品，也都是不可思議的。但是，要把几十万架車輪式的拖拉机作廢，代之以履帶式的拖拉机，把几万架陈旧了的联合机作廢，代之以新的联合机，以及例如，为技术作物制造新的机器，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說，要負担几十亿的支出，这些支出非經過六年到八年之后不能完全收回。即使我国的集体农庄是百万富翁，它們負担得了这样大的支出嗎？不，負担不了，因为它们沒有力量負担要在六年至八年之后才能完全收回的几十亿的費用。这种支出只有国家才負担得了，因为国家，并且只有国家才負担得起用新机器去更換旧机器所受到的这种損失，因为国家，并且只有国家才承担得起因在六

年到八年之后才能收回这笔費用而受到的这种損失。

明白这一切之后，那末要求把农业机器站出售給集体农庄归其所有，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說，使集体农庄遭受巨大損失，使集体农庄破产，破坏农业的机械化，减低集体农庄生产的速度。

由此可得出結論說，薩宁那和温什尔两同志建議把农业机器站出售給集体农庄归其所有，就是向落后方面倒退一步，就是企图把历史的車輪拉向后轉。

就暫且假定一下，我們接受了薩宁那和温什尔两同志的建議，并着手把基本生产工具、农业机器站出售給集体农庄归其所有。这会得到什么結果呢？

第一，結果就会是集体农庄成了基本生产工具的所有者，換句話說，它們就会处于我国无論那一个企业都沒有的特殊地位，因为大家知道，在我国，甚至国有化的企业也并不是生产工具的所有者。究竟用什么理由来作为集体农庄的这种特殊地位的根据呢，用什么进步的、前进的理由来作为根据呢？可不可以說，这样的地位就会促使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就会加快我們的社会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呢？如果說这样的地位只会使集体农庄所有制离开全民所有制更远，不是使得接近共产主义，反而是使得远离共产主义，豈不是更正确些嗎？

第二，結果就会是扩大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因为巨量的农业生产工具会投进商品流通的范围。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能不能使得我們向共产主义推进呢？薩宁那和温什尔两同志以为如何？說它只会阻滯我們向共产主义前进，豈不是更正确些嗎？

薩宁那和温什尔两同志的基本錯誤，是在于他們不了解商品流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和意义，不了解商品流通是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大概他們以为，就是有

商品流通，也可以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去，商品流通是不会妨碍这个事业的。这是由于不了解马克思主义而犯的严重错误。

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里批评杜林主张的在商品流通条件下活动的“经济公社”时，确凿证明商品流通的存在必然要使杜林的所谓“经济公社”去复活资本主义。大概，萨宁那和温什尔两同志是不同意这一点的。那末，他们就更站不住脚了。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从这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出发：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依照需要来分配产品的共产主义原则，是排斥任何商品交换的，因而也排斥把产品转化为商品，同时也就是把产品转化为价值的。

关于萨宁那和温什尔两同志的建议和论据的情形，就是如此。

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步骤呢？

集体农庄不是普通的企业。集体农庄耕种的土地早已不是集体农庄的财产，而是全民的财产。因而，集体农庄并不是它所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

其次，集体农庄借以进行工作的基本生产工具，并不是集体农庄的财产，而是全民的财产。因而，集体农庄不是基本生产工具的所有者。

再次，集体农庄是合作企业，它使用自己庄员的劳动，按照劳动日把收入分配给庄员，而且集体农庄有自己年年更换的、用于生产的种籽。

试问，集体农庄究竟占有一些什么，它可以随心所欲、完全自由支配的集体农庄财产是什么？这种财产就是集体农庄的产品、集体农庄生产的产品，即谷物、肉类、油类、蔬菜、棉花、糖蘿蔔、亚蔬等等，而建筑物和集体农庄庄员园地中的个人副业不計在內。

問題在于：这种产品的大部分、即集体农庄生产的剩余品，进入市場，从而列入商品流通系統中。正是这种情况現在阻碍着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所以正应该从这一方面展开工作，来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

（斯大林：“答A·B·薩宁那和B·Γ·温什尔两同志”，1952年，“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0—86頁）

二五 农民同盟軍問題在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中的重要性

……工人、士兵和农民的經驗又一次証明，布尔什維克对社会力量对比的判断和估計是正確的，他們說，要实现工农联盟是很困难的，但它是唯一不可战胜的反对資本家的联盟。

同志們，如果可以在这里談科学的話，那末这就是科学。这个經驗是从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得来的，是一个十分可靠的建設共产主义的經驗。我們只有在农民自觉地得出肯定的結論的情况下，才能建成共产主义。我們只有同农民結成联盟，才能完成这一事业。根据高尔察克事件的經驗，我們可以深信这一点。

（列宁：“苏維埃政权成立两周年”，1919年，“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3—114頁）

我們曾經是而且还是一个**小农国家**，我們向共产主义过渡比在其他任何条件下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困难得多。为了完成这一过渡，参加过渡的农民必須比过去参加战争的农民多十倍。

（列宁：“全俄苏維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俄文第4版，第472頁）

我們不應該指望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必須以农民对个人利益的关心为基础。有人對我們說：“使农民关心个人利益，就是恢复私有制。”不，我們从来沒有要废除农民对消費品和工具的私有制。我們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农民沒有私有的土地，他們在租来的土地上經營农业。在許多国家里都存在过这种制度。这在經濟上

沒有絲毫辦不到的地方。困難就在於使他們關心個人的利益。必須使每一個專家也關心生產的發展。

我們是否作到了這一點呢？沒有作到！我們以為在一個無產階級失去階級性的國家里可以按共產主義的命令進行生產和分配。我們一定要改變這種作法，否則我們就不能使無產階級認識這種過渡。歷史上還從來沒有提出過這樣的任務。我們曾想直接用所謂正面攻擊來解決這個任務，但是我們失敗了。這種錯誤在每次戰爭中都會發生，大家已經不把它們看作錯誤。正面攻擊失敗了，我們就改用迂迴的辦法，採用圍攻和對壕戰。

（列寧：“新經濟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務”，1921年10月，
“列寧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0頁）

我曾收集過一些材料，準備在1922年12月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作關於城市工人幫助農村居民的報告，但這個報告沒有作成。關於這方面的材料，有些是霍多羅夫斯基同志弄給我的，既然我自己沒有來得及把這個問題研究好並通過蘇維埃代表大會來發表，現在就把它提出來請同志們研究。

這是城鄉關係的一個基本政治問題，對於我們的整個革命有決定的意義。現在資產階級國家正不斷努力設法麻痺城市工人，驅使國家、沙皇政党和資產階級政黨出錢辦的種種報刊來為這一目的效勞，我們可以而且應當利用我們的政權把城市工人真正培養成在農村無產階級中傳播共產主義思想的人。

我說了“共產主義”這幾個字，我要趕忙聲明一下，以免引起誤會或過於機械的了解。決不能把這一句話了解為似乎我們應當馬上把純粹狹義的共產主義思想帶到農村去。在我們農村中還沒有實行共產主義的物質基礎之前，對於共產主義，這樣作可以說是有害的，可以說是危險的。

不能这样作。应当从建立城乡的联系开始，决不能过早地抱定向农村灌输共产主义的目的。这个目的现在是达不到的，是不合时宜的，现在提出来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可是，在城市工人与农村劳动者中间建立相互的联系，确定一种可以很容易建立起来的友好互助形式，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执政的工人阶级的基本任务之一。为此就必须要在工厂的工人中组成许多以经常帮助农村发展文化为宗旨的团体（党的、工会的、群众的）。

能不能把所有的城市支部都“分配”给各农村支部，使每一个“分配”给相当的农村支部的工人支部，都能够经常注意利用一切机会、一切时机，来满足自己的兄弟支部的各种文化要求呢？或许还能找到其他联系形式？我在这里，只是提出问题，引起同志们的注意，把霍多罗夫斯基同志告诉我的西伯利亚西部的经验转告给大家，并把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巨大文化任务完全提出来。

我们对于农村，除了正式预算和正式联系之外，几乎没有作任何事情。诚然，我国今天城乡的文化联系自然而然地、必然地带有一种性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给农村的，是那些使农村在政治、经济、道德、体质等方面腐化起来的東西。而我们的城市自然而然地开始给农村的，正是相反的东西。可是这一切正是自然而然地、自发地进行的，所以可以要这个工作带有自觉性、计划性和系统性，使这一切加强起来，以后更百倍地加强起来。

只有当我们研究了这个问题，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工人团体（尽量防止它们官僚主义化），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它并实行它的时候，我们才能前进（那时我们大概就可以开始百倍迅速地前进）。

（列宁：“日记摘录”，1923年1月，“列宁全集”第33卷，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20—421页）

毛泽东博览
www.mzdbl.cn

网站编辑制作

统一书号：1001·370

定 价： 0.58 元